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 (ILCDS)

通 訊

Newsletter of International Liaison Committee

for Dunhuang Studies No.3

(2004 年第 2 期)

策劃：高田時雄、柴劍虹

主編：郝春文

副主編：金滢坤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主辦

2004 年 12 月 · 北京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ILCDS）通訊

Newsletter of International Liaison Committee for Dunhuang Studies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主辦

策劃：高田時雄、柴劍虹

主編：郝春文

副主編：金滢坤

目 錄

- 1、2001 年敦煌學研究綜述……………王義康
- 2、2003-2004 年台灣地區敦煌學研究綜述……………鄭阿財
- 3、敦煌石窟藝術研究的拓展與深入……………胡同慶
- 4、敦煌莫高窟第 275 窟研究綜述（一）……………盧秀文
- 5、海峽兩岸對回鶻佛教的研究及存在的問題……………楊富學
- 6、在“常書鴻先生誕辰一百週年紀念會”上的講話……………郝春文
- 7、常書鴻先生誕辰一百週年紀念會簡介……………許建平
- 8、“醫學：從敦煌到中亞”學術研討會簡述……………陳明
- 9、特別展覽會「守屋コレクション寄贈 50 周年記念——古写經—聖なる文字の世界—」を終えて……………赤尾栄慶
- 10、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創立 75 周年記念——中國宗教文獻研究國際シンポジウム景教・摩尼教セッション……………高田時雄
- 11、中國唐史學會第九屆年會暨“唐宋社會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李發
- 12、第 37 屆國際東方學家大會側記……………郝春文
- 13、“社會與國家關係視野下的漢唐歷史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劉雅君
- 14、2004 年美國宗教學會年會簡介……………郝春文
- 15、IDP 第六次會議將在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舉行……………林世田

- 16、IDP 新進展：敦煌文字數據庫……………高奕睿、林世田
- 17、羽田記念館所蔵西域出土文献写真資料中『鸞子賦』テキスト紹介……………玄幸子
- 18、魏晉・「五胡」時代の鎮墓文からみた敦煌の地域的特質…………… 關尾史郎
- 19、紀念馬雍……………柴劍虹
- 20、《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編輯後記……………府憲展
- 21、出版信息……………王義芝
- 22、《浙江与敦煌学——常书鸿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出版……………許建平
- 23、《中國石窟圖文志》評介……………朱悅梅

2004年2期（總第3期）

2004年12月20日

2001 年敦煌學研究概述

王義康 (中國國家博物館)

編者按：本刊之創刊號和 2004 年第一期分別刊載了 2002 年、2003 年敦煌學研究概述和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受到了學術界的歡迎。在本刊之前，曾有一九八四年創刊的《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研究通訊》連續刊載各年度的敦煌學研究概況和研究論著目錄。自一九九三年《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研究通訊》停刊以後，雖有《敦煌學輯刊》等雜誌有時刊載某年度的敦煌學研究概況和研究論著目錄，但未能連續。為能向敦煌學界提供一份連續完整的各年度敦煌學發展的學術參考資料，自本期起，本刊每年第二期分別刊載 2002 年以前各年度的敦煌學研究概述和論著目錄，一直追溯到《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研究通訊》停刊的年度為止；每年第一期則刊載上一年度的敦煌學研究概況和論著目錄。由於 2001 年年度的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敦煌學輯刊》已經發表過，所以，本期只有《2001 年敦煌學研究概述》，不再重複刊載該年度的敦煌學論著目錄。

本文介紹 2001 年中國大陸地區敦煌學的研究成果。凡港臺地區、國外學者在大陸出版的著作、刊登的論文也在本文收集範圍之內。據不完全統計，本年度大陸地區公開發表的有關敦煌研究論文 400 餘篇，論著 20 餘部，涵蓋歷史與地理、語言文學、社會與文化、考古與文物保護、宗教、藝術、少數民族歷史與語言等方面。本文雖然從各種期刊、索引，及出版資訊中收集相關的研究成果，力求完備，但限于篇幅，僅只能對主要的研究成果概括敘述，不可能對所有研究成果逐一介紹。

概說

本年度敦煌學研究概括性論著主要涉及學術回顧與瞻望、文獻整理與研究、寫本辨偽、有關人事介紹與評價、文獻流散與收藏、文獻資料編目與資訊管理等方面內容。

就敦煌學整體或某一領域的研究作出回顧，並進一步瞻望未來發展方向，池田溫著、張銘心譯《近年日本的敦煌吐魯番研究》（《敦煌學輯刊》2001 年 1 期），從莫高窟等諸石窟及寺院遺址、墳墓等考古學、美術史；出土古文獻的語言學、古文字學、文獻學、文學、宗教學（佛教、道教、其他宗教）；出土文獻的法制、社會經濟史；敦煌吐魯番地域史等四個方面回顧了近年日本的研究狀況，並對以後敦煌吐魯番研究提出新的期望。程喜霖《20 世紀敦煌文獻與古史研究》（《敦煌文獻論集》）對 20 世紀敦煌文獻與古史研究之間的關係進行了探討，認為敦煌文獻為王國維創立的“二重證據法”研究古史提供了重要依據，也為中古史研究開拓了新領域、提供了新材料。該文還對 20 世紀敦煌文獻與古史研究發展本身的階段性特點進行了回顧，認為自 1993 年以來進入低迷階段，並對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進行了探討，指出了推進 21 世紀敦煌史學發展應具有的五個方面因素，只有如此，敦煌學乃至敦煌文獻與中古史研究相結合的敦煌史學，才能走出低迷，在 21 世紀重現輝煌。余欣《法國敦煌學的新進展——〈遠東亞洲叢刊〉“敦煌學新研”專號評介》（《敦煌學輯刊》2001 年 1 期）對法國遠東學院及《遠東亞洲研究紀要》做了介紹，並對有關敦煌學的論文做了點評。馬德《敦煌文獻對敦煌石窟研究的意義》（郝春文主編《敦煌文獻論集》，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認為，敦煌石窟研究不能脫離敦煌文獻，石窟的研究應該在熟悉石窟的基礎上，瞭解和掌握敦煌文獻的知識和內容，以便進一步做好石窟研究。王三慶《光道大師撰〈諸雜齋文〉下卷研究——兼論敦煌文獻之整理問題》（《敦煌文獻論集》）對 P. 3129 號文書下卷的作者、寫作年代、寫卷內容、史料價值，以及人物、官名、地名等進行了探討，並對於敦煌文獻研究及整理文本也提出了看法。鄭阿財《敦煌童蒙讀物的分類與總說》（《敦煌文獻論集》）對童蒙讀物的分類、特質，蒙書整理與研究的意義、面臨的困

惑等問題進行了討論，并對蒙書研究的前景作了展望。沙武田、邵惠莉《20 世紀敦煌白畫研究概述》(《敦煌研究》2001 年 1 期)對百年來敦煌白畫研究作了簡介，并加以扼要的評述。

本年度敦煌文書整理與研究方面的成就，首推郝春文著《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第 1 卷(科學出版社，2001 年版)，它是敦煌文書研究的階段性成果，該書將 S. 10—S. 323 號文書中的有關社會歷史方面的文書釋錄為通行的繁體字，并對原件加以校理，解決了文書中所涉及的大量定性、定名、定年等問題，并于每件文書釋文後附有校記和 90 年來學術界有關該文書的研究文獻索引，以適應當前敦煌學發展所需。胡平生、張德芳《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版)對 1990—1992 年甘肅省文物考古隊研究所在敦煌甜水井東南漢代懸泉遺址出土的漢簡中的精華部分進行了釋讀。這方面其他的研究有張俊民《〈敦煌懸泉漢簡釋文選〉校補》(《敦煌學輯刊》2001 年 1 期)，對《敦煌懸泉漢簡釋文選》中錯訛之處進行了校正。李小榮《〈兄常勸弟奉修三寶，弟不敬信，兄得生天緣〉校注》(《敦煌研究》2001 年 2 期)主要對《兄常勸弟奉修三寶，弟不敬信，兄得生天緣》進行了校錄和注釋。魏迎春《讀俄藏敦煌文獻 Дх.00098、Дх.00513 號劄記》(《敦煌學輯刊》2001 年 1 期)認為 Дх.00098、Дх.00513 號文書形式、內容與人們熟知的《太公家教》存在一些差別。陳國燦《遼寧省檔案館藏吐魯番文書考釋》(《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 18 輯，武漢大學三至九世紀研究所編)對遼寧省檔案館藏六件吐魯番文書重新作出錄文，在每條錄文之後又對內容加以考訂、解釋。對敦煌文獻整理的評論有張涌泉《敦煌故里對敦煌學的新奉獻——〈甘肅藏敦煌文獻〉讀後》(《敦煌研究》2001 年 1 期)，該文高度評價了《甘肅藏敦煌文獻》編纂、整理的優點，同時也指出了存在的問題。楊森《從敦煌文獻看中國古代從左向右的書寫格式》(《敦煌研究》2001 年 2 期)，則探討了古代文獻從左書寫格式大致發展的軌迹。

關於敦煌寫本的真偽，赤尾榮慶《關於偽寫本的存在問題》(《敦煌文獻論集》)一文闡述了最近十五年來日本圍繞偽寫本研究的觀點，并對中國、日本存在的敦煌偽寫本提出看法，認為承認事實，將敦煌寫本研究跨學科地進行下去這樣一種姿態是 21 世紀敦煌寫本研究的基礎。石塚晴通《敦煌寫本的問題點》(《敦煌文獻論集》)在日本學者偽寫本研究基礎上，從敦煌寫本的書寫工具及用紙的角度，就辨別敦煌寫本真偽的幾個問題談了自己的認識。落合俊典《羽田亨稿〈敦煌秘笈目錄〉簡介》(《敦煌文獻論集》)一文也涉及到了敦煌寫本真偽的討論。

敦煌學的發展是經過了幾代學人的努力，紀念或評價、介紹國內外著名敦煌學家及他們的研究成果的論文有：葉文玲著《敦煌守護神——常書鴻》(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 年版)介紹了敦煌藝術研究所的創始人——常書鴻的生平，評價了他扎根敦煌，對敦煌藝術研究所作的貢獻。王芄《1941 年王子雲率團考察敦煌石窟》(《敦煌研究》2001 年 1 期)對 1941—1943 年王子雲率團考察敦煌石窟的情況進行了介紹。楊麗梅、楊麗珍《外國人士中亞遊記簡析》(《敦煌學輯刊》2001 年 1 期)對國外學者中亞遊記的概況做了介紹。謝生保、趙崇民《第一個得到藏經洞文書的外國人》(《敦煌研究》2001 年 1 期)認為第一個得到文書的人是曾經給德國地理學家霍芬當過助手、并在中國做官的比利時人——保爾·施普靈蓋爾特。方廣錫《從‘敦煌學’的詞源談起》(《敦煌學輯刊》2001 年 2 期)對何時、何人開始使用“敦煌學”一詞的問題作了補充說明。賀世哲《對張大千“不曾破壞敦煌壁畫”之質疑》(《敦煌研究》2001 年 1 期)一文對這一“歷史懸案”進行了重新討論。

關於敦煌文獻流散、文物性質與收藏，榮新江《敦煌藏經洞文物的早期流散》(《敦煌文獻論集》)，對 1900 年敦煌藏經洞開啓以後到 1907 年 5 月斯坦因進洞以前流散出來的敦煌絹畫和經卷進行了考察，探討了藏經洞文物初期流傳的情況。胡同慶《也談藏經洞文物的性質》(《社科縱橫》2001 年 2 期)綜合目前學術界爭議頗大的“廢棄說”和“避難說”，認為藏經洞文物對當時人來說“食之無味，棄之可惜”，故封存處理。李際寧《中國國家圖書館近年入藏的敦煌遺書及其史料價值》(《敦煌文獻論集》)對新近入藏的 19 件敦煌遺書作了介紹。

關於敦煌文獻資料編目與資訊資料網絡化管理方面的探討，白化文《敦煌學原材料與研究書刊的圖書館編目問題》(《中國典籍與文化》2000 年 3 期、《敦煌文獻論集》)從敦煌文獻與圖書編目的關係出發，探討兩者之間的相互關係。楊寶玉《英藏敦煌漢文文獻目錄述要》對 50 年代後出版的英藏敦煌漢文目錄，及新編成的《英藏漢文佛經以外敦煌文獻總目索引》作了評述。

李鴻恩《敦煌研究院文獻資訊資料網絡化管理實踐與思考》(《敦煌研究》2001 年 4 期)根據敦煌研究院資料管理中心文獻資訊工作的特點,提出了網絡環境下自動化管理的總體規劃、完成目標以及實施辦法。

本年度敦煌學綜合論著有榮新江《敦煌學十八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年版)。該著內容有六個方面,敦煌簡史,敦煌藏經洞的發現和文物流散、研究的歷史,各種敦煌文獻及其價值的介紹,對敦煌石窟各方面的概說,敦煌寫本的外觀和辨偽問題。大體囊括了敦煌學的主要內容,而又突出了歷史學所關注的問題。相關論著尚有褚良才《敦煌學簡明教程》(《中華書局,2001 年版》)

宗教

這一年度的敦煌宗教研究,涉及的宗教有佛教、道教、景教、摩尼教。

在佛教方面,發表的論著涉及內容主要有文獻資料的刊布、文書整理(包括譯經)、佛教法事儀式研究、佛教轉播及敦煌佛教研究的回顧與瞻望。方廣錫《影印敦煌遺書〈大乘無量壽經〉序》(《敦煌學輯刊》2001 年 1 期)就私藏敦煌遺書《大乘無量壽經》擬將影印成冊的學術貢獻給予充分的肯定。他的《關於敦煌本〈壇經〉》(《敦煌文獻論集》)對現在知道的年代最早的禪宗經典抄本進行了研究。宗舜《〈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佛教文獻擬題考辨》(《敦煌研究》2001 年 1 期)對《俄藏黑水城文獻》中大部分的佛教文書進行了辨識,擬定了題目,同時還糾正了個別擬題不確的情況。該氏《敦煌寫卷 S. 343V 佛教文獻考》(《敦煌研究》2001 年 4 期)將 S. 343 背面的佛教文獻全部識別出來,糾正了《敦煌藝術總目索引新編》擬目和一些訛誤。李刈《石谷風藏敦煌遺書殘卷內容小考》(《敦煌研究》2001 年 4 期),對石谷風藏《下女夫詞》殘片作了識讀、校勘和介紹,並對 10 篇佛經殘片給以定名。黃征《王伯敏先生藏敦煌唐寫本〈四分律小抄一卷〉(擬)殘卷研究》(《敦煌學與中國史研究論集》)對失題敦煌唐寫本殘卷作了校錄、說明。霍旭初《唐代龜茲僧勿提提犀魚漢譯〈十力經〉及其相關問題》(《敦煌研究》2001 年 3 期)以為《十力經》是早期佛教宣說佛智慧力的經典。作者針對該經為密教經典的說法進行了考辨,並對佛教文獻記載龜茲“滴溜成音”的傳說加以考證。玉淑健《唐寫本〈抄十七地要〉考釋》(《敦煌研究》2001 年 3 期)以為浙敦 072 號《抄十七地要》為唐時人抄錄《瑜伽師地論》概要手稿。該寫本對研究吐蕃統治時期及張議潮歸義軍初年敦煌佛教狀況具有重要的價值。高田時雄《有關吐蕃期敦煌寫經事業的藏文資料》(《敦煌文獻論集》)利用有關寫經的藏文資料,探討了吐蕃時期敦煌寫經的實際情況。張鐵山《莫高窟北區 B53 窟出土回鶻文〈雜阿含經〉殘葉研究》(《敦煌研究》2001 年 2 期)在比較研究的基礎上,認為,該回鶻文殘葉的翻譯年代為元代;回鶻文譯本《雜阿含經》至少有卷子式和貝葉式兩種版本;B53 窟出土回鶻文《雜阿含經》為手稿本;該回鶻文譯本譯自漢文,而且是摘取漢文原文中部分詞句直譯而成。劉文鎖《尼雅浴佛會及浴佛齋禱文》(《敦煌研究》2001 年 3 期)對尼雅出土的佉盧文書中 511 號文書做了箋證,復原了當世浴佛儀式的若干內容,並與有關的浴佛經典、史籍及敦煌所出同類文書作了比勘。聖凱《論唐代的講經儀軌》(《敦煌學輯刊》2001 年 2 期)利用園仁的記載及敦煌文書,討論了唐代講經法會的主要成員及其儀軌次第,尤其對“都講”進行了考察,提出佛教的都講并非來自儒家的都講制度,只是在翻譯時借用了這個名詞而已。譚蟬雪《喪祭與齋忌》(《敦煌學與中國史研究論集》)利用敦煌文獻,就儒佛在喪葬、祭祀、禮儀的發展變化作了考察。楊富學、王書慶《從敦煌文獻看道信禪法》(《敦煌學與中國史研究論集》,甘肅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對佛教中國化過程中,禪宗四祖道信的作用進行了探討。王邦維《敦煌寫本中一段有關印度佛教部派的材料——S. 5390 號校錄並跋》(《敦煌文獻論集》)認為,這一段有關佛教部派的材料,與可能是《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的文字抄在一起并不是偶然的,進一步證實了作者佛教的部派與律的傳承有關的一貫看法。湛如《論淨衆禪門與法照淨土思想的關聯——以大乘淨土贊為中心》(《敦煌文獻論集》)對敦煌佛教信仰層面的顯著特點——禪淨合一進行了探討,認為敦煌佛寺形態以禪律同住為主,而義學在一定時期則有禪淨融合的傾向。而彌陀與彌勒信仰在敦煌并存現象,則表明敦煌淨土信仰的多元化。(日)上山大峻著、顧紅、劉永增譯《從敦煌出土寫

本看敦煌佛教研究》(《敦煌研究》2001 年 4 期)以敦煌藏經洞出土的佛教文獻為依據,指出敦煌藏經洞佛教文獻對中古佛教研究的意義;介紹了敦煌佛教文獻研究的現狀,以及敦煌佛教文獻對佛教研究的啓示,特別論述了吐蕃統治時期,敦煌佛教的獨立發展及其意義。同時還指出了目前研究的不足和今後研究的方向。楊富學《西域敦煌回鶻佛教文獻研究百年回顧》(《敦煌研究》2001 年 3 期)以為西域、敦煌出土的為數相當豐富的古代回鶻語佛教文獻,是古代回鶻佛教研究的第一手、也是最為重要的資料,引起國際學術界的廣泛重視,涌現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填補了西域佛教史研究的許多空白,回鶻佛教文獻的研究,是 20 世紀西域佛教史研究中成果最為輝煌的領域。

在道教文獻整理研究方面,張澤洪《唐代〈道藏〉與敦煌道經》(《西南師範大學學報》2001 年 2 期)以敦煌道經寫本為中心,探討了唐代《道藏》的編纂與道經的撰寫及經法傳授等問題,認為在高宗時期唐代《道藏》已編纂成立。王卡《敦煌道經殘卷綴合與考訂三則》(《敦煌文獻論集》)將 IX. 2768 與 IX. 901 抄本綴合,又將 S. 9846+P. 2390 號抄本綴合,確定其年代,對 S. 6241 殘本定名提出質疑。萬毅《敦煌本道教〈升玄內教經〉的文本順序》(《敦煌文獻論集》)對《升玄內教經》敦煌寫卷與有關佚文進行了討論,並對文本的順序進行了排列。劉屹《〈內妙內篇〉考》對該道教經典在中古時期的演變作了探討。他的《敦煌本〈老子變化經〉研究之二》(《敦煌研究》2001 年 4 期)對已有的《變化經》成書時間成說提出質疑,認為《變化經》成書於南北朝末至隋代,而非漢代。關於道教科儀研究,王承文《古靈寶經與道教早期禮燈科儀和齋壇法式》(《敦煌研究》2001 年 3 期),探討了東晉末年古靈寶經中系統而完整的禮燈科儀和齋壇法式及其所體現的教義思想,並從南北朝到唐宋大量道教科儀書對該經的沿襲證明了古靈寶經對中古道教科儀發展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在景教、摩尼教、祆教等研究方面,顏廷亮《敦煌文化中的祆教、摩尼教、景教》(《敦煌學與中國史研究論集》)就著三種宗教在敦煌流傳的大致經過、敦煌文獻中保存的相關經典與有關記載及學術研究情況進行了探討。林悟殊《高楠氏藏景教〈序聽迷詩所經〉真偽存疑》(中華書局《文史》2001 年 2 輯)認為高楠順次郎所藏恐非敦煌真迹。他的《20 世紀敦煌漢文摩尼教寫本研究述評》(《敦煌學與中國史研究論集》)對 20 世紀敦煌漢文摩尼教寫本的研究狀況作料詳細的介紹,並對我國 21 世界漢文摩尼教經典的研究作出樂觀的瞻望。樂睿《交河塔林與密教東漸》(《敦煌研究》2001 年 1 期)探討了古代西域密教發展狀況及對密教東漸的影響。

歷史與地理

利用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唐五代歷史與地理,涉及歷史史實考辨,政治、軍事制度史,經濟史,歷史地理諸多方面。

勾沉考稽政治史實方面。程喜霖《吐魯番文書所見唐安西都護府與絲綢之路》,針對研究西北重大歷史問題,如安西都護府只使用歷史典籍記載,結論失之偏頗,採用“二重證據法”把正史與吐魯番文書相互印證,揭示了安西都護府的全貌。王素《敦煌莫高窟創建時間補說》(《敦煌文獻論集》)反對將《李君莫高窟佛龕碑》中的“初秦建元二年”直接對應於前秦苻堅建元二年(366)的傳統說法,通過分析前涼的外交政策與境內人心的向北,以及前涼張氏統治者與敦煌高門大族,在奉用西晉還是東晉的年號問題上的分歧,並舉考古發現所出文書為旁證,敦煌地區私奉東晉康帝年號(344 年),至於初秦二字則是後人不明真相想當然加上去的。李正宇《索助、張承奉更疊之際史實考》(《敦煌文獻論集》)對 P. 2569 號文書背面所載三首《兒郎偉》中關涉索助下臺、張承奉上臺當年歲末,敦煌官府驅灘儀式的專用歌詞進行了分析,考察了歸義軍政權更疊之際敦煌諸政事。《關於 P. 2539v 書狀主人公的再辨證》(《民族史研究》2001 年第 2 輯)通過對書狀主人公的考證,提出“涇州太傅”一首的致書人是朔方節度使韓澄,從而揭示了後唐明宗之際靈武、涇州地方權力的轉移及五代朝廷經營問題。關於中晚唐大事記文書研究,盛朝輝《敦煌寫本 P. 2506、2810 (a)、2810 (b)、4073、2380 之研究》(《敦煌研究》2001 年 4 期)通過對五件文書錄文、研究,認為背面可以完全拼接,實為唐開元、貞元間的“大事記”,具有較高的歷史價值。

政治思想、政治、法律、軍事制度研究。陸離《敦煌本〈百行章〉所反映的唐初統治思想》(《敦煌研究》2001 年 2 期) 主要結合史籍中有關貞觀年間唐太宗君臣論治的記載, 探討了敦煌本《百行章》所反映的唐初統治思想。雷聞《俄藏敦煌 dx.06521 殘卷考釋》(《敦煌學輯刊》2001 年 1 期) 對殘卷的內容、性質及擬名問題做了探討, 認為俄藏 dx.06521 文書中包含著一道開元二十五年的《考課令》、一條同年的《戶部格》以及一條可能是開元二十八年的敕, 其內容都是關於朝集制度的。初步斷定它可能是開元二十五年刪定律令格式同時編纂的《格式律令事類》之斷簡。由於該書散逸已久, 長期以來被學術界忽視, 但在中國古代法律史上有獨特的地位, 它不僅是唐代律令格式體系向宋代敕令格式體系轉變的一個重要過渡, 而且在體例上, 開啓了宋代法典編纂形式的先河, 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而本件敦煌文書的發現, 為我們認識此書提供了極為寶貴的第一手材料。戴建國《唐“天寶律令式”說獻疑》(《法律史論集》第 3 卷, 法律出版社, 2001 年版) 認為, 唐天寶時僅制定過《天寶格》, 沒有刊修過天寶律令式。P. 2504 號文書所存乃是天寶時期依據目前尚不能確知的文獻及當時的新規定所作的部分節錄。節錄者態度馬虎, 其間的某些錯訛可能是此殘卷所據底本本身就存在問題, 故不大可能是書於官司廳壁的律令格式的直接錄文。李方《西州諸縣及敦煌縣屬機構“司”(曹) 探討》(《敦煌文獻論集》) 指出西州諸縣及敦煌縣除設有傳世典籍與出土文書中明確記載的司法、司戶二曹外, 還有司兵機構存在, 這一點與典籍記載不合。該文還論述了縣尉分判諸司及縣諸司佐史的工作問題。該氏《唐西州政府機構的點檢制度與值班制度》(《敦煌學與中國史研究論集》) 對西州地方點檢制度、上班制度, 政府執掌點檢上值事務的部門和官員等問題進行了探討。馮培紅《敦煌文獻中的職官史料與唐五代藩鎮管制研究》(《敦煌研究》2001 年第 3 期) 以唐五代藩鎮時期的敦煌職官史料為依據, 結合唐制, 闡述了敦煌文獻中職官史料對於唐五代藩鎮官職研究的價值。杜正乾《唐病坊表徵》(《敦煌研究》2001 年 1 期) 結合敦煌文獻對唐代病坊設置時間、職掌、淵源與佛教的關係等問題進行了探討。陳國燦《莫高窟北區第 47 窟新出唐告身文書研究》(《敦煌研究》2001 年 3 期) 將新出 5 件唐代告身文書中的 4 片綴合, 復原成《唐景龍二年口文楚陪戎校尉告身》, 另一片確定為《景龍年以後口文楚告身》。由此確定 B47 窟為唐口文楚瘞窟, 二告身乃其附葬品。孟憲實《麴氏高昌追贈制度初探》(《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五卷) 鑒於史書記載對高昌官僚制度水平估計過低, 探討了高昌的追贈制度, 認為作為一種政治制度, 高昌的追贈已經納入了官僚升遷銓選序列之中。高昌的追贈制度發揮著維護現存社會等級的功能。趙貞《歸義軍押衙兼職他官略考》(《敦煌研究》2001 年 2 期) 對歸義軍押衙兼職他官的史實進行了梳理。

經濟史研究涉及到土地制度與經營形式、契約、戶籍等方面。在土地制度與經營形式方面, 馮培紅《唐五代敦煌的營田與營田使考》(《蘭州大學學報》2001 年 4 期) 一文, 分唐代前期、吐蕃占領時期、歸義軍時期三個階段, 對該地營田制度、營田使職官體系在各個歷史時期的演變發展, 以及不同時期營田的性質進行了考述。張德芳《從懸泉漢簡看兩漢西域屯田及其意義》(《敦煌研究》2001 年 3 期) 利用新出土的懸泉漢簡, 結合文獻考察了兩漢西域屯田, 認為它不僅在當時發揮了重大作用, 而且對後世有多方面的借鑒意義。楊際平《論唐末五代宋初敦煌地權的集中與分散》(《敦煌學與中國史研究論集》, 甘肅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對敦煌文書中相關資料進行了統計分析, 認為唐末五代宋初敦煌地區的土地兼井形勢確比以前嚴重, 但大土地所有制並未占據絕對支配地位。朱雷《吐魯番出土唐“勘田簿”殘卷中所見西州推行“均田制”之初始》(《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 18 輯, 武漢大學三至九世紀研究所編) 仔細考察了數件“勘田簿”, 推論其製作目的即為施行“均田制”做最為必要的前期準備。換言之, 該“勘田簿”是唐平高昌後, 為瞭解西州高昌縣民各戶實際占有土地狀況以推行均田制而作的。關於敦煌地區契約的研究, 羅彤華《從便物曆論敦煌寺院的放貸》(《敦煌文獻論集》) 探討了敦煌便物曆的形式與性質、便物曆所反映的便物人與寺院放貸、借貸數量與寺院放貸、借貸利率與寺院放貸等問題。馬德《浙藏敦煌文獻〈子年金光明寺破曆〉考略》(《敦煌研究》2001 年 3 期) 以為浙敦 116 號文書記錄了五代時期金光明寺有關窟頭供養、修佛堂等專案的各種支出, 提供了有關莫高窟赤安窟、工匠雇價等方面的新資料, 以及敦煌金光明寺與莫高窟關係的新證據。陳國燦《莫高窟北區第 47 窟新出唐〈貸錢折糧還納帳〉的性質》(《敦煌研究》2001 年 4

期)將莫高窟北區第 47 窟新出四件殘卷連為一體,推斷其為“貸錢折糧還納帳”,其書寫年代極可能在開元六年(718)至開元十六年(728)之間。楊森《〈辛巳年六月十六日社人於燈司倉貸粟曆〉文書之定年》(《敦煌學輯刊》2001 年 2 期)認為曆書中“辛巳年”為“咸通二年”與情理相合。陳國燦《莫高窟北區新發現的兩件唐戶籍殘片》(《敦煌學與中國史研究論集》)對新發現的兩件殘片作了考察,確定 B47 窟所出戶籍為唐代早期戶籍,B49 窟所出戶籍為大足元年(710)戶籍。

敦煌地區產業的研究涉及了農業、牧業、種植業、商業、手工業等方面。宋家鈺《敦煌文獻所見唐代農業生產》(《敦煌文獻論集》),根據敦煌文書推算唐代每戶農民大約平均實種四五十畝土地,作物結構也有較大的改變,麥的價值遠高於粟。作者還指出唐代畝產量大大超過前代,在北方土地較好地區達兩石左右,差的地區畝產量也在一石至一石半之間。也小紅《唐五代敦煌牧羊業述論》(《敦煌研究》2001 年 1 期)對敦煌地區牧羊業的經營形式、羊在社會生活中的用途、牧子向羊司納稅等問題做了探討。王艷明《從出土文書看中古時期吐魯番地區的蔬菜種植》(《敦煌研究》2001 年 2 期)主要依據吐魯番出土文書,對中古時期吐魯番地區蔬菜種植規模、菜園屬性、蔬菜種類以及蔬菜加工、銷售等問題進行了討論。馮培紅《唐五代敦煌的酒行、酒戶和酒司》(《青海社會科學》2001 年 3 期)認為,唐前期粟特人壟斷了敦煌的釀酒業及銷售市場,並組成了行業性機構酒行。吐蕃占領期間佛寺中首先出現了從事釀酒業特殊寺戶。歸義軍時期既在官府中設置酒司機構,又在寺院中繼續從事釀酒,有官酒戶與寺院酒戶之分。

關於歷史地理,研究論著涉及敦煌地理的沿革、交通、地志與地圖學發展等方面。李并成《漢唐冥水(籍端水)冥澤及其變遷考》(《敦煌研究》2001 年 2 期)從實地考察並結合有關文獻,對冥水、冥澤其流向、位置及其歷史變遷狀況作了新的探討,指出《中國歷史地圖集》所標冥澤的位置不妥,故冥澤的應位於截山子南麓山前一帶的寬廣的湖泊沼澤地帶。他的《漢玉門關新考》(《敦煌文獻論集》)就玉門關址的變遷進行了探討,指出漢武帝元封四年始築的玉門關應是今嘉峪關市區西北約 10 公里處的石關峽。至太初二年或三、四年玉門關西遷至敦煌郡西北,其原址改置障城,名玉石障。五代宋初此處又重新設關,將玉門關返回到最早的關址石關峽,西夏占領整個河西走廊後,玉門關才從史籍中消失。侯燦《魏晉西域長史治樓蘭實證》(《敦煌研究》2001 年 4 期)利用考古文物、文獻,論證樓蘭城址即史書上所說的西域長史的治所。劉興義《漢晉表是縣和唐鎖陽城探原》(《敦煌學輯刊》2001 年 2 期)綜合文獻資料與考古遺址,以為兩漢時期酒泉郡表是縣城即今明海子古城。光和中地震後縣城遂毀,又於今高臺縣駱駝城遺址上修建新縣城。同時還劃定了表是縣的四至範圍。關於唐鎖陽城作者針對前人的成說提出自己的看法,以為創建的確切年代在 581—583 年間,隋代的玉門關在鎖陽城東,後魏瓜州晉昌郡與唐晉昌郡不是一地,鎖陽城不是官築的苦峪城。馬德《敦煌〈五臺山圖〉中的道路交通簡論》(《敦煌學與中國史研究論集》,甘肅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參照《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園仁所記出入路線,進一步探討了敦煌壁畫《五臺山圖》中表現的交通路線及與交通工具等問題。倉修良、陳仰光《從敦煌圖經殘卷看隋唐五代圖經的發展》(《文史》中華書局 2001 年 2 輯)利用敦煌文書中的《沙州伊州地志》和《沙州都督府圖經》探討了隋唐時期圖經發展的狀況。王宗維《漢代絲綢之路的咽喉——河西路》(昆侖出版社,2001 年版)詳細介紹了漢政府開闢河西路的經過,以及保維和建設這個交通通道所採取的種種措施及取得的成就。該著下編又用相當地篇幅論述了絲綢之路上的重鎮敦煌。

古籍

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對敦煌保存下來的古代典籍與唐代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張玉春《敦煌莫高窟藏〈史記〉唐寫本考》(《敦煌研究》2001 年 2 期)認為現存唐寫本《史記》,以原敦煌莫高窟所藏三卷殘本為最早,它反應了《史記》在唐代的寫本狀況,以此三卷殘本為依據,可以訂正宋代以後刻本的訛誤,並對探究《史記》原貌有重要作用。陸離《俄藏敦煌寫本〈春秋后語〉殘卷探識》(《文獻》2001 年 2 期)從俄藏敦煌文獻中新檢出四號《春秋后語》殘卷(Дх. 02663、02724、05341、05784),考證其為 S. 713 的前半部分。張娜麗《敦煌本〈六字千文〉初探析疑》

(《敦煌研究》2001 年 3 期) 以為敦煌寫本《新合六字千字文》為世傳《千字文》本基礎上新增二字而成。該文還根據敦煌千字文注本及在日本流傳的千字文諸本，對新增二字的來源等問題作了考證，對邵惠莉所錄的《六字千字文》(S. 5961)、《千字文》(S. 3835) 本的誤錄、未錄部分作了校補。屈直敏《敦煌本〈兔園策府〉考辨》(《敦煌研究》2001 年 3 期) 對《兔園策府》的作者、成書年代重新考訂，認為有可能是出自衆人之手，成文時間最晚不遲于貞觀十七年(642)。

社會與文化

因為敦煌文書自身的特點，社會與文化是敦煌研究的重要內容，本年度研究主要涉及科舉與社會、中古時期家族、基層社會組織、禮儀、衣食住行、風俗、體育等諸多方面。姜伯勤《敦煌科舉文書的社會功能——兼論敦煌寫本中的社會史料》(《中山大學學報》2001 年 3 期) 將敦煌社會史料中有關科舉制的文書分為兩組，一組是直接記載了科舉制度及其風俗的史料，另一組是科舉教育史料或進士文學史料。認為敦煌所出的一切儒學經書實際上都是科舉教育用書，一些詩賦文章則是啓發士子準備科舉考試的進士文學，并以敦煌科舉制和禮儀文書史料的發掘為例，討論了根據文書在當時社會中的功能而拓寬史料範圍的問題。張國剛《唐代家庭與家族關係的一個考察——一份敦煌分家析產文書的學習札記》(張國剛主編《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三卷，中華書局，2001 年版) 利用敦煌文書探討了唐時分家析產後的“同居共活”現象，認為中古時期的大家和小家具有一種似分似合、亦分亦合的特殊關係，其具體表現為兩者在經濟與社會生活上有密切聯繫。孟憲實《敦煌社邑的分佈》(《敦煌文獻論集》) 對敦煌社會基層組織社邑的社會分布和空間分布進行了認真分析，指出在唐代後期到宋初這段時間里，敦煌的民間結社是普遍、成熟和有影響的。郝春文《〈敦煌社邑文書輯校〉補遺(三)》(《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01 年 4 期) 則是對以前成果的經一步補充。

吳麗娛利用敦煌本書儀研究唐代社會禮儀發表了多篇論文。《從敦煌書儀的表箋狀啓看唐五代官場禮儀的轉移變遷》(張國剛主編《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三卷) 通過對晚唐五代敦煌書儀中箋表(致皇帝)到啓狀(官吏間使用)數量的變化，及箋表形式內容的下移與普及情況的分析，論證了藩鎮體制多元化政治結構下，官僚社會的禮儀所發生的下僭于上、地方等同中央的變遷與轉移，認為這是唐朝禮儀發展中一個十分引人注意的現象。《關於 S. 078V 和 S. 1275V 兩件敦煌寫本書儀的一些看法》(《敦煌學與中國史研究論集》) 對 S. 078V 和 S. 1275V 兩件敦煌寫本書儀所涉及史事和年代提出新的看法，并討論了晚唐五代官場應酬書儀的擴大及相關類型與製作問題。《關於〈朋友書儀〉的再考察》(《中國史研究》2001 年 1 期) 對《朋友書儀》的內容組成及月賀儀的發展，《朋友書儀》的兩種文體、存在的複書痕迹、產生地區與年代問題重新進行探討，認為《朋友書儀》產生於開天以後的邊塞地區，是一件經過加工改造的書儀。它基本上繼承月儀文學形式的同時，增加了適應地方的新內容，從而使其製作角色、使用物件完全有別于當時流傳的其他書儀，是中原文化與西北邊塞特色成功結合的產物。《P. 3637〈新定書儀鏡〉中喪服圖的年代質疑》(《中華文史論叢》第 65 輯)、《敦煌寫本書儀中的喪服圖與唐禮》(《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 1 集) 兩文比較敦煌杜友晉撰《新定書儀鏡》內外夫三幅喪服圖中服制與開元禮的多處不同，論證了喪服圖的年代及其與晚唐五代變禮的根源，并借助喪服圖研討唐五代喪服變禮的趨勢，提出唐前期經貞觀、顯慶、開元禮的修訂，對古士庶喪服禮則作了重大的修改，從而在喪服方面建成了具有唐代特色的一代新典。唐後期五代繼續沿此發展，但過分違背了古禮原則，故宋初又基本回歸開元禮，完成了中古喪服制的變革。史睿《敦煌吉凶書儀與東晉南朝禮俗》(《敦煌文獻論集》) 從吉凶書儀的起源、書儀中的稱謂、儀式等方面論證其與東晉南朝禮俗的關係，認為敦煌吉凶書儀是繼承了東晉南朝禮學、書儀與家訓發展的成果。李正宇《安徽省博物館藏敦煌遺書〈二娘子家書〉》(《敦煌研究》2001 年 3 期) 對 1951 年安徽省博物館自許承堯家徵集收藏的《二娘子家書》重新作了考訂，以為該件是宋太平興國五年(980)六月二十一日寫本，并揭示其價值意義，兼對所謂“婦女手迹”提出否定看法，認為當是敦煌文士代書者。

黃正建《敦煌占卜文書與唐五代占卜研究》(學苑出版社, 2001 年版)是一部利用敦煌占卜文書研究唐五代占卜的著作。該書全面整理了敦煌占卜文書,運用占卜知識將其分為十三類,糾正了以往許多錯誤定名、不當拼接。作者具體分析了敦煌占卜文書所具有的特點及唐五代占卜的實況,又將占卜放在唐宋變革的總體發展中進行研究,分析了國家對占卜控制的減弱、占卜在民間的普及和占卜者地位下降等現象及其意義。鄧文寬《敦煌本〈唐乾符四年丁酉歲(877 年)具注曆日〉“雜占”補錄》對具注曆日中的占卜問題進行了具體探討。

高啓安《從莫高窟壁畫看唐五代敦煌人的坐具和飲食坐姿》(上、下,《敦煌研究》2001 年 3、4 期)以為敦煌地區傳統的坐具無論其功能和造型均有分化,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有發展和創新。飲食坐姿與坐具、食床的變化相適應,主要有跪坐、胡坐和垂腿坐。党燕妮、翁紅濤《從吐魯番出土隨葬衣物疏看民間宗教觀念的變化》(《敦煌學輯刊》2001 年 1 期)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衣物疏、功德疏排比分析,闡述了自前秦建元二十年至咸亨五年共 290 年間高昌地區社會習俗和宗教觀念的變化。陳麗萍《關於新疆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地區出土的伏羲、女媧畫像及一些問題的探討》(《敦煌學輯刊》2001 年 1 期)關於伏羲、女媧在不同歷史時期之身體造型、服飾變動以及有關二人存在的歷史淵源問題進行了詳細論述,認為吐魯番地區的畫像從曲氏高昌至唐初延續了數百年。這一文化現象從時間和空間上都廣為流傳,是因其作為一種民族心理已根植於人們心中。姜伯勤《敦煌莫高窟隋代供養人胡服服飾研究》(《敦煌文獻論集》)將莫高窟隋代供養人胡服服飾與烏茲別克斯坦巴拉雷克捷佩等地壁畫中的圖像進行比較研究,探尋了其間的歷史聯繫及敦煌與中亞地區頻繁的文化交流狀況。譚蟬雪《唐宋敦煌歲時佛俗——二月至七月》(《敦煌研究》2001 年 1 期)、《唐宋敦煌歲時佛俗——八月至十二月》(《敦煌研究》2001 年 2 期)分析了唐宋時期敦煌二——十二月歲時活動中佛俗的具體情況。李金梅等《敦煌古代百戲考述》(《敦煌研究》2001 年 1 期)對百戲進行了研究,試圖探討古代百戲與現代競技體育之間的演變關係。李金梅等《敦煌角抵考》(《敦煌學與中國史研究論集》)考察了角抵演變的軌跡和它遷移的情況。李重申等《敦煌石室氣功鈎沉》(《敦煌學輯刊》2001 年 2 期)從敦煌莫高窟所存氣功資料分析了氣功的功理和功法,以及養生價值。

語言與文學

關於敦煌語言文字研究,張涌泉著《漢語俗字叢考》(中華書局,2001 年版)是該氏繼《漢語俗字研究》、《敦煌俗字研究》、《敦煌俗字研究導論》之後又一俗字研究新著,充分運用和吸收了古代字書典籍和敦煌文獻中的俗字。曾良著《敦煌文獻字義通釋》(廈門大學出版社,2001 年版)以整個敦煌文獻為主要物件,對其中的一些詞語和俗字、訛字作了梳理、考證。作者收集敦煌本身材料同時又盡可能選一些同時代的其他文獻材料為佐證。內容大致包括三個方面:一是釋字面普通但語意晦澀的言語,二是釋俗字訛字,三是釋文化詞語。楊森《關於敦煌文獻中的“平章”一詞》(《敦煌學與中國史研究論集》)對敦煌文獻中“平章”一詞的發展和演化過程進行了討論。汪泛舟《敦煌俗別字補正》(《敦煌研究》2001 年 4 期)列舉敦煌僧詩、蒙書、願文等文書中的部分俗別字,對敦煌俗別字作了一些補正。張金泉《莫高窟新出土的古韻書〈排字韻〉》(《敦煌研究》2001 年 1 期)將《排字韻》與《廣韻》等比勘,認為當是唐五代以後的韻書,《排字韻》殘存二葉 52 行,分韻依稀 106 部,是《廣韻》略本之一種,并以《廣韻》做了補校。Kahar Barat, *Two Identical Feature in the Hexi Dialect* (載《敦煌學與中國史研究論集》)對唐宋時期的西北方音進行了探討。

在敦煌文學中,變文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有關方面的研究有:岡野誠《論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唐律殘片》(《敦煌文獻論集》)首先介紹了中田氏發現的《職制律殘片》以及有關調查研究的進展情況。在此基礎上作者討論了麗字 85 號和霜字 89 號兩個斷卷在變文研究方面的價值。劉瑞明《〈孔子項托相問書〉再校議》(《敦煌學輯刊》2001 年 1 期)認為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中,“初來花下”、“州縣分明置廟堂”等句校注不妥,因而再次進行了校議。陳明娥《敦煌變文雙音新詞全面透視》(《敦煌研究》2001 年 3 期)對所提取的變文雙音詞進行了歷時分類,然後從形式和語義、共時和歷時等多個側面對雙音詞的組合、聚合特點進行了考察,

展示了變文雙音新詞的突出特色和運動軌迹。李小榮《敦煌變文‘平’、‘側’、‘斷’諸音聲符號探析》(《敦煌學輯刊》2001 年 2 期)通過對“三位七聲”、“聲有八疇”、“五會念佛”之音樂含義的具體探討,揭示了敦煌變文講唱辭之音聲標志“平”、“側”、“斷”等的性質所在。王宗祥《敦煌變文斷代研究劄記二則》(《敦煌研究》2001 年 1 期)認為敦煌變文中的《破魔變文》作於曹元忠時代,即五代宋初,而《韓擒虎話本》是宋代話本。袁書會《也談變文的消失》(《敦煌研究》2001 年 2 期)認為變文的消失不僅僅是外因所致,也在于其藝術內在因素的發展不能滿足時代的需要,從而在唐以後它漸漸成爲一種沒落的藝術。于淑健《〈黃仕強傳〉校注商補》對柴劍虹的校注不妥之處作了商榷補充。《敦煌文獻論集》收錄有兩篇有關變文研究的英文論文。Crossland-Guo Shuyun, *Verse-introductory Formulas in Bianwen: An Implication of Immediacy in Oral-derived Traditional Text*; Matthew T. Kapstein, *A Dunhuang Tibetan Summary of the Transformation Text on Mulian Saving His Mother From Hell*.

有關敦煌詩詞、賦、小說和講唱文學研究,楊曉藹《勘正辨疑 隨文釋義——〈敦煌邊塞詩歌校注〉簡評》(《敦煌學輯刊》2001 年 1 期)對這一地域文學輯校本作了評介。該氏《從敦煌歌辭中的男兒形像看唐代人物藻趣尚》(《敦煌研究》2001 年 4 期)選取敦煌歌辭所展示的女子情感世界的一個側面,揭示了唐代品藻人物看重英雄氣度、傾慕俠士風流、追求俊美容貌的特點。伏俊璉《敦煌本〈醜婦賦〉與醜婦文學》(《敦煌研究》2001 年 2 期)認為敦煌本《醜婦賦》是一篇淋漓盡致地描寫醜婦地作品。醜婦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雖不能與美人文學相比,但仍然不絕於縷,讀者面對醜婦,所產生的是一種新奇的有趣感。他的《20 世紀的敦煌小說研究》(《敦煌文獻論集》)則對 20 世紀的敦煌小說研究進行了回顧與總結。程毅中《再論敦煌俗賦的淵源》(《敦煌文獻論集》)對俗賦的起源進行了探討,進一步證實了作者認為賦產生于佛教題材的變文之前的觀點。府憲展《〈赤須將軍歌〉初探》(《敦煌文獻論集》)認為俄藏本《赤須將軍歌》可能就是玄宗盛唐天寶十四年載以前的寫本,世俗題材的俗講在開元、天寶時期已經流行。張鴻勳《敦煌文學雜考三則》(《敦煌學與中國古代史研究》)對敦煌賦中的掌故作了考索,又指出《季布罵陣詞文》是宋以前我國最長的敘事詩。孫福喜《論敦煌唐寫本〈鶻冠子〉》(《敦煌研究》2000 年 4 期),認為民國年間傅增湘介紹的唐寫本《鶻冠子》殘卷和 1987 年何鳳奇、王洪生所述的齊齊哈爾市圖書館藏唐寫本《鶻冠子》殘卷是偽作。

在敦煌文學中,緣起是一種類似講經文,但又與之不完全相同的文體,張錫厚《讀敦煌緣起類作品及其他》(《敦煌學與中國古代史研究論集》)分四部分對敦煌緣起類作品進行了探討,首先對敦煌緣起正名,將緣起與講經文的相似與不同作了較確切的說明;其次,詳細分析了幾種緣起類作品的特點;再次探討了敦煌押座文的文體特徵;最後討論了解座文的性質與特徵。

關於佛教與文學發展關係研究方面,周廣榮《敦煌〈悉曇經〉歌辭源流考略》(《敦煌研究》2001 年 1 期)從《悉曇經》傳播的角度對這些歌辭的源流、內容、性質以及形式做了進一步考察。車錫倫《中國寶卷的淵源》(《敦煌研究》2001 年 2 期)提出與前人不同的看法,認為佛教的俗講是中國寶卷的淵源。在宋代佛教信徒的法會道場、結社念經活動中產生了寶卷,它繼承了佛教俗講的傳統,同南宋時期勾欄瓦子中出現的說唱技藝“談經”等無關。張鴻勳《敦煌本〈觀音證驗賦〉與敦煌觀音信仰》(《敦煌文獻論集》)認為《觀音證驗賦》文學價值并不高,但作爲一篇千年前印度佛教植入中土以後,歷經數百年的磨合,與中國本土文化相交融產生出來的鋪陳佛經“應驗”的賦文,却不失爲瞭解當時觀音信仰及佛教文學的極好材料。邵文實《敦煌佛教文學與邊塞文學》(《敦煌學輯刊》2001 年 2 期)論述了敦煌佛教文學與邊塞文學的關係,并對兩者相關聯的原因作了探討。陳自力《從陸機〈百年歌〉到敦煌《九想觀》詩》(《敦煌研究》2001 年 3 期)通過陸機《百年歌》與敦煌《百歲篇》、《九想歌》詩內容的分析,說明佛教傳入中國後,利用中國原有的思想材料和文學形式,將其改造成爲誘導俗衆皈依佛教的工具,結果導致佛教及其文學作品逐漸走上中國化道路。

關於作者生平研究,徐俊波《王梵志生活年代考》(《敦煌研究》2001 年 4 期)從王梵志詩集中反映生活狀況及現實社會的詩作,以詩證史、詩史互證,認為王梵志生活年代約爲 617 至 697 年之間。

藝術

關於敦煌藝術，研究內容主要有舞蹈、佛教造像以及石窟藝術風格之間的傳承、各種佛教體裁內容的石窟壁畫等方面。

關於敦煌舞蹈藝術研究，金秋《尋找敦煌舞蹈的源頭》(《敦煌研究》2001 年 2 期)認為敦煌舞蹈雖歸屬於中國古典舞系統中，但它洋溢著與中原漢民族舞蹈不同的異國情調，它是幾千年來中西樂舞文化交流的結晶。謝生保《敦煌飛天形體姿態的來源》(《敦煌研究》2001 年 4 期)在前人論述的基礎上，對敦煌飛天形體姿態來自百戲雜技、月伎舞蹈、武術體育、猛獸飛禽的觀點，列舉大量實例進一步論證探討。相關著作有邵建群《敦煌飛天研究》(安徽美術出版社，2001 年版)，鄭汝中《中國飛天藝術》(安徽美術出版社，2001 年版)。

關於佛教造像藝術，以及石窟藝術風格之間的傳承與影響的探討，謝成水《唐代佛教造像理想美的形成》(《敦煌研究》2001 年 3 期)考察了魏晉至唐佛教造像藝術的形成與演變，認為唐代佛教造像集中了男性特徵、女性特徵和孩童特徵，這種藝術表現手法圓滿地完成了對佛教的理想美的塑造，在世界藝術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孫修身《敦煌莫高窟佛教藝術簡介》(《敦煌學與中國史研究論集》)簡要而系統地介紹了敦煌佛教藝術的起因及歷史時期的變化情況。鄭勳硯《莫高窟‘得眼林’壁畫的藝術成就》(《敦煌研究》2001 年 3 期)通過對莫高窟“得眼林”壁畫時代、內容及西魏、北周壁畫風格的分析，從兩晉南北朝的繪畫美學思想入手，對“得眼林”壁畫的置陣布陣、形神刻畫及藝術風格方面做了論述。胡同慶《論莫高窟中唐時期經變畫的模仿性》(《敦煌學與中國史研究論集》)以為在探討敦煌佛教藝術過程中，在注重佛教藝術想像力同時，也應注意到人類的模仿本能是推動敦煌佛教藝術的強大動力。(日)齋藤理惠子著、賀小萍譯《敦煌第 249 窟天井中國圖像內涵的變化》(《敦煌研究》2001 年 2 期)以敦煌第 249 窟天井西坡的須彌山圖為中心，描述、分析、考證了與佛教不同的中國式圖像是如何融彙到佛教美術中的。余義虎《論敦煌西魏石窟佛教藝術的多元化特徵》(《敦煌研究》2001 年 4 期)以西魏時期建造的第 249、285 窟為切入點，展示佛教石窟從洞庭建築、塑像、壁畫逐步中國化過程等方面，探討了敦煌佛教藝術的多元化特徵。王恒《〈魏書·釋老志〉與雲崗石窟》(《敦煌研究》2001 年 3 期)通過雲崗石窟與《魏書·釋老志》相互印證，進一步探討了佛教藝術中國化問題。(日)宮治昭著、趙莉譯《絲綢之路沿綫佛教藝術的發展與演變》(《敦煌研究》2001 年 3 期)探討了佛教故事在印度的起源與發展，以及這一體裁由犍陀羅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的過程。佛教藝術造像也隨之東傳，並逐步被當地發展演變，尤其在中國更是進一步得道創新與發展。朱悅梅《大黑天像初探》(《敦煌研究》2001 年 4 期)論述了大黑天像在中國境內的流布情況與特點，並探討了敦煌、西藏、大理等地天黑造像之間的關係。李明偉《從法隆寺寶物看敦煌遺書的影響》(《敦煌研究》2001 年 4 期)以日本法隆寺所藏蜀江錦、仿波斯錦、法隆寺金堂玉蟲厨子漆繪和金堂壁畫 20 幅飛天圖，與絲路出土的絲綢、莫高窟及榆林窟壁畫的對比，探討了敦煌遺書和絲路文化對日本佛教藝術的影響。(美)赫爾穆特 F. 諾伊曼著、魏文捷譯《西藏西部壁畫風格探析》(《敦煌學輯刊》2001 年 1 期)對 11 世紀至 16 世紀西藏西部壁畫藝術的發展輪廓作了簡要的概述，探討了它們與西藏中部地區同時期壁畫藝術的不同風格。

有關各種佛教體裁內容的石窟壁畫研究，沙武田《S. P. 76〈觀無量壽經變稿〉析——敦煌壁畫底稿研究之五》(《敦煌研究》2001 年 2 期)認為 S. P. 76 白描稿其中的兩小部分是敦煌壁畫底稿《觀無量壽經變稿》，並認為應是莫高窟第 55 窟《觀無量壽經變稿》的壁畫底稿。謝繼勝《敦煌莫高窟第 465 窟壁畫雙身圖像辨識》(《敦煌研究》2001 年 3 期)以為該窟壁畫中的個別雙身圖像不見於傳統的藏傳佛教造像體系，作者根據謝稚柳先生《敦煌藝術敘錄》的藏文記音和藏傳佛教造像學描述，對壁畫中雙身像進行了初步辨識。王惠民《敦煌西方淨土信仰與淨土圖像研究史》(《敦煌研究》2001 年 3 期)比較全面地介紹了敦煌西方淨土信仰的基本資料和研究史。王惠民《白衣佛小考》(《敦煌研究》2001 年 4 期)認為敦煌壁畫中的白衣佛是彌勒的一種瑞相，它的出現與末法思想有關。北朝至隋唐時期曾流行崇尚白色的彌勒信仰，彌勒教匪利用了這一信仰，曾多次發動起義。這顯示了佛教信仰的民間化。殷光明《敦煌盧舍那法界圖像

研究之一》(《敦煌研究》2001 年 4 期) 敘述了敦煌盧舍那佛像的分布, 探討了敦煌盧舍那佛法界圖像的內容及義理、藝術特點等。郭俊葉《敦煌火珠圖像探微》(《敦煌研究》2001 年 4 期) 就敦煌壁畫、佛經文獻等火珠圖進行了考證, 並闡述了火珠圖像的作用及其象徵意義。張元林《莫高窟第 275 窟故事畫與主尊造像關係新探》(《敦煌研究》2001 年 4 期) 通過對幾部重要的漢譯彌勒經典內容的分析, 並結合有關造像實例, 認為第 275 窟南、北壁上所繪的佛教故事畫分別借用了釋迦牟尼的佛傳和本生來表現彌勒的今生傳記和前世事跡的, 並認為它們也與當時彌勒信仰中的傳法思想有關。殷光明《從〈祇園精舍圖〉到〈勞度叉鬥聖變〉的主題轉變與佛道之爭》(《敦煌研究》2001 年 2 期) 認為隨著印度佛教藝術的進程, 這一題材經歷了一個從印度的《祇園精舍圖》到中國的《勞度叉鬥聖變》的主體轉變過程, 它的出現、發展到成熟與中國歷史上的佛道之爭有關。劉永增《柏孜柯里克第 32 窟誓願圖簡述》(《敦煌研究》2001 年 1 期) 根據日本平野真完的研究成果, 介紹誓願圖是根據《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藥事》卷 24 所畫的, 並列舉了梵漢藏諸譯文。他的《〈賢愚經〉的集成年代與敦煌莫高窟第 275 窟的開鑿》(《敦煌研究》2001 年 4 期) 推論《賢愚經》集成於公元 435 年之前, 並由此分析第 275 窟是此件《賢愚經》自高昌傳往涼州途徑敦煌時所鑿。謝生保《從〈睽子經變〉看佛教藝術中的孝道思想》(《敦煌研究》2001 年 2 期) 論述了南北朝時期儒、釋、道之間既鬥爭又吸收的經歷和佛教藝術中忠君孝道思想的發展。李振甫《論香港志蓮淨苑佛教傳統新壁畫的藝術成就》(《敦煌研究》2001 年 2 期) 通過介紹與香港志蓮淨苑合作共同創造新壁畫《西方淨土變》的情況, 探討了有關敦煌壁畫的借鑒、豐富、完整與如何創新的問題。

另外這一年度敦煌雕塑藝術與山水畫圖的研究尚有段文杰編《中國石窟雕塑全集》第 1 卷《敦煌》(重慶出版社, 2001 年版), 王伯敏著《敦煌壁畫山水研究》(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2001 年版)。

考古與文物保護

本年度吐魯番地區考古方面,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4 月出版了王炳華著《訪古吐魯番》。關於黑水城出土文物研究, 孫昌盛《黑水城出土頂髻尊勝佛母曼荼羅木板畫考》(《敦煌研究》2001 年 2 期) 認為, 木板畫是西夏晚期依據藏傳佛教經典《聖頂髻尊勝佛母成就法》繪製的, 其人物造型、裝飾等具有典型的藏傳密宗風格。

敦煌考古涉及到對莫高窟遺址、敦煌藏經洞出土繪畫、石窟壁畫變遷等方面的研究。沙武田《莫高窟前殿堂建築遺址述論》(《敦煌學與中國史研究論集》) 在前人基礎之上, 對莫高窟前殿堂建築遺址作了綜合研究, 並探討了與之相關的問題。王明珍《敦煌 P. 4518 佛畫的年代及相關問題芻議》(《敦煌研究》2001 年 1 期) 根據敦煌文獻、絹畫等材料, 對 P. 4518 的 39 件佛畫的繪製年代做了初步探討, 並對其包捆、入藏及相關問題進行了探討。(英) 韋陀著、魏文捷譯《大英圖書館東方部收藏品中四件未公佈過的敦煌繪畫作品》(《敦煌研究》2001 年 2 期) 就大英圖書館以前未登記、發表過的四幅佛教麻布畫作品進行了相關的探討。樊錦詩、蔡偉唐《奧登堡考察隊拍攝的莫高窟歷史照片——〈俄藏敦煌藝術品〉第 3 卷序言》(《敦煌研究》2001 年 1 期) 介紹, 由於種種原因今天莫高窟的外貌以及窟內壁畫、彩塑已有較大的變化, 或不存或毀壞, 對此, 1914 年奧登堡考察隊拍攝的大量莫高窟歷史照片為我們提供了極其有價值的資料。王明珠《定西地區博物館藏長柄銅香爐——兼談敦煌壁畫中的長柄香爐》(《敦煌研究》2001 年 1 期) 將館藏長柄銅香爐與敦煌壁畫中的長柄香爐做了對比, 又據敦煌文獻定名, 並探討這種香爐在古代是普遍使用的一種供養具。

關於石窟壁畫表現形式的研究, (美) 胡素馨《模式的形成——粉本在寺院壁畫構圖中的應用》(《敦煌研究》2001 年 4 期) 在對藏經洞出土的壁畫粉本研究基礎上, 指出粉本製作方法及粉本在敦煌壁畫構圖中的運用。同時與青海東部、甘肅南部寺院壁畫進行了比較研究, 指出粉本在這些地區流傳的意義。王征《可孜爾石窟壁畫的製作過程和表現形式》(《敦煌研究》2001 年 4 期) 探討了克孜爾石窟壁畫的繪製過程和構圖、綫描、色彩、形體等表現形式。李月伯《從莫高窟第 3 窟壁畫看中國畫綫描的藝術成就》(《敦煌研究》2001 年 2 期) 通過對元代社會歷史

背景及敦煌地理位置，還有莫高窟特殊的自然環境綜合研究，分析了第 3 窟壁畫的表達技法。邵宏江《我對敦煌壁畫的認識和我的臨摹方法》(《敦煌研究》2001 年 4 期) 作者總結了自己多年臨摹實踐和可借鑒的經驗。

從石窟壁畫入手進行歷史史事探討。葉貴良《莫高窟 220 窟〈帝王圖〉“貂尾”大臣非中書令、亦非右散騎常侍》(《敦煌學輯刊》2001 年 1 期) 著重考證了敦煌第 220 窟貞觀十六年《帝王圖》壁畫中皇帝右邊官帽上插著“貂尾”的大臣身份。作者證以“至尊朝會登殿，侍中常侍夾御，御下輿，則扶左右”，皇帝出行皆由侍中常侍侍衛左右兩旁之貫例，認為此人應非“中書令”；然而，亦非“右散騎常侍”，因為唐貞觀十六年尚無右散騎常侍之稱。作者認為此人的身份是“常侍”。

關於敦煌地區環境保護與地質探測方面，胡同慶《初探敦煌壁畫中的環境保護意識》(《敦煌研究》2001 年 2 期) 以敦煌壁畫為研究物件，從多角度探討了一千多年前古代敦煌人的環境保護意識。胡同慶《論古代敦煌環境保護意識基礎及其與現代大西北可持續發展之關係》(《敦煌研究》2001 年 3 期) 通過敦煌壁畫論述佛教宣傳的眾生平等、因果報應是古代敦煌佛教環境意識的思想理論基礎，認為只有建立在一定思想基礎上的環境意識，才有利於環保行動和環保建設的可持續發展。鄭彩霞等《敦煌莫高窟窟區林地土壤水分的入滲規律》(《敦煌研究》2001 年 3 期) 測定窟區土壤水分入滲率較大，平均可達 2mm/min。窟區林地淺層土壤水分的側滲幅度不大，但土壤深層的側滲幅度較大。不同灌水量對土壤水分的下滲率有明顯的影響。在灌水後 30h 左右，水分可下滲到 300cm 以下土層。以上研究對敦煌地區文物保護具有借鑒意義。

少數民族歷史與語言

有關敦煌民族、民族關係史，主要涉及回鶻、吐蕃、粟特人，與歸義軍關係、語言等方面。李樹輝《Sari^R Uj^Rur 考源——兼論龜茲回鶻與沙州曹氏歸義軍政權的關係》(《敦煌學與中國史研究論集》) 對 Sari^R Uj^Rur 的涵義及其所指，Sari^R Uj^Rur 的原居地，龜茲回鶻與沙州曹氏歸義軍政權的關係，裕固族的族源構成等問題作了探討。陳炳應《11 世紀存在過統治瓜沙二州的回鶻汗國嗎？——西夏統治瓜沙始年考》(《敦煌研究》2001 年第 2 期) 以為西夏自 1036 年攻占敦煌後就一直統治著該地，只是因其要全力對付宋與吐蕃，故對遠離其首都的瓜沙二州回鶻實行羈縻統治，允許他們擁有自己的部落組織、軍隊、外交權、外貿權等，因而出現“北亭可汗”、“鎮國王子”等君長，及瓜沙回鶻有不服，甚或反擊西夏的想法，並能與宋自由貿易，互通貢使，在莫高窟建窟繪畫等是很自然的。儘管如此，作者認為他們的力量不是很強，並沒有攻占瓜沙二州城，當時并不存在瓜沙二州的“回鶻汗國”。徐曉麗《曹議金與甘州回鶻結親時間考》(《敦煌研究》2001 年 4 期) 對 P. 2915 號文書所涉及的“河西節度使尚書”、“公主”、“夫人”等作了分析，以為天復四年文書中的“公主”正是指曹議金的回鶻夫人天公主，“夫人”則是指他的原配夫人宋氏，因而曹議金與甘州回鶻結親時間應在天復四年以前。楊銘《羊同國地望輯考》(《敦煌學輯刊》2001 年 1 期) 在以往研究基礎上，對有關羊同國的漢文、敦煌藏文史料和研究做了回顧性的總結，認為大羊同的地望當以《釋迦方志》所載可靠，小羊同國在吐蕃西南，正與《大唐天竺使出銘》記載相同；又大羊同國東接吐蕃，可見兩者之間無他國，而小羊同國當在其東南，故以大羊同在小羊同西北為妥。這種大局大概到了 8 世紀中葉以後起了變化，由於吐蕃的擴展，小羊同被遷到了大羊同之西，也就是《通典·邊防》記載的情況。魏文斌、吳菘《炳靈寺石窟的唐蕃關係史料》(《敦煌研究》2001 年 1 期) 對炳靈寺石窟保留的反映唐蕃關係的史料進行了介紹。楊富學《敦煌吐魯番文獻所見吐蕃回鶻之文化關係》(《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01 年 1 期) 通過分析敦煌吐蕃文寫卷中反映的吐蕃與回鶻之間的文化關係，及二者在文化方面的相互影響等問題，探討了吐蕃與回鶻兩次大規模的接觸。

來華粟特人研究。榮新江《敦煌歸義軍曹氏統治者為粟特人後裔說》(《歷史研究》2001 年 1 期) 從敦煌粟特曹姓的來源、粟特人擔任要職的情況、曹氏與回鶻、于闐的聯姻、粟特人在曹氏政權中的地位等方面論證了曹氏統治者出自粟特後裔，從而對曹氏政權的特性及其對敦煌歷史的貢獻給予了比較合理的說明。馮培紅《敦煌曹氏族屬與曹氏歸義軍政權》(《歷史研究》

2001 年 1 期) 指出了敦煌曹氏的源流, 考察了漢代以來胡漢兩支曹氏的源流和勢力的發展。認定曹議金是中亞粟特人後裔, 曹氏歸義軍政權實際上是以粟特人為主建立的政權。

關於少數族語言對敦煌地區語言影響的問題, 高田時雄《敦煌發現的多種語言文獻》(《敦煌學與中國史研究論集》) 把敦煌寫本中關於敦煌地區流行的語言狀況作了總結。敦煌所見語言有粟特語、于闐語、梵語、回鶻文, 吐蕃佔領時期漢、吐蕃語言共存, 形成了多種語的地區, 但並未影響漢語的主導地位。

科技

敦煌科技史的研究, 涉及內容主要有醫學、交通工具、印刷、製造技術等方面。王淑民《四個英藏敦煌脉書殘卷的綴輯研究》(《敦煌研究》2001 年 4 期) 將具有共同特點的四個殘卷 S. 6425V、S. 8289、S. 9431V、S. 9443V 綴合, 確定為《脉書殘卷》。張儂《敦煌文獻中的針灸文獻》(《敦煌研究》2001 年 2 期) 全面介紹了敦煌遺書中的《灸經圖》、《新集備急灸經》、《明堂五臟論》、《脉經》、《吐蕃藏文針灸圖》、《吐蕃藏文灸法殘卷》等文獻。從春雨《論醋在敦煌遺書、馬王堆竹簡古醫方中的臨床應用》(《敦煌研究》2001 年 2 期) 在敦煌文書與竹簡中醋的醫藥用途作了詳細地說明。馬德《敦煌壁畫中的多輪車與椅轎》(《敦煌研究》2001 年 2 期) 通過敦煌壁畫中現存的唐代所繪四輪車、多輪車及椅轎的考察與研究, 對中國歷史上交通工具製造和使用的情況提出了與傳統記載不同的看法。Yang Fuxue, *Uighur Wooden Movable-Types from Dunhuang and Related Problems*, 載《敦煌學與中國史研究論集》, 該文對中國古代の木活字印刷及相關問題進行了探討。王繼如《伯 3303 號印度制糖法釋讀商榷》對敦煌所出制糖技術文書作進一步訂正。

學術动态

2001 年 7 月在蘭州大學召開了由蘭州大學、臺灣南華大學和美國密西根大學共同舉辦的學術研討會, 王蘭平、馮培紅《敦煌佛教藝術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敦煌研究》2001 年 4 期) 對提交的 41 篇論文, 從佛教歷史、佛教文獻、石窟考古與藝術、語言文學等方面分類介紹。中國臺灣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和美國西來大學於 2001 年 1 月 8 日至 10 日, 在臺北市國際會議中心聯合主辦“2001 年人間佛教學術研討會”。本次會議收到海峽兩岸與美國、日本學者的佛教學術論文, 會議討論的內容涵蓋歷史、哲學、心理、管理、資訊等方面, 釋覺雯《2001 年民間佛教學術研討會綜述》(《敦煌學輯刊》2001 年 1 期) 就會議提交的論文分類做了綜述。黃征《南京棲霞山石窟藝術與敦煌學研討會召開的意義和取得的成果》(《敦煌學輯刊》2001 年 1 期) 介紹了會議提交論文的學術價值, 對此次研討會召開的意義與取得的成果進行了闡述。鄭炳林、沙武田《2000 年紀念敦煌藏經洞發現一百周年敦煌學國際研討會(香港)綜述》(《敦煌研究》2001 年 2 期) 對研討會上提交的 37 篇論文分類作了介紹。(法) 戴仁 (Jean-Pierre Drège) 著, 陳海濤、劉惠琴譯《歐洲敦煌學研究簡述及其論著目錄》(《敦煌學輯刊》2001 年 2 期) 簡要介紹了自敦煌藏經洞發現以來, 歐洲敦煌學研究發展的狀況及其特點, 並附錄了相關的論著目錄。

2003-2004 年台灣地區敦煌學研究綜述 鄭阿財 (台灣南華大學)

本文廣續 2003 年第一期, 針對 2003 年 1 月至 2004 年 12 月止, 有關臺灣地區敦煌學研究的期刊、論文、專著等有關敦煌學之研究進行綜合論述。本年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敦煌文學、敦煌藝術與敦煌宗教等三方面。由於學術交流頻仍, 其中有關大陸學者與日本學者的論文著作漸多, 亦有助於臺灣地區敦煌學之發展, 但為求區分, 特將大陸學者及日本學者在台發表之篇章附錄於後以供參考。

在目錄方面有: 鄭阿財、蔡忠霖〈敦煌學論著目錄續(1997-2000)〉(《敦煌學》24 輯, 2003.06, 頁 227-291。)、鄭阿財、朱鳳玉〈婺源潘石禪先生論著目錄〉(《敦煌學》25 輯, 2004.09, 頁 619-636。)、鄭阿財, 〈敦煌學論著目錄續(2001-2002)〉(《中國唐代學會會刊》12, 2004.12。)

在語言文字方面: 關於音韻研究的, 有洪藝芳〈潘重規先生在敦煌音韻整理研究上的貢獻〉(《敦煌學》25 輯, 2004.09, 頁 233-250。)就潘先生《瀛涯敦煌韻輯新編》、〈王重民題敦煌卷子徐逸毛詩音新考〉、〈韻學碎金〉……等論著, 論述其在敦煌音韻整理研究上的貢獻。何昆益〈敦煌五代切韻殘卷析論〉(《文與哲》3, 2003.12, 頁 211-245)。關於文字研究則有蔡忠霖〈從書法角度看俗字的生成〉(敦煌學第 24 輯, 2003.06, 頁 161-170)此文係作者繼敦煌俗文字研究之後, 從書法角度論述書體的演化與俗字的產生, 並以敦煌寫本俗字為例證。蔡忠霖〈論潘重規先生對敦煌俗字研究之貢獻〉(《敦煌學》25 輯, 2004.09, 頁 529-542), 據潘先生編纂的《敦煌俗字譜》、《龍龕手鑑新編》及〈敦煌卷子俗寫文字與俗文學之研究〉、〈敦煌卷子俗寫文字之整理與發展〉……等, 論述其在敦煌俗字研究之貢獻。另外有潘重規先生遺稿〈唐詩紀事中的俗寫字〉(《敦煌學》25 輯, 2004.09, 頁 637-652。)關於語法研究, 有: 洪藝芳, 〈敦煌社會經濟文書中的唐五代新興量辭研究〉(《敦煌學》24 輯, 2003.06, 頁 83-114)從敦煌社會經濟文書耙梳唐五代的新興量詞, 針對量詞的具體內涵、用例和名詞選用量詞的理據, 展開系統的整理與論述, 期能填補漢語量詞史上的空白。李昱穎〈五十年來敦煌文獻語法研究述評〉(《漢學研究通訊》23: 2, 2004.05, 頁 38-46)分從研究分期分析、研究成果特點分析二方面, 對 1953-2002 年五十年間的敦煌文獻語法研究進行述評。

敦煌文學研究方面: 主要以變文等講唱文學與俗曲為主。通論的有: 朱鳳玉、鄭阿財, 〈潘重規先生敦煌文學研究成果與方法之考察〉(《敦煌學》25 輯, 2004.09, 頁 115-134)總結潘先生敦煌文學研究的成果, 論述其在對敦煌變文、雲謠集、陷蕃詩、王梵志詩、敦煌賦等整理與研究的貢獻, 標舉倡導重視俗文字、提出變文外衣說及王梵志棄嬰說等敦煌文學觀點, 歸納出「尊重原卷求真求實」的研究態度與「文字為基礎, 目錄是門徑」的研究方法, 並闡明其在敦煌文學研究發展的共獻與影響。關於佛曲歌讚的有林仁昱〈敦煌彌陀淨土歌曲的文藝表現〉(《文學與宗教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編, 新文豐出版公司, 2003.12, 頁 605-634)據 P.2066、P.2250、P.2963 等《淨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 考察此類彌陀淨土歌曲所呈現的淨土意象, 並探討其在宗教活動的實踐上, 如何配合儀式與演唱, 發揮觀想極樂世界, 成就稱名念佛、增強院心的助業效果。鄭阿財〈佛曲偈讚在敦煌講唱文學的運用〉(《文學與宗教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編, 新文豐出版公司, 2003.12, 頁 635-665)分別從佛曲在敦煌講唱文學的運用、偈讚在敦煌講唱文學的運用、佛曲偈讚在後代講唱文學的展等方面, 以考察偈讚在唐五代俗文學運用的情形, 藉以印證佛教文學與中國文學雙向交流與相互影響的文化現象。鄭阿財〈唐代佛教文學與俗曲--以敦煌寫本「五更轉」、「十二時」為中心〉(《普門學報》20 期, 2004.03, 頁 93-136)主要以「五更轉」、「十二時」為中心, 分別論述唐代佛教文學中的俗曲與俗曲在唐代佛教傳布的運用等問題, 並探究敦煌本「五更轉」、「十二時」的禪淨內涵。曲子詞方面有: 林健群〈「云謠集」「破陣子」考釋〉(《親民工商專科學校學報》8, 2003.12, 頁 243-248), 陶子珍〈試論敦煌曲中的情歌〉(《北體學報》12, 2004.08, 頁 311-322)。

關於變文的則有: 楊明璋〈敦煌本《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末尾九首詩性質考辨〉

(《漢學研究》21: 2, 2003.12, 頁 391-402) 引宋梅堯臣〈鴨雛〉詩及關漢卿〈雞鴨論〉為證, 以為《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末尾九首詩應是俗講僧藉以諷刺後唐末帝的忘恩負義。葉懿慧〈由敦煌寫本「齧齒可新婦文」論唐代悍婦與婚姻異象〉(《東方人文學誌》3:1, 2004.03, 頁 85-102), 洪素萱〈破譯? 或附會? --「韓朋賦」深層底蘊的探險記〉(《雲漢學刊》10, 2003.06, 頁 245-260), 胡豔惠〈傳承與突破--論敦煌史傳變文之敘事關係〉(《雲漢學刊》10, 2003.06, 頁 261-284)。

敦煌詩研究有: 楊明璋〈敦煌本「無名歌」作者考辨〉(《古今論衡》9, 2003.07, 頁 97-104), 施淑婷〈敦煌寫本高適「燕歌行」評析〉(《人文及社會學科教學通訊》86, 2004.08, 頁 123-144)。

其中特別是學位論文, 計有: 陳素珍〈敦煌本《醜女緣起》研究〉(玄奘人文社會學院中國語文研究所碩士, 2004.01), 本文以《敦煌變文集新書》《醜女緣起》的故事為主, 指陳作品時代、說明故事情節、闡述思想內涵、析論說唱藝術。分析醜女緣起與《賢愚經》、《撰集百緣經》、《雜寶藏經》三部佛經關係, 並持與敦煌賦《醜婦賦》, 劉思真《醜婦賦》比較。陳秀香〈敦煌通俗文學之女性形象研究〉(玄奘人文社會學院中國語文研究所碩士, 2004.01) 以敦煌通俗文學中二十五個女性角色為中心, 以窺探唐代女性之生活。對女性外在特色、內在道德表現進行探討, 綜數述角色所處時代的社會風氣、民俗風情、經濟狀況、教育等。總結歸納唐代女性: 有貞烈剛毅、有多才爽朗、有有承襲傳統美德者...等多樣面貌。徐孟志〈《法華經講經文》與《法華經》注疏之比較研究〉(玄奘人文社會學院中國語文研究所, 2004.06) 主要探討〈法華經講經文〉與《法華經》注疏在詮釋方式、形式、內容、修辭等方面的差異。在詮釋方式上, 〈法華經講經文〉具有「驚四筵」的特色; 經疏具有「適獨坐」的特色。在形式上, 〈法華經講經文〉散韻結合, 經疏純用散體。在內容上, 〈法華經講經文〉傳達實踐性格; 經疏重視概念的知解。在修辭上, 〈法華經講經文〉不但要在「心」上求知解, 而且要在「情」上有所感受; 經疏重在「意」的概念知解上。〈法華經講經文〉目的在「信」與「行」; 注疏目的在「解」與「悟」。二者路線不同, 各自發展, 各自成就佛法的深化與普及化。蕭信雄〈《維摩詰經》講經文與注疏之比較研究〉(玄奘人文社會學院中國語文研究所碩士, 2004.06) 本論文嘗試探究維摩詰經講經文與注疏間之關係; 利用《維摩詰經》、《維摩詰經講經文》、《維摩詰經》唐代以前之諸家注疏進行對照比較。發現講經文運用佛經注疏之方式, 略可分為十項: (一) 注疏之增衍; (二) 注疏之概括; (三) 注疏之改竄; (四) 據注疏解說; (五) 注疏之簡化; (六) 偏離注疏作渲染; (七) 依據經文作演繹; (八) 作者之見解; (九) 故事之加入; (十) 其他佛典、注疏之採用。鄭名棋〈敦煌佛教民間文學之研究——以講唱文學與文化義蘊為中心〉(國立花蓮師範學院民間文學研究所碩士, 2004.06) 本篇論文以變文、歌辭、齋文、詩歌為主, 分別探討變文看圖說話的講唱形式與作品文學創作藝術特徵, 說明敦煌歌辭兒郎偉與唐代社會生活的融合, 從敦煌齋文的方面討論佛教法事對民間社會深化的情形, 以及探討比較俗曲與唐代古典詩歌形式內容上的差異。並以敦煌佛教民間文學作品呈現的思想內涵為主, 闡述儒、釋、道三教是如何透過通俗藝術深入民間。陳籽伶〈「俗賦」的淵源與演化〉(逢甲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 2004.06) 本論文主要以賦史的宏觀角度, 論述俗賦的淵源與演化。據敦煌本俗賦以論述其在民間說唱得地位, 析論俗賦的諧隱基因, 闡述俗賦的表演性質。

此外, 林仁昱《敦煌佛教歌曲之研究》(《法藏文庫》碩博士學位論文---中國佛教學數論典 89,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2003.10), 根據 2001 年中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排印。羅宗濤《敦煌講經變文研究》(《法藏文庫》碩博士學位論文---中國佛教學數論典 104,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2004.07), 根據 1972 年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排印。

有關敦煌文獻中經子典籍的研究方面, 有: 鄭阿財, 〈敦煌本《蒙求》及注文之考訂與研究〉(《敦煌學》第 24 輯, 2003.06, 頁 177-198) 據 P.2710、P.4877 及敦煌研究院藏 95 號等三件敦煌寫本《蒙求》白及注文, 進行校錄, 並考訂作者、探究注文。王三慶、黃亮文, 〈《朋友書儀》一卷研究〉(《敦煌學》25 輯, 2004.09, 頁 21-74) 根據 13 種敦煌文獻及 3 種唐宋文獻中《朋友書儀》一卷, 進行寫訊錄與系統分辨, 論述其結構、意義、源流等問題, 並考察內容成分與著作時代。

敦煌宗教研究, 有關佛教的有: 鄭志明〈敦煌寫卷「亡文」的生命教育〉(《普門學報》19

期, 2004.01, 頁 105-136) 主要根據黃征《敦煌願文集》中的「亡文」, 分從倫常教化、生命關懷、儀式功能等, 探討敦煌寫卷「亡文」的生命教育。陳盛港〈論「神會語錄」之編集年代及編集者劉澄的背景〉(《普門學報》21 期, 2004.05, 頁 227-248) 主要依據敦煌文獻中 P.3047、S.6557 等三件《神會語錄》寫本, 探索編輯年代分析編輯背景。釋永有〈敦煌金剛經及其相關文獻之題記探討〉(《世界宗教學刊》2, 2003.11, 頁 111-139) 利用今所得見的敦煌本《金剛經》及其題記, 探討其書寫的時代, 及供養者的相關問題。另外萬金川〈敦煌石室「心經」音寫抄本校釋序說〉(《中華佛學學報》93.07)、萬金川〈石室「心經」音寫抄本校釋初稿之一〉(《佛學研究中心學報》9, 2004, 頁 77-118) 則是對敦煌寫本「心經」音寫的校釋。汪娟、梁麗玲〈潘重規先生與佛教研究〉(《敦煌學》25 輯, 2004.09, 頁 211-226) 就潘先生敦煌研究論著中, 分別從佛教經錄、佛教經典、佛教通俗文學以論述潘先在佛教研究的成就。金榮華, 〈《六祖壇經》中「慧能辭母」情節試辨〉(《敦煌學》25 輯, 2004.09, 頁 227-232) 就敦煌本《六祖壇經》所述「慧能辭母」一節與後世諸本之增改情節, 進行辨說。鄭阿財、姚孟君〈《孟蘭盆經》系及其注疏與佛教中國化〉(《普門學報》24 期, 2004.11, 頁 117-138) 主要根據敦煌本《淨土孟蘭盆經》、慧淨《孟蘭盆經贊述》及宗密的《孟蘭盆經疏》等, 透過援引儒家《孝經》以疏釋《孟蘭盆經》, 糅和中國孝道思想與故事, 並結合唐五代釋門俗講及「孟蘭盆節」等民俗活動, 考察佛教中國化的發展軌跡。

至於學位論文有: 陳蕾如〈「吐蕃論爭」中摩訶衍教法之探究〉(佛光人文社會學院宗教學研究所碩士 2003.06) 主要以敦煌文獻《頓悟大乘正理決》, 和戴密微《吐蕃僧諍記》為主, 探討「吐蕃論爭」中摩訶衍所主張的教法。發現其實摩訶衍教法存在著方便和六波羅蜜的思想以及二諦的思想和具體實踐渡眾的悲心, 他修行觀的首要根本主張是要進入「不思不觀」的修持境界, 但若因眾生根機不同無法契合, 亦有方便不能輕少許善法, 如三皈、五戒、十善、一合掌、一小低頭等, 乃至六波羅蜜……等, 皆是令人勝義, 於此所有的菩薩行亦被總括性的定位。姚孟君〈《父母恩重經》的歷史發展與文化詮釋〉(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 2004.06) 以敦煌本《父母恩重經》的文本及其衍生的俗文學作品與經變藝術等進行歷史考察與文化詮釋。

在道教研究方面, 有: 周西波, 〈敦煌寫本《靈寶自然齋儀》考論〉(《敦煌學》24 輯, 2003.06, 頁 31-48) 據 P.3282、S.6841、P.2455 及北大藏 D171 四件敦煌寫本《靈寶自然齋儀》, 考定其內容, 分析其結構, 論述宿啟儀式之建立與爭議, 並對誦經儀與行道儀進行考察。林雪鈴, 〈敦煌道經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敦煌學》24 輯, 2003.06, 頁 49-62) 從分期與總體對敦煌道經研究進行考察與展望。鄭阿財, 〈北京故宮藏敦煌本《慈善孝子報恩成道經》考〉(《敦煌學》25 輯, 2004.09, 頁 543-558) 據《故宮博物院文物珍品大系—晉唐五代書法》所收北京故宮藏敦煌本《慈善孝子報恩成道經序品第一》, 持與 P.2582《慈善孝子報恩成道經道要品第四》相較, 並探究《慈善孝子報恩成道經》的內容性質、卷帙、抄寫與成書年代, 以為法藏與故宮藏二件《慈善孝子報恩成道經》為今本道藏所無, 具有文獻價值, 故宮藏本有千字文字畧「土」字, 佐證《開元道藏》存在的可信。並為「許遜孝道派」與宋元興盛的「淨明忠孝道」的淵源, 提供更為早期的經典依據。

在敦煌民俗方面, 有: 王三慶, 〈敦煌文獻《諸雜齋文》一本研究〉(《敦煌學》24 輯, 2003.06, 頁 1-30) 根據 S.5640、S.5639、S.4711 等三寫本擬名為《諸雜齋文》一本, 並進行內容分析, 就其涉及史料時事、佚詩及反映佛教中國化等問題來判斷其價值。王曉衛〈秦簡「日書」與敦煌卷子中的宅居觀〉(《歷史月刊》187, 2003.08, 頁 50-53)。

在敦煌藝術方面, 有: 李玉珉〈敦煌莫高窟第三二一窟壁畫初探〉(《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16, 2004.03, 頁 49-78)。

有關敦煌藝術的學位論文, 則有: 林玉龍〈敦煌本生故事與其石窟藝術述論〉(國立花蓮師範學院民間文學研究所碩士, 2004.06) 本論文先界定本生故事。其次, 分析各時期本生故事之思想內涵, 論述敦煌本生故事在文學中的特色與地位, 以明本生經在佛典傳譯過程中, 扮演印度故事中國化的橋樑與媒介。黃廷維〈敦煌早期壁畫中的神仙圖像研究〉(臺南藝術學院/藝術史與藝術評論研究所碩士, 2004.06) 本文主要以西魏的二八五窟、二四九窟; 北周的二九四窟、二九六窟; 隋代的三零五窟、四零一窟、四一七窟、四一九窟以及四二三窟, 總計九個洞窟。

進行佛經以及傳統文獻與圖像本身之間的交互比對，觀察圖範的時代、地域的差異與發展。企圖找尋道教神仙圖像出現的關鍵因素，發現可能的決定性因素在於開窟者-東陽王元榮。元榮本為洛陽人士而任沙州刺史，於是自洛陽西遷敦煌。其西遷有可能伴隨著部份的文化與圖像進入敦煌地區，造成信仰文化與圖像系統的轉變，那麼也極有可能成為道教神仙圖像產生的主要因素。簡佩琦〈敦煌報恩經變研究〉(臺南藝術學院/藝術史與藝術評論研究所碩士, 2004.06) 本文主要依據潘諾夫斯基所提出的圖像學研究方法，亦即形式、內容與意涵等層次來理解報恩經變。藉由「基本構圖」與「外緣故事」，瞭解形式與圖像的變化由盛唐的萌芽、中唐的多元發展、到晚唐逐漸歸於一統、五代幾乎皆為定勢表現、宋代則凋零式微。最後，經由《大方便佛報恩經》與變文《雙恩記》殘卷的耙梳，呈現出報恩經變外緣故事皆出現於經文當中，變文《雙恩記》雖是所存留的內容則完全與報恩經變相扣合，不但沒有經文與變相間所扞格的問題，甚至變文文字中擁有經變畫中圖像與榜題之所指涉者，似為報恩經變較可能的文本來源，這一點與前人研究中逕以經文為來源是相左的。林敬真〈敦煌史蹟瑞像畫初探〉(臺南藝術學院藝術史與藝術評論研究所碩士, 2004.06) 本論文主要討論敦煌壁畫中聖僧故事、佛教歷史遺跡、瑞像圖、佛教感通等佛教史蹟繪畫。以初唐的 323 窟，中唐 154、44 窟，及 231、237、236、72、449、85、9...等晚唐、五代、宋等石窟壁畫內容，進行史蹟畫文本與圖本的探討，及其意義的論述。以為敦煌史蹟瑞像繪畫題材與表現方式的演變與傳承，的確多少可窺見依著不同政治需求結合授記與感通思想的佛教藝術呈現。

另外，史學方面有羅彤華〈唐代和糴問題試論〉(《新史學》15:1, 2004.03, 頁 45-92)，邢義田〈夏竦發現敦煌漢簡和晉泰始石刻的經過〉(《古今論衡》10, 2003.12, 頁 60-69)，舞蹈方面有蕭君玲、鄭仕一〈敦煌舞蹈教學原則暨教學計畫範例設計〉(《美育》138, 2004.03, 頁 76-83)。人物方面則有：鮑延毅〈于右任先生與敦煌學〉(《國文天地》224, 2004.01, 頁 41-43)，柳存仁〈潘石禪先生紀念〉(《敦煌學》25 輯, 2004.09, 頁 1-6)。

在台發表之大陸學者論文

- 金澄坤，〈《俄藏敦煌文獻》中的黑城文書考證及相關問題的討論〉，《敦煌學》24 輯，2003.06，頁 63-82。
- 許建平〈英倫法京所藏敦煌寫本殘片八種之定名並校錄〉，《敦煌學》24 輯，2003.06，頁 115-126。
- 黃征〈胡適舊藏《降魔變文》真跡考證〉，《敦煌學》24 輯，2003.06，頁 127-152。
- 潘春輝〈北周武帝滅佛莫高窟倖免原因蠡測〉，《敦煌學》24 輯，2003.06，頁 153-160。
- 關家錚，〈讀王重民先生佚札〉，《敦煌學》24 輯，2003.06，頁 199-208。
- 張新民，〈「獮獠作佛」公案與東山禪法南傳--讀敦煌寫本「六祖壇經」劄記〉，《中華佛學學報》16, 2003.07, 頁 109-131。
- 方廣錫〈論「敦煌遺書總目錄」之編纂〉，《佛教圖書館館訊》35、36, 2003.12, 頁 6-20。
- 胡同慶〈試論敦煌壁畫中的佛教環境保護意識〉，《普門學報》21 期，2004.05, 頁 97-130。
- 王青〈敦煌本「搜神記」與大鵝處女型故事〉，《漢學研究》44, 2004.06, 頁 81-96。
- 伏俊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紀念潘重規教授〉，《敦煌學》25 輯，2004.09, 頁 7-12。
- 方廣錫〈梁武帝書《法華經》跋〉，《敦煌學》25 輯，2004.09, 頁 13-20。
- 王小盾〈潘重規先生「變文外衣」理論疏說〉，《敦煌學》25 輯，2004.09, 頁 75-94。
- 白化文〈話「蜂臺」〉，《敦煌學》25 輯，2004.09, 頁 95-100。
- 伏俊璉〈讀敦煌《詩經》寫卷札記〉，《敦煌學》25 輯，2004.09, 頁 107-114。
- 李正宇〈晚唐至宋敦煌僧人聽食「淨肉」〉，《敦煌學》25 輯，2004.09, 頁 177-194。
- 李并成〈西涼敦煌戶籍殘卷(S.0113)若干問題新探〉，《敦煌學》25 輯，2004.09, 頁 195-204。
- 杜斗成〈東晉時期敦煌高僧的南巡及遊歷於敦煌的僧人〉，《敦煌學》25 輯，2004.09, 頁 205-210。
- 柴劍虹〈勇敢衝破樊籬的拓荒者——讀潘重規先生《列寧格勒十日記》感言〉，《敦煌學》25 輯，2004.09, 頁 251-260。
- 郝春文〈再論敦煌私社的「義聚」〉，《敦煌學》25 輯，2004.09, 頁 279-292。

- 馬 德 〈《敦煌工匠史料》補遺與訂誤〉，《敦煌學》25 輯，2004.09，頁 293-310。
- 張 弓 〈敦煌四部籍與中古後期社會的文化情境〉，《敦煌學》25 輯，2004.09，頁 311-336。
- 張 勇 〈俄藏 00201A 號殘卷考 ——兼評達照〈《金剛經贊》研究〉及其〈序〉〉，《敦煌學》25 輯，2004.09，頁 337-346。
- 張涌泉 〈敦煌文獻字詞例釋〉，《敦煌學》25 輯，2004.09，頁 347-358。
- 張錫厚 〈敦煌本辰 017 (北 8456)《上清高聖玉晨太上大道君列記》詩頌校錄〉，《敦煌學》25 輯，2004.09，頁 359-376。
- 張鴻勛 〈神聖與世俗：《舜子變》的敘事學解讀——兼論敦煌變文與口承故事的關係〉，《敦煌學》25 輯，2004.09，頁 377-394。
- 許建平 〈潘重規先生對《詩經》研究的貢獻〉，《敦煌學》25 輯，2004.09，頁 395-406。
- 陳國燦 〈俄藏敦煌 12012 號《書儀》疏證〉，《敦煌學》25 輯，2004.09，頁 407-418。
- 陳懷宇 〈普林斯頓所見羅氏藏敦煌吐魯番文書〉，《敦煌學》25 輯，2004.09，頁 419-442。
- 項 楚 〈敦煌變文新校〉，《敦煌學》25 輯，2004.09，頁 443-450。
- 黃 征 〈敦煌俗字例釋——惡與德〉，《敦煌學》25 輯，2004.09，頁 451-458。
- 榮新江 〈敦煌本邈真讚拾遺〉，《敦煌學》25 輯，2004.09，頁 459-464。
- 劉 屹 〈敦煌本《昇玄經》經錄傳授儀式研究〉，《敦煌學》25 輯，2004.09，頁 465-482。
- 劉進寶 〈《俄藏敦煌文獻》出版的艱難歷程——重讀潘重規先生的《列寧格勒十日記》〉，《敦煌學》25 輯，2004.09，頁 483-492。
- 樊錦詩、彭金章 〈敦煌莫高窟北區 B228 窟出土河西大涼國安樂三年 (619) 郭方隨葬衣物疏初探〉，《敦煌學》25 輯，2004.09，頁 515-528。
- 鄭炳林、徐曉莉 〈晚唐五代敦煌歸義軍政權的婚姻關係研究〉，《敦煌學》25 輯，2004.09，頁 559-596。
- 鄧文寬 〈重讀《敦煌壇經新書》——紀念潘重規先生逝世一周年〉，《敦煌學》25 輯，2004.09，頁 559-596。
- 龍 晦 〈變文中的兩個地名考釋〉，《敦煌學》25 輯，2004.09，頁 597-606。
- 郝春文 〈從衝突到兼容——中古時期傳統社邑與佛教的關係〉，《普門學報》24 期，2004.11，頁 1-64。

在台發表之日本學者論文

- 石塚晴通 〈關於漢字文化圈漢字字體的標準〉，《敦煌學》25 輯，2004.09，頁 101-106。
- 池田溫 〈唐長安畢原露仙館略考〉，《敦煌學》25 輯，2004.09，頁 135-158。
- 荒見泰史 〈敦煌的講唱體文獻〉，《敦煌學》25 輯，2004.09，頁 261-278。
- 高田時雄 〈莫高窟北區石窟發現《排字韻》筭記〉，《敦煌學》25 輯，2004.09，頁 311-336。
- 土肥義和 〈唐代考課令等寫本斷片 (06521) 考釋——兼論與開元二十五年所撰《格式律令事類》的關係〉，《敦煌學》25 輯，2004.09，頁 597-618。

敦煌莫高窟第 275 窟研究綜述(一)

盧秀文(敦煌研究院)

敦煌莫高窟第 275 窟是早期著名的洞窟之一，早已引起學界的重視，並取得了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除發表的論文之外，值得關注的是敦煌研究院編《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等書¹，都對 275 窟研究有所涉及，堪稱重要的參考書。此外，由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和考古研究所蔡偉堂等先生組成的課題小組，對第 275 窟進行了全面、系統的調查、記錄、考證、測繪等工作，已完成專著《敦煌莫高窟第 275 窟考古報告》²。這項工作的完成，將對今後 275 窟的排年、斷代、內容考證，提供可靠的第一手資料。

關於 275 窟的編號，樊錦詩、蔡偉堂《重訂莫高窟各家編號對照表說明——兼談莫高窟各家編號及其對照表》，對莫高窟的各家洞窟的編號重新進行了考證、整理，考定了各家關於此窟的編號是：敦研所為第 275 窟，伯希和為 118ⁿ窟，奧登堡為 118ⁿ窟，張大千為 233 窟，史岩為 204 窟³。下面就第 275 窟歷年來學界研究涉及的主要問題進行分類綜述。

一、洞窟形制

洞窟形制一直是考古學界進行探討的重點。對於這個窟的窟形，學界觀點基本一致，樊錦詩、馬世長、關友惠《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指出，第 275 窟，單室，平面長方形，窟頂作起脊較寬的縱向人字披形，宋重修此室時於窟室中加一隔牆，將南、北壁東側雙樹圓券、南北側壁各分為上中下三段；上段各開闕形方龕二、對樹圓券龕一⁴。繼此文之後，金維諾、樋口隆康、張學榮、何靜珍等均對 275 洞窟形制進行了討論⁵，金認為 275 窟明顯是當地匠師按照中原本構建築設計。日本人樋口隆康認為，第 275 窟是受印度石窟寺院支提窟和毗訶羅窟兩種系統造窟型式的影響。

張學榮、何靜珍認為，第 275 窟不像印度的支提式和毗訶羅式窟，它完全是按照我國中原地區漢民族的建築形式鑿成。開鑿在兩側壁上部的四個闕形龕和兩個雙樹龕，雙樹為龕，寓示即將成佛的意思。樊錦詩提出，第 275 窟屬殿堂窟，是為修行者禮佛的場所⁶。王瀧、董玉祥對甘肅等石窟進行了分析研究⁷，王認為，敦煌早期一組石窟的形制有著特殊性，它們均無中心柱，尤其是多漢闕形式的佛龕。闕形龕的結構同中原及四川出土的東漢畫像磚中建築形式完全相同。這類窟型在整個河西以及雲崗早期中沒有同例，特別是同甘肅省其他地區的早期洞窟包括北涼也有很大差別。董認為，275 窟等洞窟三種不同形式，修造目的和作用顯然各有側重。

二、年代

第 275 窟的開鑿時間綜合近年發表的看法，大致有四類：一是晉武帝、惠帝統治的年代；二是主張 300 年以前，即“西涼說”；三是主張 420 年至 442 年，十六國北攻敦煌後的時期，即“北涼說”；四是主張約在太和初年（476 年以後），始於北魏，晚於雲崗初期，即“北魏說”。

1、晉武帝、惠帝說

持此觀點者閻文儒認為，炳靈寺 169 窟下層壁畫，以風格論，與莫高窟 275 窟中壁畫相似，莫高窟開始的時代，與唐人追記兩晉時候已有“仙岩寺”的名稱是相當吻合的。所以莫高窟的開創年代，根據所提到的壁畫風格，就完全有可能開創於 3 世紀下半紀，即晉武帝、惠帝統治時期⁸。

2、西涼說

持此觀點者史葦湘⁹、王瀧¹⁰、金維諾等¹¹。史認為，275 等窟是十六國晚期，相當於西涼到北涼統治時期的石窟。王指出，275 等一組窟的開窟時代為西涼，約相當於 400 年—421 年。金認為 275 等窟是目前大多數人公認的十六國時期的洞窟，但屬於西涼和北涼，則意見不完全相同。從 275 窟仿中原本結構的形式，以及造像和張掖、酒泉、高昌等地北涼作品不同來看，似是西涼窟。

3、北涼說

(美國) 索珀 (Alexander. c. Soper) 提出 272、275 窟相當於北涼 (421—442) 開鑿¹²。樊錦詩等用科學排年的方法，將莫高窟北朝洞窟分為四期，其中第一期：第 268、272、275 窟。相當於北涼統治敦煌時期，即 420 年至 442 年左右¹³。段文傑指出，大家公認 268、272、275 窟一組是最早洞窟，經過調查研究和論證，初步確定這一組洞窟屬於北涼時代¹⁴，現已基本上得到國內外學者承認，但仍然存在不同意見。賀世哲認為，就莫高窟現存窟龕來看，第 267 至 275 窟這一段洞窟最早定為北涼時期¹⁵。如果樂傳、法良窟尚在，可能也就在這一段窟面上。張學榮、何靜珍同意賀世哲觀點，指出第 268 窟很可能是前秦苻堅建元二年 (366) 由沙門樂傳或其後法良禪師所開的，如果這一推測準確，那麼第 275 窟亦應在這一時期，絕不會相去甚遠¹⁶。馬德贊同早期三窟為北涼時代作品，指出莫高窟 268、272、275 三個洞窟的壁畫和塑像繪製於北涼時期，並不是說這三個洞窟的最早開鑿也在北涼時期，這是因為，在莫高窟的營造歷史上，許多洞窟的開鑿與其壁畫、塑像的繪製並不是一次性地連續造作過程，而往往是洞窟在鑿成一段時間後才進行畫塑的繪製，或者是一個洞窟的壁畫和塑像往往要經過幾個時代的好多次的改修或重修¹⁷。

杜斗城首先肯定了¹⁸樊錦詩等第一次明確提出的第 268、272、275 三窟為北涼的看法¹⁹，同時認為，樊錦詩等過分地考慮了石窟的形制問題，把非中心柱窟的三個窟劃分為北涼窟，把其他早期洞窟劃為北魏窟。此外，杜斗城就北涼諸問題作了專題研究，他提出北涼窟除了 275 等三窟外，還應包括 248 等窟。其理由如下：其一，古代文獻中較多地記載了北涼在河西開造石窟的情況；其二，北涼開窟造像情況與譯經規模是一致的；其三，考古“比較學”的結果也證明上述石窟是北涼窟；其四，河西早期石窟“北魏說”不符合北魏統治河西的歷史形勢；其五，敦煌莫高窟早期洞窟也應是北涼窟²⁰。

鄭汝中認為，如果確定 275 窟為北涼所建，具體時間當在 366—439 年之間²¹。李遇春指出，禪窟的建築時代，估計應與廢寺的建築時代相去不遠，亦為東晉時期，而與敦煌 267—271 窟的時代相比較，似為較早，或系這種禪窟先在龜茲產生，而後又傳到敦煌²²。殷光明認為，在莫高窟的早期三窟中，275、272 二窟的建造年代在北涼末年至五世紀中葉，約在 436 年或北涼亡後至沮渠無諱離敦煌為止；或在復法後的 452 年至 460 年，但不會晚於北涼殘餘政權滅亡的 460 年²³。

劉永增指出，《賢愚經》為慧覺餘八僧在于闐參加了般庶於瑟大會、回高昌後集成的佛經，從至今尚無梵文本發現這一事實來看，其原來就沒有作為經典的《賢愚經》。從該經記載的推論結果來看，該經的命名年代為 435 年，其集成年代當在此前。敦煌第 275 窟的四幅依據《賢愚經》的本生故事，是由高昌傳至涼州時留下的作品，與敦煌研究院將之排年在北涼時期 (430—439) 的年代正合²⁴。杜斗城、董玉祥認為，依據《賢愚經》的故事在莫高窟的壁畫中出現這一事實，把 275 窟等早期洞窟定在 445 年之後的“北魏說”就毫無基礎了²⁵。

賈應逸、柳洪亮、杜斗城三學者專就吐峪溝 44 窟與莫高窟早期三窟的年代進行了比較，他們認為二者有密切的關係²⁶。賈指出，五世紀時高昌和敦煌同歸北涼政權管轄，又都是當時的佛教中心，因而形成像吐峪溝第 44 窟和莫高窟第 272、275 窟那樣相似的佛教藝術。柳認為，莫高窟第 275 窟與吐峪溝第 44 窟內的本生故事如出一轍，吐峪溝 44 窟為莫高窟早期三窟北涼說提供了確鑿的證據。莫高窟早期三窟衍生了吐峪溝 44 窟，而不是吐峪溝影響了莫高窟早期三窟。杜肯定，吐峪溝 44 窟與莫高窟的北涼窟有很多共同之處是不可否認的。這種情況，應

該說是北涼佛教向西影響的結果。持此觀點者尚有董玉祥、關友惠等²⁷。

(美國)阿部賢次對“北涼說”提出異議。認為北涼經塔並不能給第 268、272、275 窟的時代提供確實證據²⁸。在酒泉、敦煌、吐魯番等地出土的北涼經塔，有許多地方與莫高窟早期三窟存在著明顯的差異，三窟基本上是隱居修道之處，經塔則是居士作為個人還願的供物。塔崇拜是佛教的傳統作法，並與崇拜歷史上的佛陀釋迦牟尼遺物有密切關係。相反，莫高窟石窟則將重心放在窟中央的形象上。如果與北涼石塔的比較來確定早期洞窟第 268、272、275 窟的年代，一定要考慮到兩者的作用、目的和所耗資金的差異等因素，這並不意味著兩者間不存在相似處，其中的差別影響著藝術家和施主的選擇。學者們一直試圖通過比較實際上很不相同材料來確定這些石窟的時代。其實，在急切確定莫高窟最早石窟的時代問題上，忽略了在相對結論中極有意義的問題。黃文昆認為，敦煌莫高窟第 275 等窟，其內容格局、造像和表層壁畫，既有諸多雲崗第一期甚至第二期的特徵，當然也是北魏復法以後作品，受到雲崗石窟的影響²⁹。北涼說畢竟缺乏足夠的根據。

台灣學者賴鵬舉認為，目前學界對這三窟年代的考證，皆為北涼時代所開鑿，造像內容與彌勒信仰有關³⁰。但這些研究還不足以形成對此三窟的全面瞭解，首先對年代的判斷，若僅憑史料與造像的風格，雖可定出大致的年代，但其解析度並不足以區分北涼與北魏早期的差別。應加入當地佛教的義學思想及禪法等較為細緻的研究工具，用以區別不同朝代、不同僧團間的微細差異。其次在石窟造像內容的解讀上，大都只對局部的內容進行解讀，但對這些局部造像在全窟上的意義則很少論及。由於北涼沮渠安周造像碑文與敦煌 272 窟造像在義學與禪法上的密切焊接，可以有力地說明 268 窟、272 窟、275 窟皆是北涼淨土思想下的作品而非北魏。還指出，敦煌 275 窟為一兜率淨土窟，開窟時間應在沮渠京聲所譯的《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之後，應在 455 年稍後，雖說這時敦煌已入北魏早期，但全窟造像的思想仍沿襲涼州的佛教，與北涼流亡政權（422—460）在吐峪溝的開鑿石窟及涼高僧曇曜在雲崗開鑿五窟的年代（460—465）皆相去不遠。段文傑指出：“莫高窟早期三窟 268、272、275 窟的建造年代衆說紛紜，文獻記載中有永和八年者，有苻秦建元二年者，等而下之，西涼、北涼、北魏均有論者。我院考古工作者十年前考定為北涼，這是有依據的。”³¹

4、北魏說

這組洞窟的擬定，始於 40 年代初的張大千《張大千先生遺著漢高窟記》³²。謝稚柳《敦煌藝術敘錄》提出了 275 窟“當為莫高窟最早之魏畫”的主張³³。敦煌研究院最初沿用張說³⁴。王遜推定莫高窟現在洞窟中時代最早的是北魏末期的 267—271（即 268 窟）、272、275 等窟，時代大約是 500 年前後³⁵。瑞典人喜龍仁（O. Siren）根據伯希和《敦煌石窟圖錄》等資料³⁶，提出 275 等窟可能鑿於 5 世紀末之前。（日）水野清一認為，272、275 窟系北魏和平年間開鑿，推定其年代為 450—470 年³⁷。常書鴻指定 272、275 是魏窟³⁸。

1956 年宿白指出，257、275、272 等窟屬於早期，初期的上限，估計大約和雲岡第一期（16—20 窟和 7—10 窟）接近³⁹。1983 年作者又說 5 世紀 50 年代至 70 年代，是柔然稱霸西域，逐步威逼敦煌的時期⁴⁰。在這種形勢下，敦煌能不能開鑿出象莫高窟現存早期洞窟那樣成組式、成批的窟龕來，是值得考慮的，一般認為莫高窟現存最早洞窟是 275、272、268 和 259 等兩批洞窟；同時，我們在上述兩組現存最早的洞窟中，也確實找不出明確的 5 世紀中期的特徵，這應該不是偶然的事。1989 年宿白在《大公報在香港復刊三十周年紀念文集》上發表《敦煌莫高窟早期洞窟雜考》一文，就 275 等早期洞窟的年代問題進行了專論，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發現的北魏繡佛對現存莫高窟最早洞窟開鑿時間提供了依據⁴¹。以前推論莫高窟現存最早的洞窟的時代，不會早於雲岡第一期，而是接近第二期之初，即太和初年（476）前後的想法，是值得我們參考的。同年作者又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20 卷上以《莫高窟現存早期洞窟的年代問題》為題，提出北涼說在目前還沒有發現更多新資料的情況下⁴²，是值得商榷的。莫高窟現存早期洞窟與自成體系的新疆石窟的關係，雖在繪畫技法方面有某些相似處，但從石窟全部內涵上考察，則遠不如與中原北方石窟關係密切；莫高窟儘管地接西域，

但仍然屬於中原北方石窟系統。如果考慮到莫高窟第 272 窟的方形窟室和第 275 窟塑繪中的漢式建築細部，似乎與雲崗第二期洞窟再晚一些的資料相比更為恰當。其間還有一個誰影響誰的問題。莫高窟這組現存最早洞窟的年代，其上限可能接近於雲崗第 9、10 窟開鑿的太和八年，他們的下限或許要推遲到遷洛前後。擬定莫高窟現存這組最早洞窟年代的上下限是，從接近太和八年（484）和太和十一年（487）起，至太和十八年（494）遷洛陽以後不久。

杜斗城認為，“北魏說不符合北魏統治河西的歷史形勢”，因為敦煌的特殊性決定北魏早、中期敦煌所處的歷史背景，是不允許在敦煌大興石窟的⁴³。因為石窟的興造，必須以定居的農業民族為主，必須有相對穩定的社會條件，必須有一定的人力、物力、財力和一定的技術力量。而當時的敦煌，不具備這些條件。趙秀榮認為 275 窟的時代上限，至少應在 452 年以後，最大的可能是 465 年以後⁴⁴。若再考慮其他因素，其時代可能還要稍晚一些。指出 268、272、275 三窟各有其特點，為北魏時期所開。對 275 窟年代的探討除了上述學者，尚有國家文物局教育處編《佛教石窟考古概要》一書和暨遠志等學者也進行了研究⁴⁵。

三、洞窟內容研究

敦煌莫高窟第 275 窟主尊、壁畫和塑像內容、為近年國內外學術界爭論的熱點，爭論的重點在於對本窟西壁主尊定名和南、北兩壁所繪佛教故事畫同本尊造像之間的關係，而目前爭論還在繼續進行中。

1、主尊定名

對本窟西壁交腳菩薩主尊定名，當前有三種觀點，一認為是彌勒，二認為是釋迦，三認為是交腳菩薩。

(1) 彌勒

大多學者一致把第 275 窟主尊稱作彌勒菩薩，還有人將這一窟也稱作典型的彌勒窟。

早在七十年代李浴就指出，第 275 窟，中央塑像為交腳彌勒，兩壁上方的小龕中各塑彌勒菩薩一身，壁畫執塵尾人二身，這顯然是未來佛彌勒所居的兜率天宮了⁴⁶。

段文傑等先生認為，275 窟是一座典型的彌勒窟，主像和壁龕中均為“蓮花跏”彌勒菩薩⁴⁷。莫高窟早期洞窟多以彌勒為主，這大約與禪修中彌勒決疑有關。樊錦詩等認為，275 窟的交腳彌勒，兩腿相交成鈍角，兩膝間距離較寬，胸前浮塑小蓮花和瓔珞，這些特點同雲岡第一期的第 17 窟主尊交腳彌勒很有相似之處⁴⁸。此窟交腳彌勒菩薩肩部和腿間的衣、裙邊作寬波褶的褶紋，這些都和雲岡第 18、19、20 窟主尊衣褶衣邊的處理手法一樣。王靜珍的《彌勒信仰與敦煌〈彌勒變〉的起源》一文指出，彌勒是極為流行的尊像之一，也是禪修信仰的內容，275 等窟都有交腳彌勒菩薩造像⁴⁹。孟嗣徽對北涼 275 等窟中壁畫分佈的一些規律、主尊塑像多塑彌勒單身像進行了考釋⁵⁰。傅天仇指出，275 窟的正面未來佛彩塑，造像短粗而勁健，顯得樸素。造型圓中有方，臉型方中有圓，內蘊而豐潤，嚴肅中帶笑容⁵¹。275 窟西壁上部闕形小龕內，有不同手勢的交腳彌勒。

有學者提出，交腳坐是否彌勒特有的坐法？再者，本尊和側壁上方 6 尊菩薩像可以為同一早期之作，但若把這些看作是彌勒，那麼其整體結構的意圖又何在呢？日本學者肥塚隆《莫高窟第 275 窟交腳菩薩像與犍陀羅的先例》一文⁵²，是從 275 交腳菩薩像與犍陀羅比較進行探討的，他的文章主要涉及對中國初期佛教產生莫大影響的犍陀羅菩薩交腳像，從而進一步獲得闡明這一問題的線索。作者對迄今有關中國交腳菩薩的諸學說作了整理。結論是敦煌莫高窟第 275 窟本尊與柏林的印度博物館所藏的彌勒一樣，都是坐在逆台形靠背椅上。據此，可把莫高窟 275 窟本尊看作彌勒，又可把側壁的交腳坐和半跏坐菩薩看成供養者。鄧健吾把第 275 窟本尊和側壁闕龕的菩薩交腳像，認為是兜率天宮待機的彌勒，而雙樹圓券龕的菩薩半跏像則被認為降生閻浮提後龍華樹下思修的彌勒⁵³。殷光明認為，下生信仰與佛教政治、皇帝、崇拜關係

密切；北涼時期大量流行彌勒題材，出現下生信仰，強調彌勒成佛，與佛經中所講的彌勒降生于轉輪王的國土有關。另外，北涼末法思想的盛行，期望彌勒佛下世，應是以彌勒佛為代表的下生信仰產生的又一原因⁵⁴。

(2) 釋迦

張學榮、何靜珍對 275 窟做了系統的論述，他們的結論是，主尊不是彌勒，此窟也不是典型的彌勒窟。指出，探討 275 窟內容，要根據當時當地起主導作用的教義思想，窟內的總體佈局和內容來確實，不能只按某一點下結論；認為窟內主尊應是成佛前作為一生輔處菩薩在兜率天宮為諸天人眾講說他一生輔處之行的釋迦而非彌勒⁵⁵。美國學者李貞姬《敦煌第 275 窟的悉達多思惟像》認為，早期中國半跏思惟像一般被認為是兜率陀天中的彌勒，就敦煌第 275 窟半跏思惟像鑒定為彌勒的可靠性提出異議，275 窟半思惟像的原型見於克孜爾“樂天洞”，275 窟的思惟像表現的是悉達多在閻浮樹下首次思惟（拏“初禪”）⁵⁶。

(3) 交腳菩薩

交腳菩薩問題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特別是莫高窟 275 窟的交腳菩薩，國內外不少專家都曾作過深入的研究，發表了一些專門論述文章，既有從我國現存交腳菩薩的一般情況及彌勒信仰方面進行考察，也有聯繫印度、阿富汗一帶交腳菩薩，從發展、演變過程進行研究的。《佛教石窟考古概要》指出，早期造像，主尊均為單身像，組合簡單。275 窟為交腳菩薩。如果倚坐佛即為唐以後的彌勒形象，那麼倚坐佛也可能屬彌勒題材。第 275 窟脅侍像是以繪畫形式表現的。第 275 窟主尊定名的探討，其他學者在研究中也曾涉及到這方面的內容。

2、主尊與壁畫之關係

就莫高窟第 275 窟南、北兩壁所繪佛教故事畫同本尊造像之間的關係，目前學界存在著四種代表性觀點。

第一種觀點以史葦湘為代表，認為第 275 窟只是單純地表現釋迦的前生和今生事迹，是供禪僧和一般信眾觀像、禮拜之用，以表現大乘菩薩之行，與主尊彌勒造像之間沒有內在的聯繫⁵⁷。

第二種觀點以王惠民為代表，認為 275 窟北壁繪本生故事，南壁繪佛傳故事，西壁塑未來佛彌勒，是以繪塑結合的形式完整地表現過去、現在、未來的三世思想⁵⁸。

第三種觀點以新加坡古正美為代表，認為 275 窟主尊造像與北壁的本生故事一起是用來表現轉輪王信仰中的身施和財施信仰的。作者把主尊造像定為轉輪王造像，認為第 275、254 兩窟都側重生身供養的護法故事。這兩窟的主尊，與北涼石塔上所見到的交腳王像是一樣的，從兩窟的主壁畫所強調的護法故事，參考北涼石塔上交腳像建造的動機，再根據曇無讖所譯的《悲華經》，可以斷定這兩窟的交腳主尊即是兩尊法王像或轉輪王像⁵⁹。

第四種觀點以張元林為代表，在《莫高窟第 275 窟故事畫與主尊造像關係新探》一文中認為，史葦湘、王惠民的觀點頗有商榷的必要⁶⁰。指出，佛教是一種像教，具體的造像是信仰思想的最直接的載體。石窟藝術亦如此，窟內造像始終是開鑿者所要表達信仰思想的最主要的載體。與莫高窟其他洞窟基本上以佛的形象作為主尊的情況不同，275 窟是唯一一個以交腳彌勒等的信仰即是本窟所要表達的神學主題，因此，整個洞窟的內容也應是緊緊圍繞這一主題的。筆者認為，275 窟是一個以表現彌勒信仰為主題的統一的藝術整體，該窟南、北兩壁的佛教故事畫和主尊造像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繫；它們是借用了釋迦牟尼的佛傳故事和本生故事來表現彌勒的今生傳記和其前生事迹的，是“援釋迦入彌勒”這一歷史現象在 275 窟的具體體現。本窟可以說是以塑繪結合的手法彰顯彌勒智慧，慈悲皆圓滿的根本佛性。

日本學者石鬆日奈子認為，“張元林以關於彌勒信仰的幾部重要經典的內容演變為依據，結合有關的圖像資料，對 275 窟壁畫內容提出了一種新的解釋”⁶¹。英國學者韋陀認為，論述南壁的出遊四門，迄今一直被認為是釋迦牟尼的事跡，並非和彌勒相關，特別令人感興趣⁶²。

張元林注意到了在早期的翻譯中，彌勒因“善權方便”的因緣而成佛的問題。鄭汝中指出，275 窟原南壁之壁畫，原定為佛傳故事悉達多太子出遊四門圖。根據敦煌地區，早期盛傳彌勒信仰，把它解釋成兜率天宮中的彌勒淨土，亦堪稱符合。275 窟南壁所繪是最初創造的彌勒淨土變的一種形式⁶³。(日)宮治昭指出，275 窟北壁的本生圖，南壁中層畫佛傳圖，依畫面可定為《出遊四門圖》⁶⁴。杜斗城認為，《彌勒下生經》幾乎都講到彌勒下生于轉輪王國土，此國大治，遍地是寶，無有怨賊，城邑聚落無閉，正因為如此，彌勒便首先為現實統治者所敬仰，現實統治者對彌勒的如此態度，主要目的是想作兵不血刃而能統一天下，又使國內大治的轉輪王——即佛教的理想王⁶⁵。如果從這個角度去考慮問題。我們對敦煌及河西其他地區北涼時期大量出現彌勒造像就不難理解了。宮治昭指出，阿富汗迦畢什地區的佛教雕刻與中國早期佛教美術有很密切的關係。在迦畢什地區休特拉克出土的浮雕中有不少交腳菩薩的範例。其中有兩例雕刻中的交腳菩薩均兩手結轉法輪印，與北涼石塔交腳彌勒浮雕和敦煌第 275 窟北壁上層交腳彌勒塑像的轉法輪印為同一形式，說明了其中有著某種關係。還認為犍陀羅、迦畢試佛教雕刻以及薩珊美術為敦煌早期洞窟受“西方影響”之淵源⁶⁶。賴鵬舉指出，敦煌 275 窟為一兜率淨土窟，其造像思想確源於北涼特別偏重的彌勒淨土的思想，而且造像內容與沮渠京聲所譯的《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有關⁶⁷。

上述四種觀點是目前第 275 窟主尊與壁畫關係討論的重點話題，討論仍在繼續。

對敦煌莫高窟第 275 窟的研究除了上述內容外，尚有對故事畫、背光、龍圖像、化生、樂舞、體育、家具、彩塑、顏料等之探討，因限於篇幅，下次再作介紹。

【注】

1 敦煌文物研究所編《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日本東京，平凡社，1980 年日文版，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年中文版；敦煌文物研究所編《敦煌研究文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2 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整理《敦煌莫高窟內容總錄》，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年；敦煌研究院編《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年；季羨林主編《敦煌學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 年；謝稚柳編《敦煌藝術敘錄》，上海，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 年。

2 樊錦詩、蔡偉堂等《敦煌莫高窟第 275 窟考古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待發。

3 樊錦詩、蔡偉堂《重訂莫高窟各家編號對照表說明——兼談莫高窟各家編號及其對照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待發。

4 樊錦詩、馬世長、關友惠《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收入敦煌文物研究所編《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第 1 卷，日本，東京，平凡社，1980 年日文版，文物出版社，1981 年中文版；收入敦煌文物研究所編《敦煌研究文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2 年。

5 金維諾《甘肅十六國時期的造像與壁畫》，收入金維諾《中國美術史論集》(下)，1995 年；(日)樋口隆康著、蔡偉堂譯《敦煌石窟系譜》，《敦煌研究》1990 年第 4 期，收入《造型藝術研究》，1990 年；張學榮、何靜珍《莫高窟第 275 窟內容初探》，收入段文傑主編《1990 年敦煌學國際研討會文集·石窟考古編》，瀋陽，遼寧美術出版社，1995 年。

6 樊錦詩《輝煌燦爛的敦煌石窟》，收入敦煌研究院編《敦煌——紀念藏經洞發現一百周年》，朝華出版社，2000 年。

7 王瀧《甘肅早期石窟的兩個問題》，收入段文傑主編《1983 年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文集·石窟·藝術編》(上)，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 年；董玉祥《甘肅其他石窟與敦煌莫高窟十六國時期的窟龕比較》，收入段文傑主編《1990 年敦煌學國際研討會文集·石窟考古編》。

8 閻文儒《莫高窟的創建與藏經洞的開鑿及其封閉》，《文物》1980 年第 6 期。

9 史葦湘《關於敦煌莫高窟內容總錄》，收入敦煌文物研究所編《敦煌莫高窟內容總錄》，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年版。

10 同 7 注。

11 金維諾《敦煌窟龕名數考補》，《敦煌研究》1988 年第 2 期。

12 (美國)素珀《北涼和北魏時期的甘肅》，《亞洲藝術》1958 年第 21 期。

13 同 4 注。

14 段文傑《八十年代的敦煌石窟研究》，《中國文物報》第 40 期，1988 年第 7 期。

15 賀世哲《從供養人題記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營建年代》，收入敦煌研究院編《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年。

16 同 5 注。

17 馬德《莫高窟十六國時代的營造》，《1994 年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提要》，1994 年印。

- 18 杜斗城《關於河西早期石窟的年代問題》，《敦煌學輯刊》1994 年第 2 期。
- 19 同 4 注。
- 20 杜斗城《北涼佛教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8 年；杜斗城《關於河西早期石窟的年代問題》，《敦煌學輯刊》1994 年第 2 期。
- 21 鄭汝中《新發現的莫高窟 275 窟音樂圖像》，《敦煌研究》1992 年第 2 期。
- 22 李遇春《淺淡敦煌石窟藝術和新疆石窟藝術的歷史關係》，敦煌文物研究所編《1983 年全國敦煌學討論會文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7 年。
- 23 殷光明《北涼石塔與河西早期石窟》，收入殷光明《北涼石塔研究》，臺灣，覺風佛教藝術文化基金會，2000 年；《從北涼石塔看莫高窟早期三窟的建造年代》，收入《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提要集》，2000 年印。
- 24 劉永增《賢隱經的集成年代與敦煌莫高窟第 275 窟的開鑿》，《敦煌研究》2001 年第 4 期。
- 25 杜斗城、董玉祥《北涼佛教與河西諸石窟的興起》，刻印稿。
- 26 賈應逸《吐峪溝第 44 窟與莫高窟北涼洞窟比較研究》，收入敦煌文物研究所編《1987 年敦煌石窟研究國際討論會文集·石窟考古編》，瀋陽，遼寧美術出版社，1990 年；《敦煌研究》1988 年第 2 期；柳洪亮《由吐峪溝第 44 窟佐證莫高窟早期三窟的年代》，收入段文傑主編《1990 年敦煌學國際研討會文集·石窟考古編》；杜斗城《試論北涼佛教對高昌的影響》，收入《北涼譯經論》，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1995 年。
- 27 董玉祥《北涼佛教藝術》，收入《1994 年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提要》，1994 年印；關友惠《敦煌北朝石窟中的南朝藝術之風》，收入段文傑主編《1987 年敦煌石窟研究國際討論會文集·石窟藝術編》，瀋陽，遼寧美術出版社，1990 年。
- 28 (美)阿部賢次著，台建群譯《北涼石塔與莫高窟早期三窟的年代問題》，收入敦煌研究院編《1994 年敦煌學國際研討會文集·石窟藝術編》，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2000 年。
- 29 黃文昆《麥積山的歷史與石窟》，《文物》1989 年第 3 期。
- 30 賴鵬舉《北涼的彌勒淨土思想慣用語其禪窟造像》，收入《絲路佛教的圖像與禪法》，2002 年印。
- 31 段文傑《1990 年敦煌國際研討會綜述》，收入段文傑主編《1990 年敦煌學國際研討會文集·石窟考古編》。
- 32 秦孝義《張大千先生·莫高窟記》，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館編輯委員會，1975 年。
- 33 謝稚柳《敦煌藝術敘錄》，上海，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 年。
- 34 敦煌文物研究所編《敦煌彩塑》，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年。
- 35 王遜《兩晉南北朝時代的美術》，收入《中國美術史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
- 36 Siren, Chinese Paintings, Leading Masters and Principles, New York and London, 1956; 伯希和《敦煌石窟圖錄》，巴黎，保羅·格特納書店，1921 年；伯希和《敦煌石窟圖錄》，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再版。
- 37 (日)水野清一《敦煌石室ノ一ト》，《イム教藝術》第 34 號，1958 年。
- 38 常書鴻《敦煌莫高窟壁畫》，敦煌文物研究所編《敦煌壁畫》，北京，文物出版社 1959 年。
- 39 宿白《參觀莫高窟第 285 窟劄記》，《文物參考資料》1956 年第 2 期。
- 40 宿白《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敦煌》，《敦煌兩千年》之一，收入宿白著《中國石窟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年。
- 41 宿白《敦煌莫高窟早期洞窟雜考》，《大公報在香港復刊三十周年紀念文集》上冊，1989 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新發現的北魏刺繡》，《文物》1972 年第 2 期。
- 42 宿白《敦煌莫高窟現存早期洞窟的年代問題》，《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20 卷，1989 年。
- 43 同 20 注。
- 44 趙秀榮《試論莫高窟 275 窟北壁故事畫的佛經依據——附 275 窟等年代再探討》，《敦煌研究》1991 年第 3 期。
- 45 國家文物局教育處編《莫高窟北朝石窟的分期》，收入《佛教石窟考古概要》，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 年；暨遠志《中國早期佛教供養人服飾》，《敦煌研究》1995 年第 1 期；暨遠志《酒泉地區早期石窟分期試論》，《敦煌研究》1996 年第 1 期；暨遠志《十六國北朝供養人服飾與石窟斷代》待刊。
- 46 李浴《敦煌莫高窟》，《中國美術史綱》，北京，中華書局，1973 年。
- 47 段文傑《十六國、北朝時期的敦煌石窟藝術》，收入敦煌文物研究所編《敦煌研究文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 48 同 4 注。
- 49 王靜珍《彌勒信仰與敦煌〈彌勒變〉的起源》，收入段文傑主編《1987 年敦煌石窟研究國際討論會文集》。
- 50 孟嗣徽《敦煌早期藝術的圖像與結構空》，收入敦煌研究院編《1994 年敦煌學國際研討會文集——紀念敦煌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石窟藝術卷》，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2000 年。
- 51 傅天仇《敦煌彩塑與環境藝術》，段文傑主編《1987 年敦煌石窟研究國際討論會文集·石窟藝術》。
- 52 肥塚隆《莫高窟第 275 窟交腳菩薩像與犍陀羅的先例》，《敦煌研究》1990 年第 1 期。
- 53 鄧建吾《敦煌莫高窟彩塑之展開》，收入《敦煌莫高窟》第 3 卷，日本東京，平凡社，1981 年。
- 54 同 23 注。

55 同 5 注。

56 李貞姬《敦煌第 275 窟的悉達多思惟象》，《1994 年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4 年印。

57 同 9 注。

58 王惠民《十年來敦煌石窟內容的考證與研究》，收入敦煌研究院編《敦煌石窟內容總錄》，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年。

59 古正美《貴霜佛教政治傳統與大乘佛教》，臺北，臺灣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 年。

60 張元林《莫高窟第 275 窟故事畫與主尊造像關係新探》，《敦煌研究》2001 年第 4 期。

61 石鬆日奈子《敦煌莫高窟北朝時期的彌勒像》，《敦煌研究》2000 年特刊。

62〔英國〕韋陀《2000 年國際敦煌學討論會》，《敦煌研究》2000 年特刊。

63 同 22 注。

64〔日〕宮治昭著，顧虹譯《敦煌美術與犍陀羅·印度美術——早期敦煌美術受西方影響的三個問題》，《敦煌研究》1995 年第 3 期。

65 杜斗城《從轉輪王到尤王》，收入敦煌研究院編《1990 年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石窟藝術編，瀋陽，遼寧美術出版社，1995 年。

66 同 64 注。

67 賴鵬舉《絲路佛教的圖像與禪法》，2002 年，臺灣印。

敦煌石窟藝術研究的拓展與深入

胡同慶 (敦煌研究院)

縱觀近幾年來敦煌石窟藝術的研究狀況，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特點，就是研究領域的不斷拓展與深入。具體則體現在研究之地域範圍的擴展與研究之學科內容之深入，如將研究敦煌石窟的範圍擴展往甘肅各地石窟乃至全國各地大中小石窟，將研究敦煌石窟藝術的領域往佛教藝術史、中國美術史、文化史乃至相關的宗教美學、經濟、歷史等領域深入探討。

自 2000 年以來，在近五年的時間內，敦煌研究院與蘭州大學敦煌研究所等單位共舉辦了六次大型的國際性的學術會議。如 2000 年 7 月 29 日~8 月 3 日敦煌研究院在“敦煌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紀念”舉辦的“2000 年敦煌學國際學術討論會”，2001 年 7 月 13 日~14 日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臺灣地區南華大學、美國密西根大學聯合舉辦的“敦煌佛教藝術文化國際研討會”，2002 年 7 月 15 日~18 日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與麥積山石窟藝術研究所聯合舉辦的“麥積山石窟藝術與絲綢之路佛教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2002 年 9 月 23 日~25 日甘肅省敦煌學學會與炳靈寺文物保護研究所聯合舉辦的“炳靈寺石窟學術研討會”，2004 年 7 月 1 日~3 日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與美國密西根大學中國研究中心聯合舉辦的“佛教藝術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2004 年 8 月 15 日~20 日在“敦煌研究院成立 60 周年暨常書鴻先生誕辰 100 周年紀念活動”中由敦煌研究院主辦、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協辦的“2004 年石窟研究國際學術會議”。在這六次學術研討會的內容，不僅都涉及到石窟藝術研究，更重要是其研究範圍，明顯地由敦煌石窟往甘肅各地石窟以及全國大中小石窟擴展，有由點帶面的研究趨向，首先是以敦煌石窟為點，帶動甘肅及全國各地石窟藝術的研究；其次是在此基礎上，又分別以麥積山、炳靈寺等大中石窟為點，帶動相關的石窟藝術研究。如果再結合 2004 年 8 月和 10 月分別在龍門、大足等石窟舉辦的學術研討會的情況來看，更會發現由敦煌為點帶動甘肅、全國，然後又由麥積山、炳靈寺、北石窟寺、龍門、大足等大、中型石窟為點，帶動周邊石窟研究，反過來又促進敦煌石窟藝術的研究，促進全國石窟藝術的研究，其意義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值得肯定、總結和進一步發展的新狀況。

從參加各次學術會議的論文內容來看，“2004 年敦煌學國際學術討論會”共收到論文 191 篇，其中涉及石窟藝術的便有 68 篇，而其中探討克孜爾石窟的為 4 篇，炳靈寺石窟的為 2 篇，麥積山石窟的為 1 篇，甘谷石窟的為 1 篇，巴蜀石窟的為 1 篇，顯示了關注其他中小石窟的研究趨向。另外具體內容有披露新發現的《敦煌莫高窟“九層樓”考古新發現》、《二十世紀末新發現——阿艾 1 號石窟》等論文；更多的是專題性研究，如以彌勒為主題的《莫高窟 275 窟故事畫與主尊造像關係新探》、《敦煌北朝時期的彌勒像》、《敦煌隋至唐前期的彌勒像》、《敦煌初唐的彌勒經變》，以山水畫為主題的，如《莫高窟壁畫山水五探》、《莫高窟第 303 窟山水畫試析》、《敦煌唐代山水壁畫的空間表現》，也有以飛天為主題的，如《敦煌飛天》、《人類對天際夢境與飛天思想發生概說》、《以敦煌飛天為基準的美的設計方法》，還有以樂舞為主題的，如《解讀北京圖書館所藏敦煌殘卷舞譜資料 (NO. 820)》、《對敦煌舞譜研究中若干問題的再認識》、《佛國仙婆妙入神，特教新傳娛萬民——評我國首創敦煌舞基本訓練教材》、《〈高麗樂〉在敦煌壁畫舞姿中的反映》，等等，也顯示了研究者們關注的研究傾向。

“敦煌佛教藝術文化國際研討會”收到論文 39 篇，在討論石窟藝術的 11 篇論文中，有介紹考古新發現的《莫高窟新發現的窟龕與墓塔遺跡》，也有對具體圖像進行研究的《敦煌盧舍那佛法界圖像研究》、《阿彌陀經的光明信仰與藥師經的審判思想》、《須彌山圖像在中國佛教藝術中的表現與意義》，值得注意的是在會議上宣讀的《麥積山石窟北朝雕塑藝術體現的佛教人間化》、《敦煌莫高窟發現的剪紙藝術品》等論文，顯示出石窟藝術研究開始關注甘肅其他石窟和其他敦煌藝術品，顯示出地域範圍和研究物件的拓展跡象。

“麥積山石窟藝術與絲綢之路佛教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收到論文 62 篇，其中涉及石窟藝術的有 48 篇，而其中探討麥積山石窟的 26 篇，敦煌石窟的 5 篇，甘肅河西、炳靈寺、隴東等石窟的 4 篇，涉及四川石窟的 4 篇，南京棲霞山石窟的 1 篇，既顯示了敦煌石窟研究對麥積山石窟研究的影響，也顯示了麥積山石窟與周邊石窟的關係，和局部的以點帶面的影響。從內容

上看,也較多地反映了麥積山與絲綢之路及周邊的關係,如《從麥積山石窟藝術看絲路佛教文化的特質》、《從麥積山“寂陵”談西魏時期關隴地區的文化融合》、《從印度到中國——絲綢之路的睽子故事與藝術》、《四川南朝造像對麥積山的影響與傳播》、《試論麥積山北朝石刻像與青州石刻造像所受南朝之影響》、《再論隴山左右的北魏石窟及其向西的影響》、《隴南麥積山石窟與巴蜀石窟》等,而這類輻射性的研究在以前探討敦煌石窟的論文中則很少,這類研究幫助我們將視線從敦煌石窟一下子拉向隴東、隴南乃至山東、四川、江蘇等全國各地,眼界和思路大大擴展。另外,《試探麥積山石窟摩崖龕的功能和意義》、《麥積山石窟窟形二題》、《談麥積山石窟的北周窟龕》、《論敦煌石窟崖面上的“王公窟”現象》、《敦煌莫高窟前殿堂遺址平面及木窟簷的尺度問題初探》、《覆斗型殿堂窟原型初探》的專題研究也促進了有關洞窟形制的深入研究。

“炳靈寺石窟學術研討會”收到論文 34 篇,其中專論或主要論述炳靈寺石窟藝術的為 20 篇,如《炳靈寺石窟第 1、16、90、133 窟的清理與研究》、《炳靈寺建弘紀年應為建弘五年》等,另外 14 篇論文有的是討論炳靈寺周邊地區的歷史和文化,有的是討論整個甘肅乃至絲綢之路的歷史和文化,有的是探討炳靈寺與麥積山、敦煌、龜茲等石窟之間的關係,還有探討河西水陸畫以及討論甘肅省旅遊紀念品開發的論文,如《永靖縣歷史沿革考》、《佛教東傳與炳靈寺》、《麥積山石窟與炳靈寺北朝窟龕的異同》、《敦煌石窟與禪觀相關的幾個問題》、《甘肅河西水陸畫簡介》、《論敦煌服飾的開發》等。

“佛教藝術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收到論文 46 篇,在與石窟藝術有關的 20 篇論文中,探討敦煌石窟藝術的為 11 篇,探討麥積山、馬蹄寺、隴南、隴東等中小石窟藝術的有 4 篇,由此可以看到以敦煌為點向甘肅各地石窟開拓的發展趨勢。同時從《敦煌寫本遼真贊所見真堂及其相關問題》、《敦煌文獻與水陸畫》、《敦煌壁畫中的朝鮮外交使者》、《佛教石窟造像的視覺心理藝術效果》、《敦煌壁畫中的婦女面靨妝》等論文可以看到研究領域開始將更多地將石窟藝術與歷史文獻學、中外關係學、社會學、美學、心理學等學科結合在一起,值得重視。另外的 26 篇關於其他佛教藝術、佛教文化、佛教思想等方面的論文,也於進一步深入研究石窟藝術很有幫助,如《海德寺和紅城感恩寺藏傳佛教藝術》、《張淮深與宗教關係初探》等。

“2004 年石窟研究國際學術會議”收到石窟研究方面的論文有 100 篇,其中討論敦煌石窟的論文為 58 篇,另外討論克孜爾、金塔寺、天梯山、麥積山、拉梢寺、大像山、王母宮、龍門、雲岡、天龍山、巴中、大足、劍川等大中小石窟的論文有 22 篇,充分展示了以敦煌石窟為點,往全國各石窟拓展的研究趨勢。另外又有以各地佛教文物為主要研究物件的論文 8 篇,如《隋代舍利的表現——以神德寺靈塔址出土舍利容器上的涅槃圖為中心》、《古青州地區北朝晚期佛像服飾的變化》等,也顯示出敦煌石窟的研究領域向更廣泛的佛教美術方向發展。最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專題的討論,更顯示了多學科在敦煌石窟藝術研究領域中的運用和發展,如《敦煌版畫研究概述》、《敦煌遺畫和水陸畫》、《敦煌畫稿資料初識》等,反映了學者們開始關注與石窟藝術相關的其他敦煌藝術品。又如《敦煌第 146 窟壁畫勞度叉鬥聖變中外道信女服飾辨》、《敦煌石窟的服飾文化》、《從敦煌壁畫看佛前供案上的紡織品》、《莫高窟第 220 窟“帝王圖”衣冠服飾》等論文則顯示了敦煌服飾研究的深入情況。又如《遺傳千年的敦煌絹畫技法》、《從丹青的敦煌壁畫到現代重彩畫》、《炳煥多彩的千古“敦煌色”》等論文則反映了學者們重新對繪畫技法的關注。又如《試論敦煌壁畫中的於對稱中求不對稱美學特徵》、《敦煌飛天產生的文化、哲學背景》、《探索連耳三兔神聖的旅程》、《三兔、四人、六馬和其他》、《敦煌藻井“三兔共耳”圖案初探》等論文則顯示了美學、哲學、心理學等學科在敦煌石窟藝術研究中的運用與拓展,同時預示了更廣闊的研究領域。

綜上所述,地域範圍、研究內容和多學科的拓展和深入,不僅體現了近幾年來敦煌石窟藝術研究領域的新進展情況,同時也預示了敦煌石窟藝術研究的未來發展方向。

海峽兩岸對回鶻佛教的研究及存在的問題¹

楊富學 (敦煌研究院)

今天的維吾爾族 (古稱回鶻) 有 700 余萬人, 全民信仰伊斯蘭教, 但在歷史上卻並非如此。在 9~15 世紀間, 他們的絕大多數都是佛教徒, 他們用回鶻語文翻譯佛教經典, 創作佛教內容的各種作品, 建造佛教石窟與寺院, 繪塑佛教壁畫與造像, 使佛教文化在這一時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¹。佛教在回鶻中的長期流行, 又反過來直接影響著回鶻的歷史與文化, 以致成為回鶻文化史、思想史、文學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一方面從周邊同一信仰的民族 (如漢、藏、粟特、吐火羅) 及印度諸族那里汲取自己所需要的營養, 同時又對周邊諸民族 (如藏、西夏、契丹、女真、蒙古) 的佛教有著不同程度的影響。回鶻佛教是中國佛教史上不可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在 20 世紀以前, 人們對回鶻佛教文獻茫然無所知曉, 學界對回鶻文化的了解僅僅局限于漢文及穆斯林史料中一鱗半爪的記載。

由于漢文史籍對回鶻佛教的記載甚為零散, 故我國學界對回鶻佛教史的研究著力不多。較系統的研究成果, 早期有馮家昇先生撰寫的《刻本回鶻文〈佛說天地八陽神咒經〉研究——兼論回鶻人對於〈大藏經〉的貢獻》(《考古學報》1955 年第 9 冊, 183~192 頁) 一文。該文以回鶻文《佛說天地八陽神咒經》為例, 結合古代史書的記載, 粗線條地勾勒了佛教在回鶻中的傳播歷史及回鶻人對佛教的貢獻。繼之, 臺灣學者李符桐先生撰《回鶻宗教演變考》(《國立政治大學卅周年紀念論文集》, 臺北, 1957 年, 299~314 頁)、劉義棠先生撰《維吾爾族之宗教信仰研究》(《維吾爾研究》, 臺北: 正中書局, 1975 年, 433~516 頁), 均設專節探討了佛教在回鶻中流行的情況。以上諸文主要以漢文史料為依據, 而對敦煌、吐魯番諸地發現的回鶻文佛教文獻利用不夠。這一缺陷後來在大陸著名回鶻文研究專家耿世民先生的著作中得到了彌補。

1980 年, 耿先生發表了《古代新疆和突厥、回鶻人的佛教》(《世界宗教研究》1980 年第 2 期, 78~81 頁) 一文, 重點利用對回鶻文佛教文獻以勾勒回鶻佛教的歷史。接著, 孟凡人先生發表《論高昌回鶻的佛教》(《新疆社會科學》1982 年第 1 期, 58~74 頁), 分析了回鶻佛教的文化遺跡、經典留存情況、基本體系與特色。以上述研究為基礎, 結合國內外百年來回鶻文佛教文獻的豐碩成果, 筆者撰成《佛教在回鶻中的傳播》(《慶祝潘石禪先生九秩華誕敦煌學特刊》, 臺北: 文津出版社, 1996 年, 325~351 頁) 一文, 更為全面地描述了佛教與回鶻的最初接觸、盛行直到衰亡的歷史。

佛教的流行, 造就了回鶻譯經大師的出現。10 世紀左右的回鶻勝光法師 (Singqu Sāli Tutung, 即學界過去常說的僧古薩里) 是最典型的代表。耿世民曾撰文《古代維吾爾族翻譯家僧古薩里》(《圖書評介》1978 年第 2 期, 29~34 頁) 講述該法師的重要貢獻。後來他又撰成《回鶻文〈玄奘傳〉及其譯者勝光法師》(《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90 年第 6 期, 66~70 頁) 對以前的研究作了補正。

至於回鶻佛教與藏傳佛教界間的密切關係²、漢傳佛教對回鶻的深刻影響³、回鶻佛教徒在中原的活動⁴, 以及回鶻佛教對周邊民族, 如西夏、遼、金、蒙古的影響等問題⁵, 亦於近期得到了研究。

在漢文史料之外, 研究回鶻佛教更直接、更豐富的證據當來自敦煌、吐魯番等地出土的數量眾多的由回鶻人自己書寫的回鶻文佛教文獻。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宗教、文化的研究能像回鶻那樣多地受惠於地下發掘材料。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以來, 西方列強掀起了一股爭赴新疆、敦煌諸地考古探險的熱潮, 發現了大批的寫本、刻本殘卷 (包括書寫、刊刻於紙、皮革、棕櫚葉、樺樹皮、木板、竹子、絲綢等凡可用於書寫的材料) 和其他文物, 如雕塑 (包括泥塑、木雕、銅雕)、繪畫 (包括壁畫、絹畫、麻布畫、木板畫)、刺繡、陶器、印璽、錢幣等。其中數量最大也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就是那里相繼出土的回鶻文佛教文獻。

¹ 本文系提交“海峽兩岸佛學研究與教學學術討論會”(2001 年 11 月 9~13 日, 臺北: 中華佛學研究所主辦) 的論文, 曾在會議上宣讀。今略作修改, 並補入新近湧現出來的比較重要的研究成果。

這些文獻剛出土不久便引起國際學術界的廣泛重視，不少人都投身於對這些文獻的釋讀、研究與刊佈，湧現出一大批研究專家。最早的如德國的繆勒 (F. W. K. Müller)、勒柯克 (A. von Le Coq)、邦格 (W. Bang)、葛瑪麗 (A. von Gabain)、俄國的拉德洛夫 (W. Radloff)、馬婁夫 (S. E. Malov) 和日本的羽田亨等，繼之又有德國的茨默 (P. Zieme)、羅伯恩 (K. Röhrborn)、法國的哈密頓 (J. Hamilton)、英國的克勞遜 (G. Clauson)、匈牙利學者卡拉 (G. Kara)、日本的山田信夫、小田壽典、梅村坦、森安孝夫、百濟康義、莊垣內正弘、俄國的土穀舍娃 (L. Ju. Tugusheva)、土耳其的阿拉特 (R. R. Arat) 和提肯 (S. Tekin) 等一大批回鶻文專家。他們從收集支離破碎的資料入手，整理、釋讀，筆路藍縷，前赴後繼，終於取得令世人矚目的成果。

我國對回鶻文獻的研究起步較晚，發軔於 20 世紀 50 年代。在此期間，馮家昇先生先後發表了《回鶻文與回鶻文〈玄奘傳〉》(《大公報》1952 年 3 月 4 日)、《回鶻文寫本〈菩薩大唐三藏法師傳〉研究報告》(《考古學專刊》丙種一號，北京，1953 年)、《刻本回鶻文〈佛說天地八陽神咒經〉研究——兼論回鶻人對於〈大藏經〉的貢獻》(《考古學報》1955 年第 9 冊，183~192 頁)、《1959 年哈密新發現的回鶻文佛經》(《文物》1962 年第 7~8 期合刊，90~97 頁)，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重視。

《玄奘傳》記述了唐朝高僧玄奘由長安首途西行印度尋求佛法的傳奇經歷，於 10 世紀左右由著名的回鶻譯經大師勝光法師譯為回鶻文，現存寫本多件，除巴黎、聖彼德堡和柏林所藏外，大部見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凡 250 葉左右。馮家昇先生在長達 35 頁的《研究報告》中，分九部分對該文獻的譯者、翻譯時代、紀年方法及回鶻文譯文本身等進行了較詳盡的論述，並整理出“本書殘葉與漢文本卷葉對照表”，為以後的研究提供了方便。此後，耿世民又對該文獻的第七卷進行了研究，發表有《回鶻文〈玄奘傳〉第七卷研究》(一)(《民族語文》1979 年第 4 期，249~262 頁)、《回鶻文〈玄奘傳〉第七卷研究》(二)(《中央民族學院學術論文》民族語文專刊第 3 輯，1980 年，267~304 頁)。聶鴻音在《回鶻文〈玄奘傳〉中的古音字》(《民族語文》1998 年第 6 期，62~70 頁)中通過研究寫本中的古音字以探討當時西北漢語音韻；黃盛璋則撰文《回鶻譯本〈玄奘傳〉殘卷五玄奘回程之地望與對音研究》(《西北史地》1984 年第 3 期，9~23 頁)對該寫本涉及到的中亞、印度地名、民族名稱的對音進行研究；楊富學撰寫的《回鶻文〈玄奘傳〉及其相關問題》(《敦煌佛教藝術文化論文集》，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 年，108~115 頁)則通過回鶻文譯者對漢文底本的修改，以探討該文獻之意義及其所反映的歷史文化現象。

《佛說天地八陽神咒經》是中土高僧所撰的“偽經”，在中原地區並不十分流行，正規的大藏經一般都不予收錄，有趣的是，它卻是迄今所知回鶻文佛經殘卷中所占比例最大的一種經典，其抄本、刻本殘卷在西域、敦煌諸地都有發現。馮家昇研究了現存於我國的折疊式刻本，計有三張七面半。其中二張中有“陳寧刊”三字。在馮先生研究之基礎上，張新鷹撰《陳寧其人及回鶻文〈八陽經〉版刻地——馮家昇先生一篇舊作贅言》(《世界宗教研究》1988 年第 1 期，127~131 頁)，指出陳寧的雕版活動主要在元朝中葉，該文獻的刻版地應在杭州。最近，劉元春又撰《〈佛說天地八陽神咒經〉辨析——兼談高昌回鶻佛教的社會文化意蘊》(《西域研究》1996 年第 1 期，50~59 頁)，認為該經雖“偽”，但因其符合高昌回鶻社會的需求，故而得到廣泛傳播。

在馮先生發表的三件文獻中，最受我國學界重視的當推 1959 年於哈密發現的回鶻文《彌勒會見記》。這件由 586 葉寫卷組成的文獻，是一部寫成於 8~9 世紀左右的佛教劇本，由一幕序文和二十五幕正文組成，是現知篇幅最大、數量最多的回鶻文文獻之一。作為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佛教原始劇本，有其獨特而重要的地位。國人對該寫本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湧出一大批重要的成果。其中以耿世民貢獻尤著，他單獨或與他人合作先後發表了多篇論文和專著，犖犖大端者有《回鶻文〈彌勒會見記〉第二幕研究 (Qadimqi Uyurca Iptidayi Drama Piyesasi Maitrisimit (Hami Mushasi) ning 2-Purdasi haqqidiki Tatqiqat)》(《突厥學報 (Turkluk Bilgisi Araştırmaları)》第 4 卷，1980 年，101~156 頁)、《古代維吾爾語佛教原始劇本〈彌勒會見記〉(哈密寫本)研究》(《文史》第 12 輯，1981 年，211~226 頁)、《哈密本回鶻文〈彌勒會見記〉第十六幕研究 (Das 16. Kapitel der Hami-Version der Maitrisimit)》(《突厥學報 (Turkluk Bilgisi Araştırmaları)》第 9 卷，1985 年，71~132 頁)、《彌勒菩薩從兜率天降生——哈密本回鶻文〈彌勒會見記〉第十幕研究 (Das Herabstieg des Bodhisattva Maitreya

vom Tusita-Götteland zur Erde. Das. 10. Kapitel der Hami-Handschrift der Maitrisimit))《古代東方研究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第 14 卷, 1987 年, 350~376 頁)、《彌勒菩薩的顯現——哈密本回鶻文〈彌勒會見記〉第十一幕研究 (Das Erscheinen des Bodhisattva. Das. 11 Kapitel der Hami-Handschrift der Maitrisimit)》(《古代東方研究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第 15 卷, 1988 年, 315~366 頁)、《哈密本回鶻文〈彌勒會見記〉前五幕研究 (Das Zusammentreffen mit Maitreya. Die ersten Fünf Kapitel der Maitrisimit)》(威斯巴登, 1987 年)、《古代回鶻語佛教啟示錄研究 (Eine buddhistische Apokalypse)》(奧普拉登—威斯巴登, 1998 年), 等。其中部分成果見刊于耿氏新近出版的《新疆文史論集》(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2001 年)和《維吾爾古代文獻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2003 年)中, 可以參見。

回鶻文研究專家李經緯對該寫本的研究也投入了較大的精力, 先後發表了《〈如來三十二吉相〉回鶻譯文淺論》(《喀什師範學院學報》1981 年第 1 期, 47~56 頁)、《哈密本回鶻文〈彌勒三彌底經〉第二卷研究》(《民族語文研究論文集》, 西寧: 青海民族出版社, 1982 年, 673~704 頁)、《哈密本回鶻文〈彌勒三彌底經〉第三卷研究》(《中亞學刊》第 1 輯, 中華書局, 1983 年, 180~211 頁)等一系列論文。

維吾爾族學者斯拉菲爾·玉素甫、多魯坤·闕白爾、克尤木·霍加也積極投身於對這一具有重大學術價值文獻的研究。他們在《回鶻文彌勒會見記》第 1 卷(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8 年)中整理刊佈了序言與前 4 幕。除了用漢、維吾爾兩種文字的譯文之外, 尚有原文轉寫、內容考釋、語法成分與詞綴、照片登記表等, 並附有原件照片, 體例完備, 內容豐富, 是回鶻文《彌勒會見記》研究中的一項重要成果。此外, 他們還單獨或合作發表了十餘篇很有價值的論文, 如《回鶻文〈彌勒會見記〉第三幕研究》(《新疆大學學報》1982 年第 1 期, 56~85 頁, 維吾爾文版)、《回鶻文〈彌勒會見記〉第二幕研究》(《新疆社會科學》(維吾爾文版)1982 年第 4 期, 84~150 頁)、《哈密本回鶻文〈彌勒會見記〉第三品研究》(《民族語文》1983 年第 1 期, 50~64 頁)、《回鶻文大型佛教劇本〈彌勒會見記〉》(《新疆藝術》1985 年第 1 期, 30~36 頁)、《〈彌勒會見記〉成書年代新考及劇本形式新探》(載曲六乙、李肖冰主編《西域戲劇與戲劇的發生》,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11~19 頁), 等。這些研究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彌勒會見記》文獻本身及佛教對回鶻文化關係的認識。

繼馮家昇之後, 耿世民成為我國研究回鶻文佛教文獻的主將, 陸續發表了一大批重要的研究成果。除上文提到的他對哈密本回鶻文《彌勒會見記》、吐魯番本《玄奘傳》的研究之外, 他還研究了敦煌出土的《八十華嚴》⁶、《阿毗達磨俱舍論》⁷、吐魯番發現的《土都木薩里修寺碑》⁸、酒泉文殊溝發現的《重修文殊寺碑》⁹、酒泉東關發現的《金光明最勝王經》¹⁰、吐魯番出土的《聖救度佛母二十一種禮贊經》¹¹、哈密本《十業道譬喻鬘經》等¹²。耿先生所研究的文獻, 除《金光明最勝王經》外, 其餘大都收藏於國內, 由他首次譯釋、研究、刊佈, 極大地促進了世界突厥學界對回鶻文文獻進行全面研究的工作。

《金光明最勝王經》是《彌勒會見記》之外的另一部篇幅巨大的回鶻文古文獻, 系據義淨譯本轉譯而成。現存寫本六種, 刻本一種, 計有 400 多葉, 大多見藏于聖彼德堡和柏林, 其中的刻本保存完好, 字跡清楚, 成為我國及國際回鶻文研究中的一個重點。斯拉菲爾·玉素甫與克由木·霍加合著有《回鶻文〈金光明最勝王經〉片斷》(《源泉》1980 年第 2 期, 359~372 頁, 維吾爾文版); 卡哈爾·巴拉特與迪麗達爾·買買提敏合著《回鶻文〈金光明最勝王經〉序品》(《新疆社會科學》(維吾爾文版)1984 年第 1 期, 71~114 頁)、李經緯發表《回鶻文〈金光明最勝王經〉序品(片斷)譯釋》(《喀什師範學院學報》1987 年第 4 期, 48~60 頁)。

《阿毗達磨俱舍論》現存寫本僅一件, 但散藏於瑞典、日本和國內各收藏單位。甘肅省博物館所藏已由耿世民在前揭論文中發表。敦煌研究院藏的一葉似與之同屬一寫本的文獻, 已由筆者與牛汝極在《敦煌研究院藏的一頁回鶻文殘卷》(《敦煌研究》1991 年第 2 期, 33~36 頁)一文中發表。北京圖書館藏有一葉, 見刊于張鐵山、王梅堂《北京圖書館藏回鶻文〈阿毗達磨俱舍論〉殘卷》(《民族語文》1994 年第 2 期, 63~70 頁)一文。此外, 北京圖書館所藏的敦煌本回鶻文《雜阿含經》、《增壹阿含經》也都於近期相繼得到研究刊佈¹³。

自 1986 年 6 月至 1995 年 11 月，敦煌研究院考古工作者先後六次對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進行了考古發掘，出土了一大批民族古文字材料，其中即有相當數量的回鶻文佛教文獻¹⁴。目前，對這批文獻的研究工作，主要由中央民族大學張鐵山先生進行，自 2000 年始，相繼發表了多篇研究報告，現簡列如下：

1. 《敘利亞文書中回鶻文部分的轉寫與翻譯》，《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第 1 卷，文物出版社，2000 年；
2. 《莫高窟北區 B53 窟出土回鶻文〈雜阿含經〉殘葉研究》，《敦煌研究》2001 年第 2 期；
3. 《敦煌莫高窟北區出土回鶻文〈中阿含經〉殘葉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01 年第 4 期；
4. 《莫高窟北區 B159 窟出土回鶻文〈別譯雜阿含經〉殘卷研究》，《民族語文》2001 年第 6 期；
5. 《敦煌莫高窟北區 B52 窟出土回鶻文〈阿毗達磨俱舍論實義疏〉殘葉研究》，《敦煌學輯刊》2002 年第 1 期；
6. 《敦煌莫高窟北區 B159 窟出土回鶻文〈別譯雜阿含經〉殘卷研究（二）》，《民族語文》2003 年第 1 期；
7. 《敦煌莫高窟北區出土回鶻文文獻過眼記》，《敦煌研究》2003 年第 1 期
8. 《敦煌莫高窟北區出土兩件回鶻文佛經殘片研究》，《敦煌學輯刊》2003 年第 2 期；
9. 《敦煌莫高窟北區出土三件佛經殘片研究》，《民族語文》2003 年第 6 期。
10. 《敦煌莫高窟北區出土回鶻文文獻譯釋研究（一）》，《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第 2 卷，文物出版社，2004 年；
11. 《敦煌莫高窟北區出土回鶻文文獻譯釋研究（二）》，《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第 3 卷，文物出版社，2004 年。

除了上述研究成果較為集中的文獻外，分散研究其他回鶻文佛典的成果還有很多，茲不一一列舉。

在敦煌地區的莫高窟、榆林窟和西千佛洞等石窟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另外一種比較特殊的回鶻文佛教文獻，那就是石窟中所見的回鶻文題記。經筆者普查，現已發現者約有 300 餘條，其中以榆林窟為最多，內容也最豐富。在現存的 41 個洞窟中，可見到回鶻文題記的就有 20 個，計有 190 條，590 餘行。莫高窟次之，現已發現的也有 100 餘條。這些題記大多書寫於石窟的甬道壁上，其中為數最多的是遊人、香客的題辭，但也有一定數量的壁畫榜題和回鶻供養人題記。在通常情況下，題記書寫者一般都要寫上自己的名字與官銜，何時、何因從何地來此，又在這裡做了什麼樣的功德善事。這些都是當時真人真事的確切記錄，一般不見於史書的記載，為我們研究宋元時代敦煌、河西乃至絲路地區的回鶻佛教狀況提供了最原始、最直接的資料。遺憾的是這些題記大都漫漶不清，難以辨識，經過數年努力，我們也僅刊佈了其中的十餘條¹⁵。

在 9~13 世紀回鶻佛教興盛的時代，信徒們大興土木，修建寺院，開鑿洞窟，妝鑿佛像，彩繪壁畫，蔚為大觀。作為高昌回鶻王國的首都，吐魯番一帶佛教非常興盛，伯孜克里克千佛洞至今還留存著相當豐富的回鶻壁畫，其藝術特色，在賈應逸《高昌回鶻壁畫藝術特色》（《新疆藝術》1989 年第 1 期，43~48 頁）和任道斌《關於高昌回鶻的繪畫及其特點》（《新美術》1991 年第 3 期，31~40 頁）二文中有著精闢的論述。筆者與趙崇民則撰文探討了伯孜克里克千佛洞內容最為豐富的第 20 窟的壁畫與榜題（《新疆藝術》1992 年第 6 期，51~56 頁）。

吐魯番以北的北庭是高昌回鶻王國的夏都，這裡的回鶻佛寺遺址中也存留有與伯孜克里克藝術風格一致的佛教壁畫。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的《北庭高昌回鶻佛寺遺址》（沈陽：遼寧美術出版社，1990 年）、《北庭高昌回鶻佛寺壁畫》（沈陽：遼寧美術出版社，1990 年）、《新疆吉木薩爾高昌回鶻佛寺遺址》（《考古》1987 年第 7 期，618~623 頁）以及古麗比亞、柴劍虹所著《北庭高昌回鶻佛寺爭分舍利圖試析》（《段文傑敦煌研究五十年紀念文集》，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分公司，1996 年，167~172 頁）從佛寺考古、藝術風格和壁畫內容諸方面對該遺址的回鶻佛畫進行了論述。

敦煌回鶻佛畫近來也引起了國內外學界的重視，劉玉權發表了《關於沙州回鶻洞窟的劃分》（《1987 年敦煌石窟研究國際討論會文集·石窟考古編》，沈陽：遼寧美術出版社，1990 年，1~29 頁）和《沙州回鶻洞窟的藝術》（《中國石窟·安西榆林窟》，東京：平凡社，1990 年，240

~253 頁) 二文。前者將沙州回鶻洞窟劃分為前後二期, 筆者在《論沙州回鶻王國(On the Sha-chou Uighur Kingdom)》(《中亞雜誌 (Central Asiatic Journal)》1994 年第 38 卷第 1 期, 80~107 頁) 中提出了不同的見解, 認為前期劃分較為可信, 但對後期的歸類問題較多, 主要是忽略了回鶻政權的存亡問題。筆者還曾與牛汝極合撰《敦煌回鶻文書法藝術》(《敦煌吐魯番研究論集》, 北京: 書目文獻出版社, 1996 年, 517~531 頁), 以文獻、石窟題記與敦煌發現的回鶻文本活字為依據, 探討了回鶻書法與佛教的密切關係。

最後, 應予提及的是近期出版的幾部專門研究回鶻佛教或與之密切相關的專著。

其一是耿世民撰寫的《敦煌突厥回鶻文書導論》(臺北: 新文豐出版公司, 1994 年), 該書分突厥回鶻歷史概述、新疆和敦煌古代語文的發現和研究、古代突厥文、回鶻文四個章節對古代回鶻文文書作了全面介紹, 佛教文獻更是其中的重點。

其二是牛汝極於新近出版的《回鶻佛教文獻——佛典總論及巴黎所藏敦煌回鶻文佛教文獻》(新疆大學出版社, 2000 年), 全書主要分為上下兩篇。上篇系統闡述了回鶻佛教文獻的來源、分類、翻譯, 詳盡介紹了敦煌、吐魯番等地出土回鶻文佛教文獻的保存、編號、整理刊佈與研究情況等。下篇全面描述了巴黎所藏敦煌回鶻文佛教文獻的收藏、編號與研究現狀, 為對其中的部分文獻進行了轉寫與譯釋。

其三是筆者所撰系統研究回鶻佛教的專門著作《回鶻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8 年)。全書分為六章, 對回鶻佛教的傳播歷史及其與周邊民族之關係、譯經情況、功德思想、寺院的興建、寺院經濟及佛教對回鶻文明的影響等問題作了比較全面和系統的探索, 同時也是對一個世紀來回鶻佛教研究成果的一次總結。

其四是筆者於近期出版《回鶻文獻與回鶻文化》(民族出版社, 2003 年) 一書。該書在《回鶻之佛教》的基礎上, 進一步系統地研究了回鶻佛教的興衰歷史及其與周邊民族的佛教關係。

其五是筆者剛剛完成的博士後論文——《印度宗教文化與回鶻民間文學》(北京大學博士後研究工作報告, 2004 年 6 月, 中國博士後科研基金資助項目), 全書分為七章, 系統地論述了印度與回鶻的歷史文化關係及印度佛傳故事、佛本生故事、譬喻故事、靈應故事及說唱文學對回鶻民間文學的深刻影響, 也探討了回鶻佛教界對印度民間故事及英雄史詩(如《羅摩衍那》) 進行融攝與改造的途徑與方法問題。

此外, 筆者還曾與牛汝極合撰《沙州回鶻及其文獻》, 將敦煌出土的包括佛教典籍在內的早期回鶻文文獻全部譯為漢語, 並對沙州回鶻的佛教進行鉤沉¹⁶。此後, 筆者出版了《西域敦煌宗教論稿》(甘肅文化出版社, 1998 年) 一書, 在收錄的 21 篇論文中, 近三分之一都與回鶻佛教有關。

以上是對海峽兩岸半個世紀來回鶻佛教研究成果的簡單總結, 內容了涵蓋了研究成果比較集中的幾個領域。從中可以看出, 我國對回鶻佛教的研究儘管起步較晚, 但成就卻是很大的, 尤其是近 20 年間大陸學界湧現出來的成果更是目不暇接, 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廣泛重視, 其前景令人振奮。

同時, 我們還應看到, 我們對回鶻佛教的研究還存在著許多不應忽視的問題。

首先, 海峽兩岸對回鶻佛教的研究顯得極不平衡, 臺灣地區除老一代的學者李符桐、劉義榮先生外, 很少有人繼續從事這一課題的研究, 故雙方缺乏溝通與交流。而在西方, 對回鶻佛教及其文獻的研究可以說是西域佛教研究中成就最為輝煌的領域。

其次, 國內學者對回鶻佛教的研究, 條塊分割現象比較嚴重。幾十年來, 我國的回鶻佛教研究與語言文字的研究常常是脫節的, 佛教研究者, 大多不懂回鶻語言文字; 而研究其語言文字者, 則往往不懂或不從事於回鶻佛教的研究。這種現象的存在, 勢必會對我國(國外也一樣) 回鶻佛教學的研究造成嚴重的影響。如對回鶻佛教思想的探討, 就顯得特別薄弱, 迄今為止, 除了對彌勒崇拜¹⁷、文殊崇拜與五臺山信仰有專文論述外¹⁸, 其餘都屬空白, 實際上就是這一現象的具體反映。

再次, 國內學者對回鶻文佛教文獻的發掘、整理、研究工作還做得不夠。我們知道, 回鶻文佛教文獻有很大一部分早在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即已大量外流, 這部分文獻中比較重要者現已刊佈殆盡, 成為回鶻佛教研究中最為基本的資料。而國內收藏的回鶻文佛教文獻數量也不在

少數，惜見刊者甚少。文獻收藏單位沒有或很少有人從事回鶻文文獻的研究，而研究人員也很難得到研究這些文獻的機會，這種現象的存在勢必會妨礙我們研究水平的提高。

其四，我們對外國學者的研究成果的利用過少。敦煌、吐魯番等地出土的回鶻文佛教文獻流失國外者甚多，而國外在這方面的研究歷史也要比我們長得多，取得的成果極為豐碩，有很多方面是我們迄今都難以企及的，可資借鑒者不少。我們需要更多地了解國內外回鶻佛教研究的基本現狀，取其精華，為我所用，以避免重複勞動，在研究中儘量少走彎路。

【注】

- 1 楊富學《西域敦煌文獻所見回鶻之佛經翻譯》，《敦煌研究》1995年第4期，第1~36頁。
- 2 張羽新《元代的維吾爾族喇嘛僧》，《中國藏學》1996年第2期，第50~59頁；楊富學《藏傳佛教對回鶻的影響》，《法源》第20期，2002年，第247~252頁。
- 3 高士榮、楊富學《漢傳佛教對回鶻的影響》，《民族研究》2000年第5期，第71~76頁；楊富學《漢傳佛教影響回鶻三證》，《覺群·學術論文集》第3輯，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382~393頁。
- 4 楊富學《元代內地畏兀兒僧徒佛事活動輯考》，《宗教與民族》第2輯，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61~180頁；《回鶻與禪宗》，《曹溪禪研究》第3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164~169頁。
- 5 楊富學《回鶻佛教與周邊民族關係論考》，《覺群·學術論文集》第2輯，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418~430頁；《回鶻僧與〈西夏文大藏經〉的翻譯》，《敦煌吐魯番研究》第7卷，中華書局，2004年，第338~344頁。
- 6 耿世民《回鶻文〈八十華嚴〉殘經研究》，《民族語文》1986年第3期，第59~65頁；《甘肅省博物館藏回鶻文〈八十華嚴〉殘經研究》(一)，《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3期，第68~77頁；《甘肅省博物館藏回鶻文〈八十華嚴〉殘經研究》(二)，《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6年第2期，第86~90頁。
- 7 耿世民《回鶻文〈阿毗達磨俱舍論〉殘卷研究》(一)，《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7年第4期，第86~90頁；《回鶻文〈阿毗達磨俱舍論〉殘卷研究》(二)，《民族語文》1987年第1期，第56~61頁；Geng Shimin, A study of newly discovered folio of the Uighur Abhidharmakośaśāstra,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 33, no. 1-2, 1989.
- 8 耿世民《回鶻文〈土都木薩里修寺碑〉考釋》，《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1期，第77~83頁。
- 9 耿世民《元回鶻文〈重修文殊寺碑〉初釋》，《考古學報》1980年第2期，第253~264頁。
- 10 耿世民《回鶻文〈金光明最勝王經〉第六卷四天王護國品研究》，《中央民族學院學報》(語言文學增刊3)，1986年，第95~101頁；《回鶻文〈金光明最勝王經〉第九卷長者流水品研究》，《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第2輯，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7~54頁。
- 11 耿世民《回鶻文〈聖救度佛母二十一種禮贊經〉殘卷研究》，《民族語文》1990年第3期，第26~31頁。
- 12 Geng Shimin, H. J. Klimkeit, J. P. Laut, Prolegomena zur Edition der Hami-Handschrift der Uigurischen Daśakarmapathāvadānamālā, *Türk Dilleri Araştırmaları* Vol. 3, 1993, pp. 213-230.
- 13 張鐵山《敦煌本回鶻文〈雜阿含經〉殘卷研究》，《段文傑敦煌研究五十年紀念文集》，世界圖書出版公司，1996年，第348~355頁；《回鶻文〈增壹阿含經〉殘卷研究》，《民族語文》1997年第2期，第28~33頁。
- 14 彭金章、王建軍《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第1-3卷，文物出版社，2000-2004年；彭金章、王建軍《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所出多種民族文字文獻和回鶻文木活字綜述》，《敦煌研究》2000年第2期；楊富學《敦煌回鶻文佛教文獻及其價值》，《戒幢佛學》第2卷，嶽麓書社，2002年，第111~119頁。
- 15 哈密頓、楊富學、牛汝極《榆林窟回鶻文題記譯釋》，《敦煌研究》1998年第2期，第39~54頁。
- 16 楊富學、牛汝極《沙州回鶻及其文獻》，甘肅文化出版社，1995年。
- 17 楊富學《回鶻彌勒信仰考》，《中華佛學學報》第13期卷上，2000年，第21~32頁。
- 18 楊富學《居庸關回鶻文功德記 uday 考》，《民族語文》2003年第1期，第62~64頁；《回鶻五臺山信仰與文殊崇拜考》，《麥積山石窟藝術文化論文集》(下)，蘭州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41~447頁。

“醫學：從敦煌到中亞”學術研討會簡述 陳明（北京大學）

2004 年 7 月 1 日-2 日，由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法國高等實驗研究院的中國文明研究組 (UMR 8583 Civilisation chinoise CNRS/EPHE)，以及巴黎東方語言學院 (INALCO) 漢學研究中心 (EA 118 Centre d'études chinoises) 聯合舉辦的“醫學：從敦煌到中亞” (Médecine à Dunhuang et en Asie Centrale) 學術研討會，在巴黎東方語言學院的學術報告廳舉行。會議的實際組織者是戴思博 (Catherine DESPEUX) 教授。

本次會議是配合戴思博教授主持的“中古中國的醫學、宗教與社會：以敦煌醫學文獻為中心” (Médecine, religion et société dans la Chine médiévale: les documents médicaux de Dunhuang) 項目而召開的，共有來自歐美和中國等地的 13 位學者發表了論文。論文的內容依發表次序，略述如下：

Catherine DESPEUX (戴思博) : *Documents médicaux et pratique médicale à Dunhuang* (敦煌的醫學文書與醫療實踐)。

這是本次會議的主題報告。本文全面概述了敦煌的醫學文書的內容與價值，勾勒了在敦煌曾經存在的醫療實踐活動的概貌。一些人認為敦煌醫學卷子為民間醫學的作品，與此看法不同，作者認為不能把它們看成是民間醫學的東西，而是文人醫學的產物。作者認為，敦煌的醫學卷子為我們提供了認識唐代醫學的另一種途徑。由此可以進一步探討這些醫學知識在當時是如何運用的，醫書是如何傳播的等等問題。敦煌醫學文書還可以幫助我們確定治療史與文化交流史中的相關問題，並認識到印度生命吠陀的影響以及佛教仲介的作用。就未來的研究走向，作者還進一步指出，佛教寺院與僧人在敦煌的醫療活動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在中亞亦是如此，所以要將此研究延伸至中亞部分，通過瞭解這些療法與藥品的流通，以證明當時醫學知識多方互動之強大生命力。

Donald Harper (夏德安) : *Three Medieval Wuzang lun Texts in Manuscripts from Dunhuang and Turfan* (敦煌吐魯番寫本中的三種中古時期的《五臟論》)。

本文主要討論了敦煌出土的《張仲景五臟論》、《明堂五臟論》和吐魯番出土的《耆婆五臟論》。以往的研究者多注重《五臟論》中哪些是最古老的本子，強調其學說源頭的重要性，而作者卻認為，《五臟論》的知識流變更值得我們關注，因為正是那些在流傳過程中所產生的諸般變化，恰恰反映出了當時人們的心態。

Alain Arrault (華瀾) : *Méthodes hémérologiques et activités médicales à Dunhuang du IX^e au X^e siècle* (九至十世紀敦煌的占卜方法與醫療實踐)

本文分析了與醫療相關的 50 來件曆日文書，通過與傳世文獻的比較，重點討論了其中的“日遊”、“人神法”與選擇活動中有關醫療（治病，療病，服藥等）的運用。“人神法”在曆日寫卷中多用大號字體來顯示，與會者對這一現象及其背後的原因，各抒己見。

Lewis Mayo (劉一) : *Illness, suffering and systems authority in Guiyi jun Dunhuang* (敦煌歸義軍時期的疾病、苦患與體制權威)

本文從醫療與政治的角度，討論了歸義軍時期敦煌地區流行的疾病，歸義軍政權在應對疾疫時所採取的各種措施，從而解釋了政權體制在社會醫療方面所產生的作用。本文不同於一般討論中國古代醫療體制（官制）的論文，而著重在社會史的層面進行探討。

Vivienne Lo (羅維前) : *Treatment of Illness in the Dunhuang Moxibustion Charts* (敦煌灸法圖中的疾病處理)

本文主要討論《新集備急灸經》、《灸經明堂》、《人神流注》等敦煌的灸術文獻，它們提供了多幅灸術的圖像。與馬王堆帛書中的記載不同，敦煌的灸法圖揭示了實用的方法，只列出了所灸的穴位，而沒有與氣、脈、針法、藥理等方面清楚的關係。因此，這些圖是“備急簡要”型的，適合居家實用。若結合敦煌醫方中眾多的“單方”現象，就更能明瞭作者所指出的敦煌地區存在“備急單要”的醫療特點。

Elisabeth Hsü (許小麗) : *Outline of the Contents of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on the Pulses* (敦煌脈學寫卷的內容概述)

本文分二個部分。其一，作者概述了英藏和法藏敦煌文獻中有關脈學寫卷的內容，分別對《平脈略例》、《五藏脈候陰陽相乘法》、《占五藏聲色源候》、《玄感脈經》、《陰陽逆乘伏》、《青烏子脈訣》、《七表八裏三部脈》等所在的卷子，作了細緻的比較。其二，分別討論了脈的數目變化、在三部(寸、關、尺)診脈的方法、九候。作者認為，脈的數量的變化，與對脈的陰陽性質的區分有關係，因此，在寫卷中，脈的數目不是一致的。“三部九候”在《素問》中是連起來使用的慣用語，而在敦煌卷子中，“三部”往往單獨使用。這些差別恰恰反映了敦煌脈學寫卷的價值。

Ute Engelhardt (英悟德) : *Les Pharmacopées dans les manuscrits de Dunhuang* (敦煌寫卷中的本草著作)

本文共三個部分。首先概述了漢唐之際正史中所記載的本草書目。其次，分別對敦煌文書中有關藥物與食療的文書進行了分析，主要包括《神農本草經集注·序》、《新修本草》的 5 個殘卷、《食療本草》的 1 個殘卷。再次，對《神農本草經集注·序》中所記載藥方的初步分析，列出了 83 種病症名稱，強調了這些藥方的適用病症。作者認為，這些文書對中國本草的發展史提供了新的認識。其中有些藥物的記載後世都消失了，但在敦煌文獻中卻保留了下來。那麼，當時這些藥物的具體應用情況如何？為什麼它們後來被“篩選”掉了。這些問題仍然期待著答案。

Sophie Campistron-Atimi : *Recettes de soins du corps dans les manuscrits médicaux de Dunhuang* (敦煌醫書中的“美容方”)

在概述中國“美容方”的簡要歷史後，本文指出，作為醫學的一部分，“美容方”所指涉的主要與人們身體內部的問題有關。本文對 S.4329v 與 S.1467-2 中的美容方劑，進行了分析，討論了它們的內容、制藥方法、用途(熏衣、洗臉、洗髮、治口臭等)、藥劑形態(粉、膏等)，並將它們與傳世醫書中的記載進行了比較。作者認為，“治面黑”來自一個更古老的方子，敦煌本中的改動顯得更為自由、民間化。本文只著重於技術方面的問題，惜未涉及到美容方與古人們的審美觀念以及日常生活之聯繫。

Fang Ling (方玲) : *Les Xin pusa jing, le Quanshan jing et les maladies* (《新菩薩經》、《勸善經》與疾病)。

在敦煌遺書中，有五十來篇佛教偽經《新菩薩經》和《勸善經》寫本。抄寫年代在八至十世紀之間。牧田諦亮等日本和法國學者都從總體上將兩經一起論述，從未在細節上比較探討。本文從寫本中所提到的病死內容入手，從而發現實際上這些寫本可分為四種：《新菩薩經》“六病”本兩種、“十病”本一種和《勸善經》“七病本”一種。通過比較各本中的病死和出文故事內容等區別，作者展示了從《新菩薩經》到《勸善經》的發展演變過程。其間死因集中到疾病、及病死在各本中的差異，一方面反映了當時中國佛教如何回答信徒將病患區別于其他人生之苦的心理需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不同時期不同的疾病威脅，但後者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與會者主要圍繞著《新菩薩經》和《勸善經》是否為敦煌當地的作品這一問題進行了討論。

Anne-Lise Palidoni : *Les plantes indiennes dans les manuscrits médicaux de Dunhuang* (敦煌醫學寫本中的印度植物)

作者的博士論文是研究敦煌壁畫中的印度植物，此文與之密切相關。作者從 20 多件文書中，辨認出 50 來種印度植物，並指出這些印度植物的具體運用有兩大場合：用於宗教儀式中和用於治療之中。這些文書見證了中國與印度在絲綢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作者認為，西北的氣候不適宜種植這些印度植物，只有進口才有可能，故其用途受到限制，它們也就成了稀罕的用品。敦煌寫經（包括偽經）中的抄寫情況不一，這些植物名詞有很多不同的寫法，給辨認工作帶來很多困難。實際上，印度植物的漢譯名稱在敦煌文獻中存在著諸多變化。另外，這些植物到底是通過什麼樣的途徑來的？敦煌寫經中所提到的植物是否確實在當時出現過？這些問題還有待進一步的探討。

陳明《中古時期的“護諸童子”方：敦煌醫學文獻中的本土與外來的知識》(*Protection of Children or Kaumara-bhryta in Medieval China: Indigenous and foreign knowledge in Dunhuang medical manuscripts*)。

本文主要討論了敦煌文獻中有關“護諸童子”的資料，就具體的方劑而言，敦煌的少兒醫方基本上是中醫的。其中，又可分為“使用藥物”與“使用方術”兩類。敦煌祈願文書中的“護諸童子”的觀念，與佛教有著密切的聯繫。敦煌紙畫所反映的“護諸童子女神”(bala-graha)的觀念是外來的，也夾雜著印度佛教與生命吠陀的因素。敦煌本土與外來的知識混合在一起，導致了敦煌“護諸童子”的豐富性，這是傳世的中醫典籍中所沒有的圖景。因為敦煌有印度生命吠陀的“八術”，而且有絲綢之路上的童子方作為背景，因此，外來的“護諸童子”的知識在此傳播也就不難理解了。與會者就中古時期的護胎與求子究竟是在婦科還是在兒科的範疇、以及產科的學術分野等問題上，進行了有趣的爭論。

Eric Trombert (童丕): *Liste des denrées en vente sur le marché de Turfan* (吐魯番的貿易品之清單)。

這只相當於一篇論文初稿，還未成文。本文主要列條了交河郡市估案文書中記載的吐魯番貿易品的清單，特別是將其中的藥材排列出來，初步分析了這些藥材的價格和不同來源。作者當時還沒有深入的解析和具體的結論。該文應該與池田溫先生關於交河郡市估案文書的幾篇論文一起來閱讀。

Georges Jean Pinault: *Transferts de la science médicale indienne dans le bassin du Tarim du V^e au X^e siècle de notre ère* (五至十世紀印度醫學知識在塔里木盆地的傳播)。

本文也只是一篇論文的綱要。作者主要介紹了西域出土文獻中有關印度醫學的一些記載，特別指出與醫術相關的那些吐火羅語 B 文書和梵語文書的歷史價值。作者還以幾個藥方為例，指出了這些胡語醫學文獻(吐火羅語 B 文書為代表)，對印度醫學知識的繼承，特別是那些抄本中帶有較明顯的評注性質。本文無疑為我們進一步認識中古時期域外醫學在塔里木盆地的傳播提供了一個新的視窗。

會議的組織者認為，本次會議為“中古中國的醫學、宗教與社會：以敦煌醫學文獻為中心”項目組的成員以及其他方面的專家，提供了一個交流的機會，對敦煌醫學文獻有了一些綜合性的看法，也明瞭以往的一些所謂“共識”有誤區。對敦煌醫學文獻的性質(官方的還是民間的?)、怎麼瞭解和評價它們的價值、它們是否能代表當時的醫學(代表了實際上的還是理論上的醫學)，對這些問題需要有了新的眼光去看待和研究。通過不同知識背景學者的交流，大家普遍認識到外來的醫學知識在敦煌、西域地區的存在及其價值，這也為今後的研究開闢了新的途徑。同時也有必要更深入研究這些醫學文獻與當時的社會生活以及宗教等方面的複雜關係。

(*本文的寫作得到了方玲博士的幫助，特此致謝！)

“常書鴻先生誕辰 100 周年紀念會”在杭州隆重舉行 許建平（浙江大學）

在“敦煌守護神”常書鴻先生誕辰 100 周年之際，為緬懷先生，弘揚他獻身事業、嚴謹治學的可貴品質，以激勵浙江學人在敦煌學領域勤奮耕耘，2004 年 12 月 22 日，浙江省敦煌學研究會和浙江省博物館、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在西子湖畔共同舉辦了“常書鴻先生誕辰 100 周年紀念會”。

自藏經洞發現以來，敦煌這個名字一直吸引著無數中外學者的關注，敦煌研究也已歷經幾代學人的傳承，發展成一門世界性的顯學。值得一提的是，敦煌成“學”以來，浙江學人總在各個階段佔據重要地位。正是因為有幾代學人的默默奉獻、辛勤耕耘，才有今天浙江敦煌學研究的繁榮局面。常先生作為具有傳奇色彩的一代敦煌大師，其畢生貢獻敦煌的事業心，已經成為當代浙江敦煌學者的精神財富，感召著一代浙江學人在敦煌學研究中甘於寂寞、孜孜以求。

在當日的紀念會上，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浙江大學教授毛昭晰先生，浙江省文化廳副廳長、省文物局局長鮑賢倫，浙江省社科聯副主席連曉鳴，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副會長、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教授，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副會長、上海師範大學郝春文教授，浙江省敦煌學會名譽會長、中國美術學院王伯敏教授及常書鴻先生家屬代表常沙娜教授作了講話。浙江省政協副主席徐鴻道也在百忙之中參加了會議。會後，所有領導和來賓近百人參觀了重新整葺一新的常書鴻美術館，流連于先生的作品前，共同重溫常書鴻的藝術情操、藝術信念和藝術人生。

會議還安排了有關敦煌學術的研討。研討會上，浙江敦煌學研究會會長、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所長張湧泉教授的“《敦煌文獻合集》編纂漫談”，浙江敦煌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絲綢博物館副館長趙豐教授的“敦煌絲織品的發現與研究”，浙江敦煌學研究會副會長、浙江大學電腦系魯東明教授的“數據化技術與敦煌藝術的保護、修復”，職業畫家楊東苗、金衛東的“敦煌畫師的用筆”等專題報告不但充分展示了浙江敦煌學界的最新成果，而且有力地證實了浙江敦煌研究已經從過去偏重文獻的“獨門偏科”發展為以文獻為主，涵蓋文物保護、藝術研究、數據化技術等多學科的綜合體系，已經突破了原有的地域和空間及學術分隔的限制，向著更高、更深的層次和方向發展。

本次會議得到了浙江省社科聯、浙江省文化廳的有力支持。會議論文集《浙江與敦煌學——常書鴻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文集》已由浙江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

特別展覧会「守屋コレクション寄贈 50 周年記念
古写経—聖なる文字の世界—」を終えて

赤尾栄慶 (京都国立博物館)

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館では、2004 年 10 月 19 日 (火) より 11 月 28 日 (日) までの 6 週間
にわたり、特別展覧会「守屋コレクション寄贈 50 周年記念 古写経—聖なる文字の世界—」
を開催した。この特別展覧会は、1954 年に日本国内屈指の古写経コレクションである「守屋
コレクション」が本館に寄贈されて、丸 50 年を迎えたことを記念し顕彰するためのものであ
った。「守屋コレクション」は、弁護士として法曹界に重きをなした守屋孝蔵先生が収集した
ものであり、中国・朝鮮・日本という漢字文化圏で書写された古写経 268 件からなっている。
先生が 1953 年 10 月 25 日に亡くなったことを承けて、翌年の 4 月にご子息である美孝氏がそ
れらを一括して寄贈されたものであり、その中には国宝 1 件、重要文化財 35 件、重要美術品
37 件が含まれている。

この展覧会では「隸意から写経体へ—中国・朝鮮の写経—」、「写経体の美しさ—奈良時代
—」、「和様化と末法到来—平安時代前期～中期—」、「一字は一仏—平安時代中期～後期—」、
「一切経と裝飾経—平安時代後期—」、「携える・籠める 細字の世界—平安時代～鎌倉時代
—」、「写経の転機—鎌倉時代～室町時代—」、「受け継がれるこころ—般若心経—」という 8
テーマを設定し、中国・朝鮮・日本という漢字文化圏における 1500 年にも及ぶ写経の歴史を
物語る優品 162 件を展示した。それらは、守屋コレクションを中心に、いずれも日本国内に
所蔵されているもので構成されている。

最初の展示は、「隸意から写経体へ—中国・朝鮮の写経—」のコーナーである。中国の写経
では、中国・南北朝時代 5 世紀から元時代 13 世紀に至るもの 17 件、朝鮮の写経では、高麗
時代 11 世紀から 14 世紀にかけてのもの 6 件を展示した。

中国・5 世紀の写経を代表するものとしては、本館が所蔵する 4 件 5 点の大谷探検隊将来
の古写経のうち、3 件 4 点を展示した。中でも、『摩訶般若波羅蜜優波提舍』般若波羅蜜品第
二十七や『法華経・大智度論断簡』は、木簡や竹簡の雰囲気を残し、隸意を湛えた雄渾な筆
致で書写されている優品である。いずれも庫車や克孜爾など中央アジア周辺で入手したもの
であり、料紙は麻紙を使用し、本文が天地いつばいの行高で書写されているのが特徴の一つ
である。

6 世紀を代表する古写経としては、西魏時代・大統十六年 (550) の奥書がある国宝『菩薩
処胎経』(京都・知恩院蔵) がある。これは、人から人へ伝えられた「伝世の写経」では現存
最古のものと考えられているものであり、知恩院第七十五世養鶉徹定 (うがいてつじょう
1814—91) の収集品として名高いものである。徹定上人と親交のあつた中国公使何如璋は、
この古写経を見せられて「西魏去今壹千五百有九年、不図於海東得見墨宝」とその驚きを跋
文に認めているが、この跋文が書かれたのは戊寅年 (1878) のことであれば、当然のことであ
らう。

唐時代 7 世紀の優品には、同じく知恩院所蔵の国宝『大棲炭経』巻第三と本館・守屋コレ
クションの『法華経』巻第三がある。前者は、日本・百濟連合軍と唐・新羅連合軍との間で
戦われた白村江の戦に於いて唐の水軍を率いた蘇定方の子、蘇慶節が亡父の供養のために発
願書写した一切経のうちの一巻で、咸亨四年 (673) の奥書がある。この親子の伝は、『旧唐
書』巻八十三に見えており、唐時代の写経のうち、書写年代が明らかで発願者が正史に見え
る貴重な遺品である。後者の『法華経』巻第三は、唐の高宗の時代、咸亨二年 (671) から儀
鳳二年 (677) 頃にかけて、官吏の監督下のもと、門下省・秘書省・弘文館などの書手によつ
て書写されたものであり、「長安宮廷写経」と呼ばれる写経のうちの一巻である。この「長安
宮廷写経」の料紙には、3.3 cm (中国の一寸) あたりの簀目の数が 30 本から 40 本と非常に細
かい滑らかでパリツとした最上の麻紙が使われている。一紙の行数は三十一行という特別な

規格になっており、書体に関しても大変力強く隙のない謹厳端正な写経体であり、その筆致と料紙は中国・朝鮮・日本という漢字文化圏で書写された古写経のなかでは最高の出来映えであるといつてよい。

この他、伝敦煌出土で絵入り本としてもよく知られた重要文化財『十王経』(和泉市久保惣記念美術館蔵)や北宋時代の写本一切経の遺品(本館・守屋コレクション)などを展示した。

次に朝鮮・高麗時代の優品を 2 件。まず最初は「紺紙金字大宝積経卷第三十二」(重要文化財、本館蔵)は、統和二十四年(1006)に書写された高麗国金字大蔵経の一巻であり、高麗時代の写経の中では最も古い遺品である。表紙には銀泥で宝相華唐草文、見返しには同じく銀泥で三菩薩が散華供養している様子が描かれており、絵画史の上でも重要な資料になっている。首尾完存しており、奥書より経文は崔成朔なる人物が書写したことが知られるが、その筆致は一点のゆるみもない端正で力強いものであり、おそらくは遼や契丹の影響を受けたと見られる。

もう 1 件は、太康七年(1081)の奥書がある「紺紙金字法華経」(金剛峯寺蔵)である。これは「高麗経」にしては珍しく、八巻本の『法華経』であり、八巻すべてが揃っている点でも貴重な遺品となっている。「高麗経」としては、統和二十四年(1006)に書写された『大宝積経』卷第三十二に次ぐものとして注目すべき写経であり、巻首には横長でワイドな釈迦説法図なども付されている。紙背全面に銀泥で描かれている宝相華唐草文や金字の経文の筆致なども、先の『大宝積経』卷第三十二に相通するものがある。一般的に中国や朝鮮では、七巻本の『法華経』が多く流布しているが、中国・山西省応県仏宮寺釈迦塔(木塔)より発見された『法華経』の版本なども八巻本であることから、時代的にはこれら契丹蔵・契丹版との関連性も考慮に入れる必要があるだろう。いずれにしても今後精査すべき貴重な写経の出現となったわけである。

これ以後は、日本の古写経の展示である。まず最初の「写経体の美しさ—奈良時代—」では、巻末の発願文に「歳次丙戌年(686)」とあり、日本に現存している古写経としては最古の遺品と見られる国宝『金剛場陀羅尼経』(個人蔵)をはじめ、「守屋コレクション」中の唯一の国宝としてよく知られた『千手千眼陀羅尼経』残巻「玄昉願経」など 33 件と奈良時代の写経所の活動が知られる「古文書」など、合わせて 38 件を展示した。これら 38 件のほとんどが国宝や重要文化財に指定されているものである。

平安時代中期、10 世紀以降になると、写経の字すがたが日本的になり、次第に和様化し、11 世紀に至って最も日本的で美しい字すがたの経典が誕生する。その代表的な写経の一つが国宝『無量義経』、『観普賢経』(東京・根津美術館蔵)であり、やや小振りで抑制の効いた細みの筆線の経文は、清楚で温雅、まさに平安時代中期 11 世紀を代表する字すがたとなっている。

平安時代後期、ことに 12 世紀は、「一切経と装飾経」の時代であり、紺紙金銀字一切経である「中尊寺経」や日本独自ともいってよい豪華で優美な「装飾経」が数多く書写された時代であった。その最高峰が「平家納経」である。いうまでもなく、「平家納経」とは、長寛二年(1164)平清盛が平家一門の現当二世の福德を祈願して安芸(現在の広島県)・厳島神社に奉納した経巻である。その内訳は、『法華経』開結共・『阿弥陀経』・『般若心経』の一品経と清盛自身の願文を添えて、全体として三十三巻としたものであり、料紙装飾はいうに及ばず、題簽、八双、巻紐、軸首などに善美の限りが尽くされている。これらは、まさに漢字文化圏における装飾経の頂点を極めたものといつてよい。

その後、鎌倉時代以降は、まさに「写経の転機」を迎えた時代である。しばしば、中国から宋版の一切経などがもたらされたりしたことから、次第に大部な写経が行われなくなっていく。また鎌倉時代の仏教では、禅宗や浄土系の宗派が盛んになったこともあり、写経という作善があまり行われなくなったという背景も無視できないと見られる。

展覧会の最後は、「受け継がれるところ—般若心経—」というテーマで、奈良時代から江戸時代までの『般若心経』を展示し、本当の最後に昭和時代の版画の『般若心経』を展示した

のである。

以上、漢字文化圏における古写経の時代的変遷が理解できるように構成した。会期中の入場者は約 17,000 人、目録の販売数約 3,400 冊という状況であった。

またこの展覧会の会期中の 11 月 13 日（土）には、国立京都国際会館で「21 世紀の敦煌学—写本研究の展望—」という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を開催した。当日は、午後 1 時より、北海道大学大学院・石塚晴通教授による基調講演から始まり、大英図書館東洋写本部中国部長・フランシス・ウッド博士、上海師範大学・方廣鋸教授、東京文化財研究所修復技術部伝統技術研究室・加藤雅人氏による研究発表の後、私・赤尾が司会をして発表者 4 名のパネル・ディスカッションを行った。各々の発表題目は、以下の如くであった。

基調講演

「二十一世紀に於ける敦煌写本研究の展望」 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教授・石塚晴通
研究発表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Stein collection in the British Library」
大英図書館東洋写本部中国部長・フランシス・ウッド

「再談敦煌遺書の鑑別—以偽梁武帝書『法華経』為例」 上海師範大学教授・方廣鋸

「科学分析手法が写本研究においてもつ可能性」
東京文化財研究所修復技術部伝統技術研究室研究員・加藤雅人

敦煌学草創期の「宝さがし的な研究」がスタインコレクションのマイクロ・フィルム化によって全体像を捉えようとする研究に向かったことを確認し、ついで近年の課題となっている偽写本問題が討論された。その中で科学的手法による写本の調査に関しては、現状では科学的分析による写本調査には限界があると報告され、あくまでも非破壊調査による写本研究を行うべきであるとの意見が承認された。

さらに写本の保存と修理の問題に関連して、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化の進捗状況が報告されたが、日本の状況が最も遅れているとの指摘がなされた。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による文献資料の共有化に伴って、実物にアプローチする書誌学的写本研究が難しくなるのではないかとの懸念も表明された。最終的には、デジタル化とアナログ的な研究が今後の写本研究を推進する両輪であるとの確認がなされた。

シンポジウムの参加者は 200 名を越えて、内容的にも満足したものであったとの意見が大半を占め、盛況のうちに幕を閉じた。

「追記」展覧会目録は 1 冊 2,500 円で、本館のミュージアム・ショップである便利堂で取り扱っている。詳しくは京都国立博物館のホーム・ページ <http://www.kyohaku.go.jp/> を参照。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創立 75 周年記念
中國宗教文獻研究國際シンポジウム
景教・摩尼教セッション

高田時雄 (京都大學)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の前身の一つである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が誕生したのは昭和四年 (1929) である。今年は數えて 75 周年に當たる。それを記念する行事の一つとして表記の國際シンポジウムが 11 月 18 日～21 日の四日間、京都大學時計臺記念館において開催された。本シンポジウムは京都大學 21 世紀 COE プログラム「東アジア世界の人文情報學研究教育據點」の活動の一環でもあり、また在京都のイタリア國立東方學研究所、フランス國立極東學院との共催で行われたものでもある。

さてシンポジウムでは佛教文獻、道教文獻、景教・マニ教・イスラム教文獻、さらに中國宗教文獻情報學という四つのセッションから構成され、内外から第一線の研究者 26 名の報告を得た。やがて正式の報告書が刊行される豫定だが、その成果の全貌が學界に届けられるにはしばらくの時日を要すると思われるので、責任上ここには筆者が司會を擔當した景教・マニ教・イスラム教文獻セッションのみを取り出して簡単な報道をしておきたいと思う。ただしこの『通訊』の性質上、敦煌との関係をもたないイスラム教文獻に関しては割愛する。他の報告は以下の三點、どれも景教乃至摩尼教に関する研究である。

林悟殊 (中山大學) 「漢文摩尼經與景教經之宏觀比較」

Max DEEG (WIEN 大學) Digging out God from the Rubbish Heap — The Chines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the Ideology of Research

榮新江 (北京大學) 「唐代佛道二教眼中的外道 — 景教徒」

林悟殊氏の論文は、敦煌藏經洞所出とされる摩尼教經典及び景教經典寫本の研究史を丹念に追い、研究の現段階を提示するとともに、偽寫本の問題を改めて提起したものである。今日では學界既知の事柄ではあるが、摩尼經典には眞偽の問題は基本的に存在しない一方で、景教經典についてはこれまでも常に疑惑が付き纏っていた。『景教三威蒙度讚』『尊經』など三種の景教文獻を包含する P. 3847 寫卷がフランス國立圖書館に收藏される以外、他の景教寫本がすべて日本にあるという現状自體が、冷靜に考えれば極めて異常なことである。林氏はすでに十年以上前に榮新江氏との共著で、いわゆる小島文書 (A) 『大秦景教大聖通真歸法讚』 (B) 『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が贋作であることを力説したが、これは今日學界の定説となっている。またさらに早い時期に羽田亨によつて紹介された富岡謙藏舊藏の『一神論』、高楠順次郎舊藏の『序聽迷詩所經』もその傳來の過程が不明で、テキストの表現や用語にも疑問點が多いとして「疑經」とする。結果、ペリオ蒐集の上記寫卷以外に信用の置けるものは、李盛鐸舊藏の『志玄安樂經』『宣元本經』の二點のみということになる。林氏は、眞偽問題が摩尼經典には無く、景教經典のみに集中している點について、二〇世紀の五十年代以前においては摩尼教に對する知識がほぼ零に等しい状態であり、偽造をしようにもモデルがなく、また偽造しても買い手が見付からないという社會的背景があつたためだとする。一方、景教經典のほうは明末に西安で景教碑が発見されて以來、東方におけるキリスト教というテーマは、信徒であると否とを問わず社會的に非常に大きな關心を引く話題であつた。ペリオ寫本 P. 3847 や李盛鐸所藏景教寫本という景教經典の新發見が既に廣く知られていた以上、更なる景教經典の出現への期待が高まつたとしても不思議ではない。景教經典は収集家にとっては垂涎の的であり、自然、容易に買い手を見いだすことが出来る情況にあつたのである。

林氏は本論文において、更に摩尼教、景教徒が行つた譯經の規模についても考察を行い、

また會昌の禁教後における兩教の經典たどった命運についても言及する。摩尼教の經典は『道藏』中に取り込まれ、また姿を變えて民間宗教の中に吸収されつつ中國文明の中に融合されていった。しかし景教の末路についてはその實態を示す文獻や資料に乏しく、この「流産した文明」が中國において辿った歴史の解明はなお今後委ねられている。

マックス・デアク (Max DEEG) 氏の報告もやはり景教の研究史を取り扱ったものである。デアク氏は先ずこれまでの唐代景教史の研究において、神學者のそれと、文獻學者のそれとの間に大きな斷絶が存在したことを指摘する。さらにこれまでの研究には變形した東方キリスト教及びその文獻の中にさえ、西洋の宗教の優越を読み取ろうとする強い傾向がイデオロギーとして随處に存在したことを述べる。表題にいう「瓦礫の山から神を掘る」(Digging out God from the Rubbish Heap) とは、こうした超越的オリエンタリズム (Trans-Orientalism = デアク氏の用語) のことを指しているのである。これまで西洋で景教文獻を利用する場合、ほとんど唯一の權威として用いられてきたのは佐伯好郎による英譯であるが、具體例としてその中にもやはり抜きがたく超越的オリエンタリズムが存在することを取り上げる。佐伯は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に見える「阿羅本」に Abraham を、また高楠順次郎舊藏『序聽迷詩所經』のタイトル「序聽・迷詩所」に「エス・ミシホ」(Jesus Messiah) を読み取ろうとした。デアク氏はその觀點を痛烈に批判するとともに、それぞれ新しい解釋を示している。すなわち「阿羅本」= Abraham は音韻的にも成立しがたく、恐らく Ad(d)ābān ← Ardābān (正義により守護された者) のような中期イラン語の地方音形による人名であろうとする。「本」字の部分の對應には些かの疑問が残り、従つて原語の探求にはなお一考を要すると思われるが、超越的オリエンタリズムの脱却という点では評價されるべき一歩である。また「序聽・迷詩所」についても、デアク氏は「序」字は寫本の轉寫の際に二行目から紛れ込んだものであり、且つ「所」字も訶の誤りであるとするれば、經題は原本では「聽迷詩訶經」(即ちメシアに耳を傾ける經) となつていたものではないかとする。また「所」字を保持することに拘るならば、「聽迷詩訶所說經」のような形も推測できるとする。この場合も題名中に殊更にイエスの名を認めようとするようなキリスト教的偏向とは一線を畫するという意味において面白い試みであるとは言えよう。しかしこの寫本自體が上に見たように「疑經」であるとするれば、その有効性もかなり割り引いて考えざるを得ないであろう。

結論としてデアク氏は景教研究の將來について、最初に述べた斷絶を埋めるために、以下の提案を行っている。それは複数の専門家による景教經典の新しい翻譯が提供されること、また中國の學者が西洋の言語で價值ある研究を發表すること、そして日本の學者による研究が再度活性化することである。

榮新江氏の報告は、同氏の既發表論文『『歷代法寶記』中的末曼尼與彌師訶』(1999 年、後同氏の『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2001 に収録) を承け、Timothy Barrett 氏や劉屹氏による近年の研究動向を踏まえた上で、唐代宗教史の觀點から景教が佛道二教によつて外道と見なされていった過程を検證したものである。唐代は佛道二教が互いにその勢力を争つた時代であり、朝廷の支持もまたしばしば變遷した。當然、新來の小勢力たる景教はその中に巻き込まれて苦戦を強いられることとなる。景教は新來宗教に對して寛容であつた太宗の時代に、道教に依附することによつて足場を築いたのであつたが、道教の威勢が最も揚がった開元時代に却つて道教の陣營から外道と見な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はいかにも皮肉である。しかしこれは武則天の時代の崇佛に對する強力な反作用が働いたためであり、景教はいわば佛道鬭争のとばつちりを受けた格好であつた。『老子化胡經』卷二に景教が外道として描かれているのは、まさにこの時代の産物だからである。

榮氏は 1999 年の論文に於いて、『歷代法寶記』に彌師訶を外道として出現させ貶めるのは、朔方軍内の崇佛派による反景教の姿勢を強く反映するものであることを論じたが、本報告ではその觀點を再確認しつつ、更に以下の補足を行う。『老子化胡經』に『歷代法寶記』と同じく、景教の彌師訶を外道とみなす記述が見えるのは、『法寶記』が『化胡經』の説を何らかのかたちで反映していることは間違いない。しかし『化胡經』では摩尼は佛道とならぶ正教と

考えられているにも関わらず、『法寶記』では摩尼もまた外道の一種に数えられているから、その処理の仕方には違いがある。そもそも安史の亂の平定に功績のあつた朔方軍主力には景教徒も多く、したがつて叛亂平定後景教はその勢力を伸張することが出来たのであつた。しかしこの事實はまた朔方から四川に移植された保唐派佛教にとつてみれば非常な脅威であり、それが摩尼教も含めた外來宗教に對する極めて強力な排斥となつて表現されたものと思われる。景教は會昌排佛時に壊滅的打撃を蒙つて衰え、やがて道教や佛教の中に吸収されて行くことになる。榮氏は報告の最終章においてこの時期の問題にも觸れるところがある。林氏の報告にも言うとおりの、唐代以降の景教の歴史については資料が少なく、その解明はお多く今後の研究に待たねばならないが、今後の研究の進展を期待したいところである。

以上、今回のシンポジウムで報告された三論文につき簡単に紹介したので、ここで筆者は餘白を借りて、景教文獻の日本流入に關し若干の補足をしておきたいと思う。周知の如く、景教文獻はバりに所藏される P. 3847 寫卷以外はすべて日本にある。そのうちには今日「偽經」或いは「疑經」と目されるものも含まれるわけであるが、その流入の経緯および現況を今一度確認しておきたいと思う。第二次大戦前、日本で景教文獻に強い關心を示したのは、佐伯好郎と羽田亨の二人であつたが、寫本蒐集のための資金提供者をもつていた羽田はみずから精力的に寫本の蒐集を行つた。結果として 1937 年までには、いわゆる小島文書以外の景教寫本はすべて羽田の許に集まつていた。1935 年に李盛鐸舊藏寫本が賣り出されるや、羽田はすぐさま動き、翌年末までにはそのすべてを入手したが（高田「明治四十三年京都文科大学清國派遣員北京訪書始末」『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七卷）、『志玄安樂經』と『宣元本經』はその中に含まれていて、また『一神論』と『序聽迷詩所經』が羽田の手によつて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から影印出版されたのは昭和六年（1931）であるが、羽田の『敦煌秘笈目錄』に附された「新增目錄」を見ていくと、昭和十二年（1937）の 7 月 15 日以降 12 月までの間にそれぞれ富岡家、高楠家から羽田の手に渡つたことが推測される。富岡鐵齋・謙藏の二代にわたる龐大な蒐集は昭和十三年六月及び十四年三月の二度に分かつて入札が行われたのだが、「一神論」はそれに先だつて富岡家を出たのである。恐らく羽田のたつての要請に基づくものであろう。李盛鐸舊藏本 432 點を含め、羽田がこの時期熱心に蒐集したすべての敦煌寫本は現在日本の某所に存在する。これは内外の敦煌寫本研究者の等しく知るところであるが、富岡、高楠舊藏本もすべてそこに含まれていることは或いはあまり知られていない事實かもしれない。

残るのはいわゆる小島文書 (A) (B) である。この偽作二點について、小島靖氏自身による入手経過についての言及があるので、それを紹介して小文の締めくくりとしたい。それは「佐伯先生と私」と題する一文で、『佐伯好郎遺稿並傳』（1970、東京、佐伯好郎傳記刊行會）に收められている。この 1800 頁に近い巨冊は、佐伯好郎(1871-1965)の死後、學生知友の手によつて編集されたもので、全くの稀觀書というわけではないが、その流通はやや限られている感があり、これまで餘り注意されて來なかつたと思われる。これを見れば、小島氏が李家との仲介に立つた曾某によつてうまうまと騙されたことがよく分かる。辯解のための作り話ではおそらくあるまい。

私は順序として右二文獻入手の由來について少しく述べてみたい。(中略)その後私は幸運なことに東洋學者として有名な故李盛鐸氏宅へ四十年も出入していた古美術商の曾君と知り合つた。李氏については燉煌古文書について多少の關心のある人ならば知らぬ人はない程有名である。李家の所藏古文書は英國のスタイン博士、フランスのペリオ博士の燉煌探險によつて請來された資料に劣らぬ豊富貴重なるものとの定評のあるところであり、内外の學者間に夙に注目垂涎のものであつたが、その内容は嚴祕に附され、李氏が世中は何人も過目すら許されなかつたものであつた。

或日、李氏の友人であつた小幡駐華公使が、李氏に向つて祕藏の古文書を見たいと所望したところ、李氏は笑つて取合はず、素人の見るものではない、その代わり御馳走をしようと言つたという逸話を曾君が私に語つて呉れた。

約二千點といはれていたこの貴重なる燉煌古文書は、李氏が北京政府の文部次官當時、その地位を利用して自己の所有に歸したものといはれ、曾君が入手秘話を詳細に私に語ってくれたが、今之に觸れようとは思はぬ。

李氏の没後、之等貴重なる古文書は遺族數カ所に分散されていたが、阿片の代に弗々曾君を通じて賣出されていた。その何れもが無條件に貴重なものばかりであったので、私は曾君から持込まれたものは凡て一切値切ることをせず言値のままに買取っていた。かくて或る時期には李家からの出品は大體私の許に納まっていたといえるかと思う。

京大総長の羽田亨博士が李氏所藏の古文書には非常な關心を抱いていられたことを聞いていたので、ご参考迄にと私が李家から入手した文書はその都度同博士の許へ報告していた。

この様な情況下にあつて、曾君と私とは頗る親密に進んだ。潮時と見た私は、曾君に李家には景教に關するものが今日迄に李家から發見されたものの外にまだありはしないか、内々探つて見る様に申入れた。其後忍耐の月日が経過して、果せるかな以上の二文獻の發見となり、遂に私の所有に歸したのであつた。その時の感激は筆紙に盡せぬものであつた。

そこでこの文獻を先生のお宅へ送附した。ところが當時戦争は愈々苛烈を加えた爲め、先生は既に郷里の甘日市町に疎開して居られたので、先生の御手許にこの郵便物が到着したのはかなりの日數を経てからであつたことが、天津で先生から頂いた書信により判明したのであつた。

先生からは實に鄭重な謝意を述べられてあつたが、その中に「欣喜雀躍致候」とあつたのを記憶している。この貴重なる文書の内「A」は引揚途中他の手荷物と共に盗難に會つたことは寔に残念である。「B」は先生の御斡旋により同志社の新島文庫に保管されている。

中國唐史學會第九屆年會暨“唐宋社會變遷” 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李發 (雲南大學)

一、會議簡況

2004 年 07 月 25—28 日，中國唐史學會、雲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在昆明舉辦了“中國唐史學會第九屆年會暨‘唐宋社會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這次會議共有來自日本、韓國、新加坡、港臺地區及大陸學者 120 多位，大會收到學術論文共計 80 多篇。大會首先舉行了開幕式和大會學術報告，接著分為經濟、政治和文化三個小組進行了發言和討論。大會圍繞著“唐宋社會變遷”的中心議題展開，在經濟、政治、文化和軍事等方面選取一系列重要論題踴躍發言，並進行了熱烈討論和認真的總結。從大會所反映的情況來看，一方面中國唐史學會的優良傳統得以繼續發揚，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研究視角和理論觀點等方面不斷推陳出新，很好地展現了近幾年來唐史研究方面的一些重要成果和新氣象。大會最後進行了理事會改選，產生了以張國剛先生為會長的新一屆理事會。

二、提交大會的論文及發言述要

下面簡要介紹一下提交大會的論文及發言情況，疏漏和不當之處在所難免，敬請各位專家和學者批評、指正。

1、經濟組

經濟組的發言和討論圍繞區域研究、財政、土地制度、城市經濟和制度與技術的創新等五個方面展開。

區域研究 李並成的《唐代河西走廊交通道路考》一文，在嚴耕望先生前期研究的基礎上並結合史料典籍和考古實踐，對唐代河西走廊的交通情況進行了不同方向上的考察，指出了嚴氏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錯漏之處，並特別對河西走廊南北向的交通路線和以敦煌為中心的交通道路情況進行了探究。謝重光的《唐宋之際福建社會的巨變》一文指出，福建社會發展為富庶繁榮的禮教之邦是在從唐至五代之初這段時間，這一時期里隨著北民的南遷和中央王朝對福建地區的經營，民族融合不斷加速；到了五代時期福佬民系形成，其標志就是閩南方言的發展成熟和重商風氣的初步形成。劉永連先生在《唐代流貶人員與嶺南的開發》一文中，就唐代流貶到嶺南的罪犯、貶謫官員和流徙的平民百姓等在嶺南地區的開發方面的貢獻進行了探討；指出在唐前期主要為身份較高的一些人員，往往成批流貶；而在唐後期則更多的為中下級官吏和平民百姓等，並因其普及面的更為廣闊而具備了更大的影響力。

財政 陳明光的《唐代後期地方財政支出定額包干制與南方經濟建設》一文，對唐代後期地方財政包干制的產生及形成條件、運作方式和財政投入方向、其對社會經濟、政治的利與弊和被中央集權的財政管理體制所取代的最終命運等問題進行了分析；並指出上述演變在中國古代財政管理體制演變史上有著特定意義；同時被宋代高度集中的財政管理體制所取代也是一種歷史的必然。(日)高瀨奈津子在《唐朝穆宗時期以後的財政三司的人事變遷及財政制度》一文中，通過對穆宗以後若干時期里財政三司人事變動的考察，提出財政三司的人事制度不僅同宰相有深刻關係，而且與皇帝和宦官勢力也都關係密切；同時這一時期因政治權利軸心在皇帝、宰相和宦官中間的不斷變動搖擺導致了財政運營主導者的不斷變化，從而進一步造成了唐後期的財政運營問題。袁一堂的《唐宋時期和糴制度興起的背景及原因研究》一文指出，到了中

唐時期和糴制度得以盛行並因而形成了平糴和和糴兩大糧食市糴系統；而募兵制則是和糴制度產生的直接原因；同時和糴制度也是中唐以後商品經濟發展和稅制改革的必然結果。

土地制度 楊際平的《唐宋土地制度的比較研究》一文提出，在唐以前只有限田制，而北朝與隋唐“均田制”成立時期的土地所有制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總之，是大土地所有制依然佔據統治地位。林文勳在《唐宋土地產權制度的變革及其效應》一文中，認為地主土地所有制而不是自耕農對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起到了更大的作用。作者指出，這一時期租佃制的普及是因為富民階層的發展，同時政府放棄了傳統的土地干預政策；導致唐宋社會變遷的主導力量則是土地產權制度的確立，而推動產權制度確立的主要社會經濟條件是商品經濟的發展。劉進寶的《“不辦承料”別解》一文，就敦煌文書 (P. 2222) 中一則史料中“不辦承料”一句的詮釋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作者指出，傳統的觀點認為“不辦承料”意為不承擔國家的賦稅，而從史料來看，在表示這種意思時則另有說法，即“不辦輸納”、“納突不辦”、“輸納不辦”等；“不辦承料”的真正含義是指無力耕種、不能耕種。

城市經濟 寧欣在《唐代長安的“街”——線形空間在突破坊市制度過程中的作用》一文中，就唐代長安的街、街區和“侵街”現象進行了考察，認為只有從街道的線形空間結構方面出發，才能彌補在認識傳統的坊市制度如何得以被突破這一問題時存在的不足，同時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理解從封閉走向開放的轉換本身所有的漸進性。作者指出，唐長安的街，有幾種不同的含義，而以朱雀大街為界限，長安外郭城內被劃分為東街和西街兩大區，這裏的“街”已經具有了“城區”的含義；街道則有著劃分街區、交通等功能，而街區意識已經在當時的長安城內初步形成；至於“侵街”現象，則是政府與民間的交互作用。薛平栓在《隋唐長安商業市場的繁榮及其原因》一文中指出，隋唐長安商業市場的繁榮主要基於以下幾方面的原因，一是國家統一、社會安定和幣制統一；二是水陸交通的發達及西域商路的通暢；三是長安及關中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四是長安作為全國政治中心的獨特地位。

制度與技術的創新 張錦鵬的《制度創新與唐宋時期農業經濟增長》一文，以制度經濟學的理論方法對唐宋時期農業的增長變化和其原因進行了探討。作者指出，唐宋時期的農業增長不僅呈現數量擴張型增長，而且呈現了質量提高型增長；而推動這種質量提高型增長的決定因素是制度，即唐宋時期私有土地產權制度的確立，激發了民戶的生產積極性；並促進了土地資源的優化配置，降低了交易費用，同時也致使土地的再次分配更加合理，其初次分配則趨於理性化。周尚兵則在《唐代的技術創新與社會變革》一文中提出，唐代新的耕作制度和鍛制鋼工具的廣泛應用導致了生產力發展進入新階段，確立了新的生產技術範式；並由此奠定了新的生產基礎，引發了社會生產關係的變化，社會用工方式由行政徵集為主過渡為市場調配為主；從而得出結論，認為唐代的技術創新在中國古代史上的重大意義在於，確立了其後古代社會生產力、生產關係發展的基本方向。

2、政治組

政治組的發言和討論主要分為以下幾個方面：(1) 政治格局、政治事件和政治勢力；(2) 官制；(3) 軍事；(4) 法律；(5) 民族和中外關係。

政治格局、政治事件和政治勢力 孫繼民的《漢唐盛世背景下的中央與地方關係比較》一文，主要論述了古代的地方體制問題。作者對西漢和唐朝在處理中央與地方關係方面所做出的政策選擇的不同進行了比較研究，指出，西漢中央王朝從漢初的地方分權演變到了中央集權，而唐中央政權則是在初期高度中央集權的背景下去走了一條地方分權化的道路。何磊的《試論“武周革命”對李唐王朝的影響》一文，就“武周革命”對唐朝政治的影響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認為，由於武則天與李、武集團均有著血緣關係，故其在爭奪皇位和鞏固皇權的過程中不惜誅殺李唐宗室而抬高武氏集團，而在皇權鞏固以後則採取了調和政策。其結果是造成了李、武之間的矛盾在長時間里得以潛伏不化，而這一矛盾在武則天去世後依然多次爆發並對唐代政治產生了重大影響。梁恒唐、張雨亭的《武士護在唐王朝》一文，對武則天的父親武士護的出身及其與李氏集團的結交、在太原起兵中的地位和在武德年間的活動等進行了考察。馬雪芹在

《從政治的角度看武則天與佛、道、儒三者的關係》一文中，從武則天做為一個政治家的角度對其之於佛、道和儒三家的態度問題進行了分析，認為武氏只是在對它們進行吸收和利用，是為政治鬥爭需要並不存在信仰的問題。黃正建的《唐代的“士大夫”》一文，專門就唐代的士大夫問題進行了探討。作者指出，唐宋間“士大夫”一詞的含義同時也包括它所指稱的階級發生了重大變化，一是“士大夫”由士族、“舊地”變成了文人官員；二是“士大夫”承擔輿論評價責任的增加。而從上述變化能夠進一步看到唐宋時期社會、階級、階層和風俗、時尚的變化。吳麗娛的《誰是白居易〈新樂府·官牛〉詩中的右丞相——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補正一則兼辯牛李黨爭起源問題》一文，對白居易詩的黨爭背景問題進行了分析。宋燕鵬的《關於中古士族發展演變線索的一點思考》一文，士族的發展具有地域性；在士族的發展演變中，宗族聚居和譜牒各自發揮了獨特作用。

官制 嚴耀中的《唐代中後期內侍省官員身份質疑》一文，對唐朝中後期內侍省官員的身份問題提出了新看法，認為所謂的內侍省官員並非全是閹人身份，這些官員有許多是通過各種渠道進入了內侍省，其原因當與當時的內侍省職能轉換和宦官勢力的惡性膨脹等有密切關係。杜文玉在《五代御史台研究》一文中，對五代的御史台機構進行了考察，指出其相對於唐制已發生了不小的變化，主要在於其機構和人員設置、權力等方面：一是御史大夫一職不再常設；二是御史中丞地位有所提高，三是外台任職的泛濫化；四是郎官知台雜事制度的變化，即由郎官擔當變成了由侍御史充任；五是留台的設置。而五代御史台的職責較唐代而言其職權範圍更為廣泛、事務更加繁劇了。李昭毅的《隋文帝時期官制改革述論稿（一）——以“罷鄉官”為中心的考察》一文，就隋罷鄉官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認為隋罷鄉官的相關問題在於中央集權化的發展過程；“罷鄉官”等一系列改革的初衷是解決如何使“士族政治”向“官僚政治常軌”回歸的問題；而包括“罷鄉官”在內的一系列改革又對以後隋唐兩朝的政治產生了深遠影響。勾利軍的《從唐前期東都職官的稱謂變化看東都機構的發展脈絡》一文，通過對唐朝前期東都職官稱謂的前後變化的分析，考察了東都機構的發展脈絡。劉再聰在《唐朝村正考》中對唐朝“村”的制度的設置、村正的職責和任命及其演變的特點等進行了論述。

法制 賀潤坤的《論魏征的法律思想》一文，從魏征所在時代的歷史背景及其個人經歷出發，考察了魏征的法律思想，指出魏征的法律思想以重民即以民為本和重視君主個人修養為特色。例如，魏征提出君主要明德慎罰、輕徭薄賦；要取信於民，對民進行教化，使之能夠安居樂業；君主要公平執法，不徇私情等等。劉曼春《唐前期法制研究》一文，則對唐朝前期的法制建設、法制特點等進行了綜合論述，認為唐前期的法制因統治者吸取了前朝滅亡的教訓而在總體上是清明的；唐前期是以法制為主而輔以道德文化建設的。李天石的《從睡虎地秦簡看秦朝奴隸與唐代奴婢的異同》一文，對秦朝的奴隸與唐代的奴婢進行了深入比較，指出，唐律中有關奴婢的許多律文源自於秦律的有關規定，從而印證了秦律與唐律之間的制度淵源關係；而唐代的奴婢與秦朝的奴隸因所處時代條件的不同，也已經出現了很大的差異，主要表現在唐代的許多法律規定較秦代顯得更加嚴密和苛刻。（韓）禹成旼《從〈改元光宅詔〉的結構與性質來看唐代赦文的變化》一文，通過對《改元光宅詔》的結構、性質等的考察，提出了《改元光宅詔》是唐代赦文變化的轉捩點的觀點。具體地來看，古代赦文在唐以前主要是在司法上起作用，而從武則天開始則出現了立法和發佈政令等方面的內容，這表明唐代赦文不僅在司法上而且在立法和政務處理方面也都開始發揮作用了。

軍事 雷家驥在《試論唐初十二軍之建軍及其與十二衛的關係》一文中，探究了唐初十二軍的建軍構想、原理與編組建制及其與十二衛的統率指揮和實際運作等方面的關係等。作者認為，十二軍是唐初因國家戰略以及大戰略的策定而建置的，它直接隸屬皇帝；其建軍受天文方面“軍衛二重性”的啟示而採取了以“軍”統兵耕戰和由“衛”指揮宿衛的統、指分離體制；其建軍目標則是以創建獨立而強大的打擊力為主，從編制上屬於體制外的臨時野戰編制，其編制本身也有一定的變化。寧志新的《隋朝重裝騎兵覆滅原因探析》一文，主要分析了十六國以來的重裝騎兵在隋朝末年走向覆滅的原因。隋末義軍分別採取三個方面的戰術來瓦解隋朝的重裝騎兵：一是流動作戰；二是採取突襲的方法；三是列陣與隋軍正面交鋒，而以密集步兵長槍方陣扼制並進而消滅敵騎兵。盧向前在《盧從史出兵山東與唐憲宗用兵之關係》中論述，

《資治通鑑》及《考異》中提及盧從史擅自引兵出山東，屬於錯訛；而盧從史的冤屈之所以會產生，一方面與唐憲宗想改變德宗以來對待藩鎮的“因循”政策相聯繫，另一方面也與唐中央對河朔三鎮用兵政策的搖擺不定有關。黃壽成的《唐神策軍樂壽博野兩行營考》一文，就唐穆宗時期所建神策軍樂壽、博野兩行營的建制、在平叛中的作用及其命運分別進行了考察。孟彥弘的《釋“河朔故事”》(提綱)，就“安史之亂”後河北割據的形成和“河朔故事”的出現、其政治影響和唐中央政府“放棄河北、控制其餘”之國策的確立等問題進行了論述。

民族與中外關係 (日)石見清裕的《〈晉王李克用墓誌〉錄文與沙陀的譜系》一文提出，對沙陀族的研究應該在發掘史料的基礎上繼續深入。作者借助《晉王李克用墓誌》錄文的史料線索澄清了從益度(李克用四代祖)到李克用的譜系存續情況；並指出，沙陀種族至少在九世紀時還不是純粹的沙陀突厥，而是由各種來自吉爾吉斯族、粟特族、維吾爾族和漢族的人員構成的集團。(日)西川和孝的《關於公元八世紀南中大姓爨氏的政治意識——從譜系意識的角度來看》一文，利用 1999 年在四川出土的《爨公墓志》史料，分析了爨氏的譜系意識，指出爨氏從 458 年到 786 年這三百多年中一直保持著從河東遷來雲南的譜系意識；並就爨氏的譜系意識之于其對中原國家的政治意識及政治政策產生的影響，進行了進一步的分析。拜根興在《唐中後期赴新羅使節的行次、時間考辨》一文，深入考辨中、韓兩國有關史料的差異並利用新發現的墓誌等資料，藉以對唐大歷年間以後唐廷派往新羅使節的行次、時間等進行了考察，認為，從大曆初年到唐昭宣帝天祐年間，唐朝先後向新羅派遣使節達 22 次之多。

3、文化組

文化組的發言和討論共圍繞著五個方面的主題展開：(1) 文教、禮儀、典籍和書儀；(2) 文學藝術；(3) 宗教和祭祀；(4) 婚姻、婦女和大眾文化；(5) 唐宋文化變遷。

文教、禮儀、典籍和書儀 黃俊文的《唐代中央官學之淵源》一文：唐代的中央官學沿承前代而建立，依其行政管理所屬可以劃分為國子監七學、門下省所屬弘文館等四類；同時唐代中央官學的特色是學官地位較高，教育管理制度完善和明顯的等級性；唐代優良的教育制度為唐宋時期中國科技、文化的發達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唐代的官學也奠定了日後宋元明清的官學體系。(日)野田有紀子的《日唐鹵簿制度的比較》一文，力圖通過對日本和唐朝的鹵簿制度的比較研究，探究唐朝和日本各自的社會秩序以及唐朝皇帝和日本天皇權威的不同之處。作者認為唐鹵簿令所規定的唐朝皇帝的鹵簿，表明了唐代的皇帝具有兩種不同的權力：位於禮制社會頂點的天子權威和作為統一中國的皇帝的政治、軍事性權力；而當時的日本並沒有繼承鹵簿令，日本的天皇和其他的男性官員有著不同性質、處於不同層次和具有不同權威的超越性存在。

(日)金子修一、江川式部的《從唐代儀禮制度看〈大唐元陵儀注〉研究的意義》一文，對《大唐元陵儀注》的史料價值進行了深入細緻的發掘和闡述。張建華在《唐志淺探》一文中對《朱佐日墓誌》、《唐杜氏墓誌銘》、《許氏墓誌》等唐代志的個案進行了分析，闡發了發掘唐志史料價值的重要意義。(日)古瀨奈津子的《唐代的書儀和古代日本的書簡》一文，通過對“正倉院文書”和《萬葉集》中所收書簡的分析，指出古代日本的書簡在朝廷內部的公務往來中出現，並在以後主要用於公務；同時，在唐代書儀的影響下在私人交往中也出現了書簡；而日本直到八世紀時都沒有出現書儀的書簡範本集，是因為當時文字的缺乏普及和社會環境的不利性限制。

文學藝術 陳志平在《試論李賀與昌谷》一文中，對詩人李賀與其家鄉即人傑地靈的昌谷之間不解的情結進行了細緻地探討。邱炫煜的《唐代驃國獻樂與中緬文化交流》一文，通過對兩《唐書》中《驃國傳》進行比較，在現有成果的基礎上對唐代驃國獻樂的原委始末進行了詳細考述，並由此論及驃國獻樂在中緬文化交流中的意義。張菁的《唐代貧婦詩初探》一文，考察了唐代詩風在“安史之亂”後詩風的轉變，和白居易的《觀刈麥》、孟郊的《貧女》等貧婦詩的出現，並闡發了這些詩歌在拓展唐詩的內容和境界、提高唐詩藝術成就方面的意義。王建林在《“根”——克孜爾千佛洞的稀世之寶》一文中，通過對克孜爾千佛洞群區前發現的“陶祖”的分析，論述了龜茲佛教聖地的“生殖崇拜”現象。李麗《庫木吐拉石窟的壁畫藝術》一文，則對新疆庫車縣庫木吐拉石窟中所藏壁畫的藝術特色、畫風的發展階段、及其所反映的歷

史畫面進行了勾勒描述。趙望秦《說“龍城”》一文認為，唐代詩人一方面是繼承前代的做法，把“龍城”一辭在詩歌中作為典故而用，同時，也逐漸以“盧龍”代替“龍城”；而“盧龍”亦由實指而變為“龍城”的同意語。

宗教和祭祀 介永強的《關中隋唐宗派佛教傳播史跡鉤稽》一文，對隋唐時期關中地區佛教各個宗派的活動情況進行了考察，指出關中地區是隋唐佛教文化最為發達的地區，亦為隋唐佛教傳法的中心，可以說關中是隋唐佛教諸大宗派的發源地。(新加坡)李志賢的《唐人宋神：韓愈在潮州的神話與神化》一文認為，韓愈並非為潮州人所過於尊崇，他在潮州驅戮鱷魚之說法的現實意義在於，體現了韓愈關心民瘼的情懷，體現了他的一種愛民精神；韓愈在潮州興學更是潮州人將其神化的主要因素，尊韓與興學已形成為一種心理迴圈；神化韓愈也是潮人先賢崇拜神文化的表現。余欣的《唐宋敦煌社祭變遷考略》一文認為，敦煌社祭在吐蕃統治時期較為受到重視，而到了歸義軍時期官民對社祭的熱情卻逐漸冷卻下去，社從祭祀儀式蛻變為殘留著歲時民俗意味的一種節俗；這種情況的發生除了社會的變革導致信仰世界的改易之外，還有就是“中國式宗教精神促成的萬神殿新舊交替的普遍規律在起作用”；同時，社祭在當時的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逐漸下降也是一個原因。雷聞在《唐宋時期地方祠祀政策的變化——兼論“淫祠”與“祀典”概念的落實》一文中提出，要“將地方祠祀政策置於國家禮制的整體系統中進行研究”，並著意考察了唐宋時期政府對地方祠祀的政策及其變化；唐代國家控制地方祠祀的方式在地方經濟文化發展的影響下發生了變化，對於地方祠廟合法性的認定權下放到了地方；北宋時期新神明體系得以建立，佛、道二教與民間神祠在國家祀典中的位置也逐步趨同。

婚姻、婦女和大眾文化 張國剛的《唐代婚姻禮俗與禮法文化》一文，在利用傳統史料的同時補以小說資料，對唐代婚姻禮俗中的聘財、門第和禮法與婚姻的關係等進行了分析；並指出，唐代的婚姻禮儀並不完全受禮法的約束，“不遵禮法”是唐代婚姻關係的現實反映。其主要原因是唐初的統治者把禮教、門第和官爵等同起來，壓制了以舊士族為代表的禮法文化；從社會變革的角度來看，禮法文化出現了一個擴大傳播的歷史趨勢。金澄坤的《中晚唐五代科舉與婚姻觀念的變遷》一文指出，中晚唐科舉出身在社會中地位的提高，是當時婚姻觀念轉變的最主要原因；中晚唐五代婚娉崇尚科名的實質就是尚官品的體現；中晚唐五代婚姻觀念的轉變與社會變遷息息相關；科舉對唐五代婚姻觀念變遷的影響，是中晚唐五代科舉考試制度對官僚選舉制度影響日趨加深的結果。盧秀文的《中國古代婦女與敦煌婦女粉脂妝——妝飾文化研究之三》一文，集中探討了古代不同時期里中國婦女及敦煌婦女粉脂妝飾發展的特點，並得出結論，古代婦女與敦煌婦女的粉脂妝始終貫穿著大紅、粉紅、淡紅等基本色彩，歷代崇尚婦女妝飾的審美觀，從質樸向富麗發展，從自然向濃豔變化。霍明琨在《〈太平廣記〉與晉唐時期的大眾文化》一文，就《太平廣記》一書所反映的晉唐時期的大眾文化及其特點進行了剖析。

唐宋文化變遷 梁中效的《唐宋社會變遷與中華文明的轉型》一文以北宋為界，以國都所在地域為標志，可以將封建社會的歷史分為西部時代和東部時代。西部時代的全盛期在唐朝，以“馬”文化著稱，充滿著自信與活力，以自然經濟立國；民族關係和緩，宗法觀念淡薄；形成了建功創業型的開放、外傾、色調熱烈的文化。而東部時代的開端是宋朝，“船”文化興起，喪失了進取的活力；民族關係緊張，宗法觀念強化；形成了文治靖國型的、封閉、內傾、色調淡雅的文化。龔鵬程的《唐宋文化變遷之研究》一文，在全面反省“唐宋文化變遷”這一論題的研究方法和學術成就的基礎上，提出了“知性反省”的宋代文化觀。王永平在《試論唐宋文化面貌的局部更新》中提出，唐宋文化變遷是一種文化面貌上的局部更新：唐宋時期的文化變遷表現在文化氣派、文化精神、文化成就、文化創造的風格和文人的氣質等方面，結果形成了古代文化史上各具時代特色的唐文化和宋文化；其原因主要是，從中唐起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格局和歷史地理環境等都發生了重大變遷。馬強在《地理體驗與唐宋“蠻夷”文化觀的轉變——兼論鄭回入南詔為官的意義》一文中，探討了唐宋時期由於內地對西南與嶺南地區地理考察和地情了解的增多，指出，這種轉變雖未根本改變傳統的華夷觀和宗主文化優越感，但轉變本身確為元明清時期的民族文化融合奠定了良好基礎。劉屹的《從“聖母神皇”到“聖神皇帝”——李唐與武周國家意識形態變化的象徵》一文，就武則天時期從“聖母神皇”到“聖神皇帝”這種尊號的更改與當時的政治鬥爭、文化意識等方面情況的內在聯繫進行了剖析。

第 37 屆國際東方學家大會側記 郝春文 (上海師範大學)

第 37 屆國際東方學家大會於 2004 年 8 月 16 至 21 日在莫斯科舉行，1600 多名世界各國的東方學家彙聚俄羅斯，就亞洲和北非的歷史、現實以及未來的相關問題進行了學術研討。這是繼 2000 年加拿大蒙特利爾第 36 屆大會以後，世界東方學家的又一次盛會。

國際東方學家大會是一個有很長歷史的學術會議。其第一次會議召開於 1873 年，地點在法國的巴黎。1874 年，第二次會議在英國的倫敦舉行。此後，一般是每隔二至三年舉行一次大會，1908 年以後，通常是三至四年召開一次 (兩次世界大戰均造成會議未能如期舉行)。自 1993 年在香港舉行的第 34 屆大會以來，最近的幾屆大會的間隔都是四年。自 1873 年至今，這個在國際上享有盛名的大會已有 130 多年的歷史。參加這樣的會議，會使人感到個人力量和成績都是微不足道的。與大會的歷史向相比，資格再老的學者也是小輩後生；成就再大的學術權威也只是滄海一粟。俗話說，“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借用到這裡，也可以說“鐵打的會議流水的學者”。對大會來說，每個參會者都是匆匆過客。很多與會的學界名流雖都風光一時，但終將成為歷史，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被人忘記，但大會仍然會按預定時間召開。只有那些留下經受住時間考驗的著作的學者，才能在百年以後仍不斷地被人們提起。所以，參加這樣的會議，有助於克服我們急於求成、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態，促使我們靜下心來，扎扎實實地從事學術研究。

國際東方學家大會還是一個具有廣泛國際性的學術會議。世界各國的東方學家都以組織、參與這個大會、在這個大會上發表論文為榮。一百多年來，會議的舉辦地點遍及歐、非、亞、拉美和大洋洲等五大洲的 22 個國家和地區。迄今為止，主辦過這個會議的國家、地區和城市有：法國 (巴黎 1873、1897、1948、1973)，英國 (倫敦 1874、1892、牛津 1928、劍橋 1954)，俄國 (聖彼得堡 1876、莫斯科 1960、2004)，義大利 (佛羅倫斯 1878、羅馬 1899、1935)，德國 (柏林 1881、漢堡 1902、1986、慕尼黑 1957)，荷蘭 (萊頓 1883、1931)，奧地利 (維也納 1886)，瑞典 (斯德哥爾摩和克利斯蒂安尼亞 1889)，瑞士 (日內瓦 1894)，阿爾及利亞 (阿爾及爾 1905)，丹麥 (哥本哈根 1908)，希臘 (雅典 1912)，比利時 (布魯塞爾 1938)，土耳其 (伊斯坦布爾 1951)，印度 (新德里 1964)，美國 (安阿伯市 1967)，澳大利亞 (坎培拉 1971)，墨西哥 (墨西哥城 1976)，日本 (東京和京都 1983)，加拿大 (多倫多 1990、蒙特利爾 2000)，香港 1993，匈牙利 (布達佩斯 1997)。從會議的主辦國和地區可以看出，這個大會一方面具有廣泛的國際性，同時又是以歐洲的東方學家為主體。我們看到，不僅歐洲國家主辦的大會次數較多，早年的會議主辦國也是由歐洲各國輪流承擔。直到 1964 年以後，這種情況才逐漸改變。

國際東方學家大會又是一個對國際東方學的發展有重要影響的講壇。各個時代的各國著名東方學家都曾在這個講壇上發表他們的成果，特別是歐洲的東方學家，一生都要多次參加這個大會。每次大會都及時地交流了各國東方學家的學術成果和信息，並加強了各國學者之間的聯繫，使東方學的研究理念、手段和方法不斷進步，從而有力地促進了世界東方學的發展。

一百多年來，國際東方學家大會所討論的內容不斷拓展，參加的人數也不斷增多。起初，參加大會的主要是以法、英、俄、德等國學者為主體的歐洲學者，會議討論的問題以中國、印度和中亞的考古發現和歷史為主。以後，參會的學者逐漸擴展到全世界，大會所討論的問題隨之不斷拓展，致使大會的名稱也不斷演變。在 1973 年以前召開的 29 屆大會，其名稱均為“國際東方學家大會”(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而第 30 屆 (1976 年) 和第 31 屆 (1983 年) 大會則名為“國際亞洲和北非人文學者大會”(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uman Sciences in Asian and North Africa)。從第 32 屆 (1986 年) 大會起，大會又名為“國際亞洲和北非研究學者大會”(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sian and North Africa Studies)。現在，大會所討論的問題的範圍擴展到整個亞洲和北非的歷史、現實和未來。此次大會雖沿用了第 32 屆大會以來的名稱，但同時使用“國際東方學家大會”的名稱，給會議代表

的正式邀請書和普京總統的賀電所使用的就都是後一名稱。

就最近的幾次大會而言，開會的方式有全體大會、分成若干組的專題小組討論會 (Panel) 和圓桌會議 (Round Table) 三種形式。全體大會一般舉行兩次，即第一天的開幕式 and 最後一天的閉幕式。第一天的全體大會，除了開幕式等禮儀性的程式和禮節性的發言以外，一般還要有主題發言。專題小組討論會是大會的基本形式，往往是十幾個甚至幾十個小組同時進行，參會者可以選擇自己感興趣問題參加任意一個小組。各小組參會者的多寡完全是隨機的，有的小組可能聽眾很多，如果座位不夠，就只能站著聽會；有的小組可能聽眾很少，只有幾個人參會者；也有的小組因為前來參加的代表和聽眾太少不得不臨時取消。就我所見，大會的代表一般對有關中國問題的小組討論興趣較大，參會者一般能達到三十多人甚至更多。圓桌會議的規模介於全體大會和小組會議之間，往往是就一涵蓋面較大的主題展開討論。但圓桌會議的場次比小組討論會少得多，此次大會只有三場次的圓桌會議。

這次會議的主題，英文是：Unity in Diversity，俄國人說這句話來自古印度的箴言，而古代俄國思想家也有類似的說法。在普京總統給大會的賀電中也提到了這句話，普京總統給大會的賀電在俄羅斯駐京大使館的網頁上被翻譯成了中文。從中我們知道俄國人將 “Unity in Diversity” 翻譯成了 “多樣化中的統一性”，這當然是可以的。但我反復琢磨，如果翻譯成 “和而不同”，似乎更加貼切。“和而不同” 出自《論語》，歷代注疏家做過出色的解說。照我的理解，將其解釋成 “既能團結和睦，又分別保持各自的特點”，應該大致不錯。中國、印度和俄國的思想家都有類似的表述，說明這一認識是超越了國界的真知，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和而不同” 之所以成為大會的主題，是因為這一思想並沒有過時，有著巨大的現實意義。我們都知道，在俄國還存在嚴重的 “不和” 因素，惡性恐怖事件時有發生。在會議期間，會場大門荷槍實彈的警衛也與 “和而不同” 的主題形成鮮明的對照。大會閉幕後不久，先後發生了兩架飛機墜毀和三百多名人質被殺的恐怖事件。這說明：越是在 “不和” 因素突出的地區和國家，人們對 “和” 的訴求越強烈。“和而不同” 是超越時空的真知，尊崇這一原則，不僅有助於化解一國之內各種 “不和” 因素，對处理好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有很大現實意義。

在大會的總主題之下，會議討論的內容又被分為 12 個學科和研究領域，即：世界東方學學術史、比較語言學、歷史、精神文明、文學評論、經濟、民族和社會人類學、社會生態學——環境與時代的需求、國際宗教、新技術、東方教育、博物館檔案圖書館出版社，每個學科或研究領域之下又分若干專題小組，分別進行研討。圓桌會議共有三個場次，其內容分別是：21 世紀東方學對社會發展的價值和意義、全球化——東方和西方、中亞和高加索之過去和現在的文明。以上所列學科和研究領域，已非傳統的人文學科所能完全容納，這恐怕是最近的幾屆大會不再成為 “人文學者大會” 的緣由。

可能是由於參加此次大會的中國學者太少，會議安排的關於中國問題的小組專題研討只有一場。這個專題討論小組的名稱是：“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從計畫上看，原準備到會的有一位澳門的中國學者和一位華裔美國學者，但這兩個人都未能到場，實際參加這一場討論的中國人只有我一個。在這個小組發言的學者及其論文題目如下：

薩莫依洛夫·尼·安 (俄國)：沙皇與遼東

郝春文 (中國)：從衝突到相容——中國中古時期傳統社邑與佛教的關係

Kurihara Keisuke (日本)：中國古代聖哲有關人類生存的基本觀念

Бокшанин А.А. (俄國)：朱元璋價值觀的改變

Бугрова М.С. (俄國)：英國在中國與西方關係的發展中所起的作用

Варенов А.В. (俄國)：中國和印度古代軍車的比較

Врадий С. (俄國)：從有關林則徐的傳記看中國古代列傳的一些特點

Кожевников А.Е. (俄國)：清朝社會中的西化思潮

Соколов-Ремизов С.Н. (俄國) 關於中國的閒章

Kudzerator Olga (俄國)：關於中國的占卜文化

孫靜 (俄國)：兵家哲學對中國社會和思想的影響

可以看出，這個場次的發言者以俄國的漢學家為主，發言者完全根據自己的研究專長報告研究

成果，所涉及的時代包括古代和近代，所涉及的研究領域也很寬泛。原計劃在這個場次發言的還有兩個日本人和一個德國人，但均未到場。後來，日本學者在大會的安排以外，又單獨組織了一個“唐宋以後中國社會的變革及其意義——以科舉考試、城市化和宗族體系為視角”專題討論會，用了一天時間，分為三個小組。發言的學者及論文題目如下：

第一小組：中國宋代文官考試教育制度對社會和文化的影響

高津 孝 (日本)：文官考試和中國文化——多樣性文化的萎縮

Hilde De Weerd (美國)：科舉考試的附庸和代理人——12 世紀教師的肖像

市來 津由彥 (日本)：朱熹的“士”之“修己治人”與“為己之學”

第二小組：宋代社會的控制結構——行政體系的結構與社會的回應

須江 隆 (日本)：鎮的社會秩序——廟與地方士人

Angela Schottenhammer (德國)：中國五代時期的現實與觀念形態——以王處直墓誌銘為例

平田 茂樹 (日本)：南宋臨時都城杭州的政治地位——周必大之《思陵錄》、《奉詔錄》解析

岡本 不 二 明 (日本)：中國宋代城市中的娛樂與犯罪

第三小組：中國九至十九世紀的宗族與地方社會

Hugh R. Clark (美國)：宋初閩南 (福建) 的家譜傳統

遠藤 隆俊 (日本)：宋代典型宗族的秩序和結構——範氏十六房的結構

岡 元 司 (日本)：南宋溫州士人的家庭與墓地——以地方社會為視角

井上 徹 (日本)：明晚期廣州的宗族組織——顏俊彥《盟水齋存牘》研究

中島 樂章 (日本)：宗族原型追蹤——清中期徽州的一個小規模宗族組織之結構和社會流動策略

以上三個專題小組的發言者以日本學者為主，其中第一和第三小組中各有一個美國人，第二個小組中有一德國人，他們都正在日本進修或從事研究工作。原計劃在“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專題小組發言實際並未參加的幾個日、德學者，都在上列幾個日本人組織的專題小組會上發了言。

日本學界對參與國際東方學家大會歷來十分重視，每次都要組成專門的籌備委員會，負責遴選參會學者，籌集參會者的經費。每屆大會都能得到不止一個財團的資助，所以，多數參會的日本學者的經費都是籌備委員會募集來的。像上文提到的“唐宋以後中國社會的變革及其意義——以科舉考試、城市化和宗族體系為視角”專題討論會，就是由一個日本公司資助的，所有在這個專題討論會上發言的學者的往返路費和大會期間的費用都由該公司資助。日本的東方學學者對參加大會也很積極，特別是青年學者，參加大會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他們變成東方學家的入門券。由于以上兩方面原因，參加最近幾屆大會日本學者都很多，北海道大學教授石塚晴通說參加此次大會的日本學者有一百多人。就大會的安排來看，有關日本的問題被分成幾個專題小組，每個小組的發言者都是以日本學者為主。

同為亞洲國家，日本學界對大會熱衷和中國學界對大會淡漠形成了強烈的反差。特別是日本學者組織的有關中國問題的專題研討會深深地刺痛了我。於理而論，學術是沒有國界的，就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應該歡迎任何國別的學者研究中國。但是，如果一批外國人在國際場合討論中國問題，反而沒有中國人參加，總不能說是令人鼓舞的事情吧。就中國問題研究的實際情況而言，雖然外國學者的研究成果不容忽視，但從整體上看，應該承認，還是中國人最有發言權。至少我所從事的中國古代史學科如此。特別是最近二十多年來，我們在各個斷代和各個領域都取得了令國際學界矚目的成果，可以說是高手林立。以這些豐碩的成果和眾多高手為後盾，在任何國際講臺上討論中國問題，都理所當然地應該有中國人的聲音，只有這樣，才能與我們在國際上的學術地位相適應。

參與國際東方學家大會的中國學者較少，不是由於大會的組織者或西方學者的原因。至少是最近幾屆大會，主辦國和大會的具體組織者都熱誠地歡迎中國學者參加，西方學者也很歡迎中國學者參加他們的專題討論場次。特別是有關中國問題的討論，中國學者的參加可以提升討論的層次。在國際東方學家大會上出現現在這樣的尷尬局面，完全是我們自己剝奪了自己的發言權。

孔子說過，“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大會期間，這句話總是在我的耳邊迴響。在改革

開放以前，就中國古代史的研究而言，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與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相比，應該是各有特色。但我們都知道日本學者關於中國古代史研究的成果對西方學者的影響更大一些，被採用的更多一些。造成那樣一種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有意識形態因素的影響、有當時中國與世隔絕因素的影響等等。但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學者比較注意把他們的成果介紹給英語世界的同行。我們並不懷疑國外同行的漢語言能力，但中文再好的漢學家也更願意用自己的母語閱讀。如果我們注意把自己最重要的成果譯成英文（參加國際會議只是方式之一），無疑會擴大中國學術界在國際上的影響。

在這方面，日本學者就做得比我們好。我們都知道，在日本科技界，提倡直接用英文發表研究成果。很多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也往往附有英文的提要或簡介。如日本東洋文庫出版的一套有關敦煌吐魯番社會經濟文獻的叢書，每種都附有英文的目錄和比較詳細的解說。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介紹給英語世界的同行，不但可以擴大在國際上的學術影響，同時也是融入國際學術界的開端。積極參加國際學術活動，就是融入國際學術界的最好方式。在此次大會期間，日本人自己組織的有關中國問題的專題小組討論會，發言者和參加者都以日本人為主，但全體參加者自始至終都堅持用英語發言、提問和回答。看得出來，不少人的英語並不夠好，從他們多次因不小心把英語說成了漢語來看，他們的漢語要比英語好。但他們堅持說英語，有時聽不懂英語的提問，就請在場的朋友把英語翻譯成日語，然後再儘量用英語回答。絕不能認為他們是在故作姿態，對日本人來說，用英語在國際會議上做一次發言和主持一個英語的專題討論都是一種資歷，甚至是成為國際東方學者的標志。不管他們的看法是否合理，他們積極參與世界、讓世界儘快了解自己的精神都是令人感動的。近代以來，日本的近代化和現代化進程都比我們快，參與世界的意識比我們強應該是重要原因之一。

對中國學者而言，不能參加本屆大會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但是，現在中國學者與外國學者聯繫的內外部環境都是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不論是有關整個東方學的研究，還是有關中國的研究，中國學界都沒有理由繼續游離於國際學術圈之外。即使中國學者的水平最高，如果游離於國際學術圈之外，他的影響也會被大大地淡化和弱化。由於外國學者的研究在理論、選題和方法等方面都有借鑒意義，如果缺少國際間的交流，最終也會對我們的學術發展形成制約。所以，加強和英語世界的學術交流，無論對國際東方學的發展還是對中國東方學的發展都應該有利的。更重要的是，在這樣一個大型的具有重大國際影響的國際學術會議上討論中國問題，必須有中國學者的聲音。在這樣的大道理面前，妨礙我們參會的任何理由都會顯得缺乏說服力。每一個中國學者都應該認識到，積極參與國際學術交流，將我們的學術成果介紹給外國同行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

第 38 屆國際東方學家大會將於 2008 年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舉行，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國學者積極參與下次盛會，更希望在不久的將來，中國能成為這個大會的主辦國。現在國內流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多是以中國學者為主，再請幾個或十幾個外國學者作為點綴，會議使用的語言一般是漢語。這樣的國際學術交流當然是有意義的，但也是遠遠不夠的，特別是對英語世界同行的影響是很有限的。所以，我們應該大力提倡參與和組織以國外同行為主體的、用英語作為工作語言的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4 年 9 月於上海

“社會與國家關係視野下的漢唐歷史變遷 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劉雅君 (華東師範大學)

2004 年 10 月 22 日至 24 日, “社會與國家關係視野下的漢唐歷史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在華東師範大學召開。會議由華師大歷史系主辦, 日本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協辦。日本著名漢學家谷川道雄率領 11 位日本學者與會, 其中有東晉次、中村圭爾、葭森健介等知名的漢魏六朝史專家。與會國內學者有朱雷、簡修煒、齊陳駿等老一輩漢唐史專家, 張國剛、王素、嚴耀中、郝春文、牟發松、錢杭、盧向前、張金龍、侯旭東等一大批中青年知名學者。60 余位與會學者的治學領域涵蓋漢唐史的方方面面, 均為所在領域最活躍最前沿的研究者。53 篇會議論文圍繞會議主題——社會與國家關係視野下的漢唐歷史變遷, 從不同側面展開了研究。

一、漢唐歷史變遷的理論探索

從理論上探討漢唐歷史變遷中社會與國家關係, 是本次會議研討的重點。谷川道雄《試從社會與國家的關係看漢唐之間的歷史變遷》, 高屋建瓴地勾勒了從秦漢到六朝、隋唐的時代變化及其特徵。在他看來, 人與人結合關係的變化是這一時期社會與國家關係變動的基石。先秦是以神權聯結人群, 秦漢時發生了變化, 即在人和人之間形成了以人格的高貴性為媒介的關係, 六朝的社會與國家就是在這種人際原理下構造出來的。這一新的人際關係將處於四分五裂狀態的地區和人們相互聯結在一起, 構成了一種社會結合的原理, 即他的所謂“豪族共同體”。權威基於人格和道德, 於是權威與權力發生分離, 權威既保障同時又限制權力的組織與使用, 甚至消解權力。同時, 北朝的中國社會開始從單一同種的社會轉化為異種混成的社會。貴族的自立性、民眾聚落的自治性、邊境胡族的獨立性, 這些獨立於皇權之外的自立勢力仍然存在於擁有強大皇權的隋唐帝國內部。這些因素在到唐代中期以後進一步發展, 在唐宋變革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李文瀾《〈隋唐帝國形成史論〉的視野: 互相聯繫中的民眾與國家》, 詳細分析了谷川道雄把握漢唐史的思路, 即注重民眾在政治發展過程中的位置和作用, 把民眾的追求看作是歷史的動力, 從民眾的能動性看社會與國家的連接關係。東晉次《後漢帝國的衰亡及人們的“心態”》, 可以看作是在谷川史學的基礎上, 對漢魏之際人群結合關係的變化所作的具體研究。文章列述了漢魏之際不同階層、不同身份的人們對漢帝國的疏離和反叛, 並重點分析了導致這些行為的民眾心態。作者認為漢帝國的權威已經動搖, 人群結合的原理出現了新的變化, 即開始突破血緣、地緣紐帶, 而根據構成人員自己的意志, 與他人結成新的生活集團, 建立新的人際關係。這種關係典型地反映在漢末以豪族和逸民為中心的生活防衛集團和士大夫間的同志關係、俠義關係上。作者假定這種獨立的個人之間的關係可能是六朝社會構成的原理和基礎, 所謂貴族與民眾之間的人格歸依關係, 實際上也是這種個人結合關係。侯旭東在評述中認為還應該將“心態”的變化由士人推及更廣大的民眾, 並進一步明確隱逸之士與漢朝滅亡之間的關係。

牟發松《漢唐歷史變遷中社會的國家化試析》認為, 在當前的漢唐史研究中, 利用秦漢三國簡牘、漢唐石刻資料以及敦煌吐魯番文書, 對漢唐地方社會史的研究不斷取得進展, 但這些研究對地方社會整合中的諸因素特別是文化、傳統因素, 以及國家末端組織與宗族、里社等社會組織之間的關係, 地方社會勢力與國家政權之間的關係, 尚缺乏深入系統的實證研究。歐美與港臺學者以西方近代市民社會與國家二元分立及矛盾對抗的理論框架, 分析中國古代社會與國家的關係, 很容易將二者間複雜多變的關係簡單化、概念化, 與歷史實際不合。牟先生發言

的重點在於厘定中國古代史上“社會”與“國家”概念的相應歷史內涵，以及二者間的相互關係。他認為秦皇漢武時期，社會的高度國家化，即國家統合、主導、凌駕乃至全面干預社會生活，是統治者力圖達成的目標。六朝時期以門閥政治為代表的國家社會化傾向，即在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佔據優勢地位的門閥士族最後成為政治上的統治階層，他們的社會理想、經濟要求乃至文化價值訴求，極大地影響和改變了當時的國家，使得這一時代社會與國家的關係在中國歷史上獨具特色。但國家最終還是改變了他們，六朝時的國家社會化傾向，仍以社會的國家化為結局。

葭森健介《關於日本近代歷史學的形成：唐宋變革論成立的背景》，從日本史學史的角度追溯日本京都學派文化史學的理論來源，他認為這一學派的中國史分期說，仍然受到基佐《歐羅巴文明史》概念體系的影響，如參照西方封建制與絕對君主政體等概念探討中國史。評論人張國剛認為這個報告對我們反思漢唐史的研究思路、探索立足於中國史本身的闡釋體系，有很強的啟示意義。實際上，谷川道雄先生正是力圖從人際結合上把握中國歷史發展的特殊歷程。

趙昌平在開幕式發言中強調了“國家與社會”研究視野的重要性：“‘國家與社會’視野，即從政治學、社會學角度來研究歷史，也曾經是史學研究的主要視野，然而‘文革’以後，由於對先此研究中‘機械唯物論’傾向的批判，這一主要視野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段中也被冷落。……然而我又始終認為‘國家與社會’視野，仍應是一切人文科學研究的重要內涵，甚至是基礎；而在歷史學研究中，更應是核心內涵。因為我認為自從國家產生以後，作為人文科學研究對象的主體——‘人’的屬性可以分為兩個層面，即自然層面與政治層面，而這兩個層面的接合部就是‘社會’。”

更多的論文是選取一個側面看社會與國家關係。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對基層社會與國家關係的探討。

二、與國家互動的地方社會、基層社會研究

陳力《西漢時期咸陽原地區地方社會的空間像——據文物地圖資料和衛星照片的統計和分折》，利用了大量的考古學、環境科學和衛星航拍圖等學科的研究成果，統計、分析了咸陽原地區城市聚落的發展、人口分佈、規模等級、城市聚落分佈的空間特徵及其原因。該文認為咸陽原的城市聚落基本上是在漢代發生的，呈四級分佈，可以與漢代縣—鄉—里的行政系統相比照。咸陽原地區的漢代城市群密度大、規模大、人口多，有“兩個中核”，並按東西線狀分佈。該文認為成國渠的開修對該地人口聚居規模、分佈特徵有著決定性的影響。評論人楊華認為“兩個中核”尚需分析孰為政治中心，孰為經濟中心？漢武帝開通成國渠之前，該地因設陵縣而遷入的移民已相當多，因此成國渠與人口聚居的關係，尚需深入探討。

于凱《戰國秦漢之際的小農與國家關係》，認為戰國秦漢之際為中國古代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其間形成了中央集權的“大地域”性質的國家權力，與以“五口百畝”之家為主體的個體小農的廣泛分佈。國家與小農的共生互動關係，奠定了秦漢以後中國社會結構的基本格局。楊華《戰國秦漢時期的里社與私社》的研究也表明，戰國時期，中央集權統治在社會組織上摧毀了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里、社合一制，形成以地緣關係為紐帶的政治化的里社，南方楚地這一過程的發生大約在戰國中期。但楊華更看到了民間社會獨立於國家統治的活力。在里社官方化、政治化的同時，民間社會卻不斷突破國家里社組織，自發結合形成“私社”。楊華根據里社、私社的發展情況得出結論：當中央集權政治的控制力強大時，里社的功能加強，私社則較弱，其組織能力也較差；當中央集權政治的控制力減弱時，里社的行政功能減弱，私社便會膨脹；在動亂時期私社可能會很活躍，這是漢唐屢禁私社的原因。評論人陳力認為楊華的研究提供了關於私社產生、里社分離歷史過程的基本線索，有助於理解楚地地方社會的基本框架和中央集權與地方社會的關係，同時又希望楊華能結合居延簡牘中關於里社的記載，對比研究戰國秦漢時期南方和西北地方的里社。他還希望進一步了解楚地的社的內部組織形態。

同樣關注國家對地方社會的控制與地方社會自身活力的，還有佐川英治《北齊標異鄉義慈慧石柱所見的鄉義與國家的關係》一文。該文認為北魏政權對地方社會的政策，旨在打破民眾

地方性紐帶，控制地方社會。但民眾相互連帶的活力並沒有喪失。在魏末國家放松管制之際，地方社會借佛教思想興起恢復連帶關係的運動即是這種活力的表現。隨後北齊國家權力加強，又以律令控制邑義活動。章義和、張劍容《關於南朝鄉村研究的幾個問題》，研究了南朝村的自然形成及其對兩漢地方制度的突破，強調南朝地方統治是承認村制的基礎上建立的，在傳統里制崩壞的情況下，村承擔了更多的行政職能，並發揮著更大的社會影響力，直至唐代成為地方制度的一個完整單位。這篇論文表現了國家對地方社會自主發展軌跡跟隨、適應的一面。評論人中村圭爾就村與里的關係進一步作了追問：一是就“里村並存”，提出是否存在里轉化成村的情況；二是針對“村是由血緣和地緣秩序構成的村落共同體，是一種聚落”，認為還要深入研究里的社會結合原理。

侯旭東《朝廷、州縣與村里：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一文，則深入到基層社會內部，立足于北朝村民的立場，觀察他們所面對的二級國家（朝廷、州縣）對其日常生活的影響。著者提出“村里”的概念，認為村里並非簡單的具有自律性的村落社會，而是與上層的州縣、朝廷共同構築的生活的核心場所。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並非局限於村里這個層次，在很多方面，還與州縣、朝廷有所接觸，州縣、朝廷正是基於這種接觸對村民生活進行權力滲透與干涉。村民與州縣、朝廷間形成“不對稱交換”的關係，村民對官爵名號的追求起到維持與再造帝國結構的作用。評論人佐川英治認為村民的生活世界不僅有向上聯繫的部分，而且還有平面式的聯繫，如佛教、道教，它們都是民眾生活世界的一部分，不應忽視。郝春文《從衝突到相容——中國中古時期傳統社邑與佛教的關係》，則深入到這一方面。他依據敦煌文書，以微觀的視角深入社會內部看傳統社會末端組織社邑及其活動，是如何受到外來佛教潛移默化的影響而發生改變的。該文把這一過程分為兩期：前期以佛教文化與傳統文化在觀念和行為方式上的對立與衝突為主；後期以寬容和融合為主。該文認為外來佛教文化通過社邑活動滲透到民眾日常觀念中，從而實現了與傳統文化的融合共存，轉化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

對民眾日常生活狀況探討的論文，還有夏日新《漢唐節日形態的演變》。該文認為漢代節日發展到魏晉隋唐有了變化：出現新的宗教節日，傳統節日也受到宗教影響，有些地域性節日發展成全國性節日，節日趨向世俗化。高凱《從走馬樓吳簡蠡測孫吳初期臨湘侯國的疾病人口問題》，依據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所提供的社會信息，通過對孫吳初期長沙臨湘侯國疾病人口所做的統計與分析，在具體史實上印證了《史記》中記載的江南地區存在的“丈夫早夭”現象的真實性，同時，也從對吳簡中男女各年齡段疾病數的統計資料中，證明了在古代社會中，完全可能出現兒童高死亡率的現象。

三、社會階層、地域集團與國家構成

黃愛梅《從王官繼承現象看西周王權與貴族家族的關係》一文，運用青銅銘文與《周禮》進行對比研究，認為西周貴族成為王官取決於周王的政治、軍事需要，並通過了嚴格的冊命儀式。西周沒有出現“世卿”現象，貴族家族也不能自始至終繼承祖先擔任的具體職司，王官繼承與家族延續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繫。評論人楊華認為該文還應對周代世官的結構進行成分分析，對比“公族”與“非公族”貴族的世位繼承、王官冊命的異同。他還認為該文所論西周中後期周王軍隊中出現的“家族化”或“私人化”傾向值得商榷。

馬彪《論秦漢異同與士大夫的社會平衡機制》指出，秦漢時期同時出現了“君權擴大”與“平民發展”兩大傾向，秦以單一君權社會而亡，漢以君權社會與平民社會共存而興，而溝通這兩個社會的是士大夫階層。評論人黃愛梅認為文中有兩點值得特別關注：一是作者提出的秦漢社會結構的異同問題；二是作者指出了漢代士大夫階層在國家共同體中的重大作用，即君權和平民之間的溝通能力。同時，黃愛梅也指出：一是君權和平民不過是秦漢國家社會結構中的兩個構成元素，似乎不應被稱為“社會結構”；二是作者把單純重視君主集權的秦稱為“一元社會”，將漢稱為“君權社會與平民社會共存的新形式的二元社會”，而秦同樣存在平民階層，也應是二元社會；三是士大夫作為一個極具特性的階層，承擔著“社會良心”在內的種種角色，他們來自民間，教化民風。這個階層成員的上下層、身份、使命和社會、道德實踐的作用十分

複雜，自始就是超越於君權和民間之上的第三種力量。漢代社會較之秦代社會，其“新形式”就是社會構成中增加了士大夫這重要的一元，應是三元社會，如是，士大夫就不僅僅具有社會平衡的機能。

劉濤《東漢草書發展的分期與草書興盛的地域》一文依據漢唐文獻資料，從時間與空間兩個角度考察了東漢草書的狀態。這其實是考察東漢士大夫文化狀態及其地域特徵。該文的結論是東漢草書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以章帝朝杜度為標志的提升期、以順帝朝崔氏父子為標志的顯彰期和以靈帝朝張芝為代表的繁榮期。東漢時期，草書已經流行於士大夫階層，而且草書名家均為北方人士，草書興盛地區主要為三州六郡：司隸校尉部的京兆、洛陽和弘農郡，幽州的涿郡，涼州的敦煌、漢陽郡。

王永平《顧雍論——從一個側面看江東大族與孫吳君權的關係》，以漢末孫吳時期吳郡大族顧雍為代表，結合孫吳特殊的政治背景，對顧雍為相的原因與意義，顧雍為政的作風與實踐，以及顧雍在吳郡顧氏門風傳承中的作用，進行了闡釋。認為顧雍作為吳郡儒學世族的傑出代表，在孫吳政權江東化進程的關鍵時刻，出任孫吳丞相，避免了孫吳政局的進一步惡化，保證了孫吳江東化的和平進程。評論人張金龍對顧雍為相的原因提出了補充意見，他認為可以從吳郡顧氏與陸氏、張氏的姻親關係入手，對他們所結成的地域性政治聯盟在孫吳政權中的作用進行更深層次的研究。莊輝明、陳迪宇《東吳政權中後期會稽地區民間謠言的傳播、示意及控制》一文，通過分析東吳中後期會稽地區發生的三次有關吳主廢立的政治謠言，揭示了孫吳皇位繼承的非制度化的社會危害，並進一步分析了孫吳皇權與士族社會，特別是與會稽士族的關係，進而比較了江東吳郡地方大族與會稽大族在孫吳政權中的地位及其心理差異。評論人王永平認為，該文還應從孫吳皇權的運作及宗室政治的角度考察謠言。另外，王永平還認為該文中關於會稽郡士人製造謠言的深層原因是他們受到吳郡士族排擠的看法值得商榷，應將這一問題放在孫吳皇權運作及其與士族社會衝突的整體過程中去考察。

李磊《社會與國家關係視野下的兩晉士風》，考察了兩晉士風的演變及其對社會、國家乃至二者關係的深刻影響。該文認為隱藏在放達士風背後的，是士族階層的社會理想及社會責任意識。士族在地位上升後，力圖按照自己意願調整社會與國家關係，弱化國家，讓社會自為。他們以其社會影響力與所控制的國家權力推行理想。這樣做的結果加強了門閥士族對社會與國家的控制，同時也造成了社會上下階層的嚴重分隔。於是，利益最受損失的下層鄉曲之士強化了文化的保守傾向，上下層間形成了玄學與儒學的對立關係。評論人王永平認為批判時風者還有玄學人士中的務實派和受漢末、孫吳江東社會文化風尚影響的江南士人，這些都不是社會下層。所以需要進一步研究時風與其批判者之間的關係。張學鋒《南京象山東晉王氏家族墓誌研究》，簡要地回顧了南京象山地區王氏家族墓誌的發現與研究情況，並對出土的墓誌及其相關問題進行了考釋，該文根據墓誌的措辭認為僑姓士族在東晉建國之初尚有回歸故土的願望，流寓到第二代就已安於僑土了。評論人葭森健認為這一研究細化了我們對北方士族土著化的認識。

中村圭爾《東晉時期揚州的流民問題及其歷史意義》，研究了東晉的流民政策，認為東晉政府對流寓到不同地區的流民有不同的政策，讓三吳地區的流民當地化，以強化王朝的經濟基礎；而讓揚州流民保持僑州組織，以保留軍事力量。評論人章義和希望作者提供更多史料支持文中所述“流民不是以鄉里為單位流寓他鄉，以至為豪族所控制成為奴和客”的推論。章義和還希望了解免奴為良和給客制度下，大族和奴本身的態度與反應。

北村一仁《在南北朝國境地域的中下層豪族、同姓集團的動向》，以南北朝國境地域特殊的政治、軍事和地理環境為背景，提出“荒”的概念，即政治權力之外的地區。該文把南北朝國境地域分成東部、中東部、中部、西部四個區域，對於其中的下層豪族、同姓集團的軍事、政治活動進行了考察，揭示了中下層豪族與“荒”的關係，認為這些下層豪族、同姓集團既同時受到北朝、南朝政治體制的影響，又以其自身的反叛與抗爭脫離這種政治控制，由此便產生了教化之外的“荒”。孔毅《善教和善政：西魏崛起、變強的根本原因——以大統十三年前的西魏歷史為論述中心》一文認為，善教與善政是西魏的崛起、變強的政治基礎和物質基礎。善教“得民心”，解決了西魏政權合法性的問題，並確立關隴集團的核心價值觀；善政“得民財”，以“王道”為中心原則組織有效行政，積極維護社會經濟秩序。

李天石《略論漢唐奴婢法律地位的異同——以張家山漢簡與唐律的比較為中心》，研究漢唐間奴婢法律地位的變化。作者利用張家山出土的漢簡《二年律令》，結合漢唐文獻資料《唐律》對漢唐奴婢的性質、法律地位、以及官奴婢的管理問題進行了比較，認為漢代奴婢的法律地位高於唐代，漢代還未形成像中古時期那樣非常系統、詳密和森嚴的關於良賤身份的規定。漢代對奴婢的規定與當時社會古典經濟色彩比較濃厚有關，這些規定可以與當時羅馬法的規定相比照。劉進寶《唐五代音色人略論》一文，利用敦煌文獻對唐五代歸義軍樂營的音色人的身份問題進行了考察，揭示了敦煌歸義軍政權雖在大政方針與中原王朝保持一致，但也有自己的特色。其音色人的地位不同于中原王朝，仍保持較低的身份。張承宗《十六國與北朝時期宮女考略》，以十六國與北朝時期的特殊社會群體宮女為物件，結合史傳和墓誌考察了這一時期宮女地位、處境及女官的設置。

四、從意識形態側面看社會與國家關係

張國剛《國家與社會：漢唐“家法”觀念的演變》，試圖考察“家國一體”觀念的構建過程。該文認為漢唐時代的儒家倫理經歷了一個逐漸從經典文本到士族的禮儀名教、再到社會規範的發展過程。家法也從儒學世家的傳統學問，到士族門閥的禮教，進而融化到士庶之家的家規、家訓之中的發展過程。這個過程並非完全出於社會自為，處處可見國家的提倡、引導、規範作用。評論人東晉次先生則認為對該問題的探討需要細化“家”的概念，因為漢唐間家的形態是在不斷變化的。他還指出在儒家倫理由國家儀禮向社會規範滲透的同時，“王法”與“家法”也在分離中，這個傾向在唐代甚為顯著。討論中也有學者就漢代和六朝、隋唐的“家法”是否為同一範疇的概念，提出質疑。鍾國發《漢唐社會宗教體制的變遷》，探討了從漢代的儒教獨尊到南北朝佛道興起、再到隋唐形成儒釋道三教一體格局的演變過程。該報告認為漢唐間是中國高級宗教的產生期，三教一體格局的形成，在於社會普通民眾的宗教需求和國家統治的意識形態需求，三教任何一教都無法單獨滿足這兩種需求。而最終將衝突、融合著的三教和諧地納入同一社會空間的，則是政權的強力干預。這其實是從宗教的政治性與社會性來分析國家與社會的普遍關聯。評論人侯旭東先生指出，漢代宗教並非儒教一元，大量的出土資料證明皇室、官員、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都受到方術、術數的影響，這些也應納入漢代的信仰體系。武峰《神仙觀念與東漢宗教思想》，描述了東漢末年神仙觀念在社會上的迅速傳播，認為神仙觀念的發展擴大最終導致道教的形成，並對東漢政治產生了深刻影響。嚴耀中《東晉至宋佛教戒律的發展與特點》，通過論述東晉至兩宋時期佛教戒律的發展過程及其特點來說明佛教與中國社會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良性互動關係，傳統社會的總價值體系逐漸滲入並規範著佛教戒律。莊圓《從敦煌文書看唐代占卜的民間性》，以個案研究入手，認為唐代占卜在民間盛行，是受商業繁榮、民間教育推廣、宗教影響和境外占卜術傳入等多種因素的影響而造成的。

蓋金偉《唐代宗廟祭祀制度簡論》，通過對唐代宗廟祭祀文獻資料的梳理，勾勒出唐代宗廟祭祀制度的體系結構。並在此基礎上，探討了作為封建時代的高峰階段的宗廟祭祀制度逐漸強化政府性、淡化宗教性的主體走向。該文認為繁瑣儀軌的制度化正是政治性的體現，這是唐代與以前時代的明顯差別。評論人夏日新重新限定了該文的討論對象，他認為宗廟祭祀制度在唐代只是限於極少數人，並不是涵蓋全社會的制度。

五、政治結構中的中央與地方關係

陳金鳳《從“荊揚之爭”到“雍揚之爭”》一文，從中間地帶戰略的角度考察東晉南朝軍政形勢的演變。南朝從劉宋開始，為了加強皇權，任命宗王出鎮荊州，限制、分割荊州，以削弱荊州的勢力，但卻引發了雍揚或雍荊之爭，認為方鎮與中央的關係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間地帶的軍事政治形勢。陳志堅《從軍事角度看唐後期中央和地方關係：以唐後期軍事改革和唐末割據為中心》，把唐後期兩次軍事改革置於南北藩鎮不同的環境中，進行了詳細考察和對比論述。他認為這些改革在南方取得相當成效，在北方則沒有起到什麼作用。軍事改革在南北方的

不同後果導致南北地方統治上的差異，北方以藩鎮為單位進行割據，而南方則出現割據細碎化的現象，割據大多以州為單位。這一結果更進一步影響到整個五代十國的割據面貌。評論人陳勇認為應該深入探討唐後期軍事改革在南北取得不同收效的原因，對淮南道以外南方諸道的研究還應細化。

黃純豔《唐宋專賣制度變革與地方政府管理職能演變》，研究了唐宋專賣制度變革中國家和社會、中央和地方兩種利益關係。他認為經濟發展及制度變革使國家與商人建立共利的關係，而將地方政府排擠出專賣商品的直接經營環節，僅限於參與專賣商品的運輸和發賣，以減少地方政府對專賣利益的分奪，集利權於中央。

馮賢亮《明清中國地方政府的疆界管理——以蘇南浙西地域社會的討論為中心》，從歷史地理學的視野詳細分析了蘇南、浙西地區疆界上的不合理現象及其對地域社會的各種負面影響和危害。由於這兩大地域是以太湖這個獨特地理環境為緊密維繫的中心，所以錯壤問題所體現的不利影響涉及到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甚至釀成大的暴力衝突事件。評論人胡阿祥認為錯壤問題很多是中央有意造成的，以便利用地方衝突加強對地方的控制。

六、政治制度、政治事件及其他方面的研究

王素《關於隋及唐初三省制的“南朝化”問題——以三省首長的職權和地位為中心》，將三省制的研究與唐朝的南朝化問題結合起來，以三省首長的職權為研究對象，對於國家中央決策機構的沿革變化進行了探討。他認為隋唐三省制是對南朝梁陳制度的繼承，此說補證了陳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淵源說。評論人孫繼民指出，王素先生在前人基礎上，利用敦煌文書、儒家文獻經典，從官制層面研究“南朝化問題”，進一步擴大了研究的內涵。但陳寅恪的“南朝化”概念，是就北朝制度在隋唐的發展而言的（財政制度江南地方化），而其隋唐制度淵源三源說中也有梁陳說，似乎與南朝化概念不盡相同。二者關係若何？值得進一步探討。王剛《“漢家制度”的理論意義及政治取向》一文，認為漢家制度的理論內核是以“承秦”完成政治體制的現實承接，以“繼周”遠紹德政的精神文化傳統，並在此過程中對現實地域政治進行整合，以靈活的態度對秦、齊、楚政治進行改造，形成了周道、秦制、齊政的交融特點，這些在政治實踐中體現為極具特色的“霸王道雜之”的漢模式。

福原啟郎《魏晉時代關於批評九品中正制度的議論的特徵》一文，將魏晉時代批評九品中正制的議論，按其特徵分為前後兩期，正好位於分水嶺位置的就是劉毅的奏疏。前期主要是批判中正許可權過大，後期則轉到風俗的污濁問題。中正許可權過大是因為缺乏懲處制度，而這一點正表明了中正的權力並非來自帝王。評論人張旭華認為中央主管中正的機構司徒府對中正的違法有權進行處罰。張旭華提交的論文《北魏中正職權考略》，對北魏中央系統的州郡中正的職權範圍，他們在選舉實踐中所發揮的作用，進行了考察；認為北魏中央系統的州郡中正的主要職權是“品裁州郡，綜覆人物”，制定“方司格”與“季月”參選，以及薦舉人才、臨時委任州府僚吏、主持清議等。北魏末年，由於選舉制度的腐敗，中正職權也日趨衰落。張金龍《北朝隋代的領左右與備身制度——附論隋末的驍果》指出，領左右之職最早出現於北魏孝明帝朝元叉專政之時，設置目的在於使專權者能長期控制朝政。至東魏北齊時有領左右府，隸屬領軍府，隋朝繼承並發展了領左右制度。評論人張承宗就隋朝領左右制度與西魏、北周制度的關係，驍勇與領左右制度的關係，與作者交換了看法。孫繼民《唐大中四年（844）申岸撰墓誌文考釋》一文，對唐大中四年申岸自撰的墓誌文進行了考釋，證實了唐代潞州駐軍以潞州官健為主要構成的事實，以及唐朝廷對於澤潞鎮的統兵體制進行的改革等具體的問題。胡寶華《唐代諫官小考——以諫議大夫為中心》，對唐代諫官制度進行了歷史的考察，他認為諫官的選任資格主要依據人格與文史修養，同時還總結了唐代諫官系統的兩大特點：一是“清濁”觀念依舊存在，二是唐代諫官在社會上的名譽地位以及形象始終沒有明顯的變化。

此外，盧向前《盧從史冤獄與牛李黨爭》把盧從史出兵山東的事件放到牛李黨爭的環境中考察，揭示了唐憲宗政策的轉變與盧從史冤獄有直接的關係。陳業新《秦漢時期生態法律的研究》，對秦漢時期生態法律及其具體的執行情況和它的實施結果進行了動態研究。陳勇《論唐代

長江下游農田水利的發展》，分區考察了唐代長江下游水利工程在數量、規模、分佈，以及技術等方面的劃時代進步。評論人李文瀾提出兩點疑問，一是論文稱民間大量修築小型水利工程，而政府卻常“罷私堰”，二者之間關係如何？二是論文稱中唐以後，隨著太湖堤塘的修築，推動了“平原東部塘浦圩田系統的形成”和“湖東水網平原的河網化”，這一變化意義何在？李方《怛羅斯之戰與唐朝西域政策》，通過對唐朝與大食怛羅斯之戰的背景及其經過的考察，揭示了這次戰役既是唐朝與大食在中亞地區勢力角逐的必然碰撞，也是唐朝對於西域、中亞諸國的對外政策的必然結果。她認為唐朝的西域政策是“蔥嶺以東”為車，而“蔥嶺以南”為卒，二者不可兼得時則丟卒保車。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研討會期間，適逢谷川道雄的代表作《隋唐帝國形成史論》中譯本在滬出版，會議特地舉行了此書的首發式。出版該書的上海古籍出版社趙昌平總編發表演說，詳細闡述該書對推進北朝史、隋唐史研究的重要意義，以及對北朝隋唐文學等相關學科的啟示。他指出，谷川先生把他書中的理論構架稱之為“國家形成的原理”，但“先生所說的原理，並非是外在的、先驗的理論預設，而是在對史料之詳盡的佔有、敏銳的發現、慎密的思辨基礎上，抽繹而來的一種史識。由早年之重視國家與民眾的對抗，到後來發現以公共性質為紐帶的兩者之際的連續側面，支撐著其非連續=對抗側面——先生這一重要的理論發現極富啟示，它突破了機械唯物論的影響，而更接近事實地顯現了國家、權力層與深層的民眾意志三者的動態關係。”谷川先生在發言中回顧了三十多年前撰寫此書的緣起、過程、全書主旨以及有待深入研究之處。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所所長夏日新研究員，進一步就該書所取得的成就、影響和谷川史學的特點及其在日本漢學界的地位，作了發言。

研討會上共有 18 名學者作大會主題發言，兩場小組發言。此外還就當前的學術前沿動態、治學方法以及研究生培養等問題，舉行了一次以中青年學者和研究生為主的無主題沙龍。正如牟發松教授在大會總結中所說：與會學者從社會與國家關係的視野，從不同的領域和側面，對漢唐歷史變遷進行了深入具體的探討。由於與會的中外學者均為活躍在漢唐史第一線的專家，在所研究的領域內具有前沿性和代表性，而且絕大多數與會學者在會議召開前就提交了高質量的學術論文，絕大多數評論人預先收到了被評論文並撰寫了書面評論，因此研討會時間雖短，交流卻很充分、深入，是一次學術含量很高、符合學術規範的學術會議。會議不僅有效地推進了會議主題的研究，使漢唐史研究中的許多問題在社會與國家關係視野下得到重新認識，而且使社會與國家關係的理論在漢唐史研究的實踐中得到深化和修正。

2004 年美國宗教學會年會簡介 郝春文 (上海師範大學)

2004 年美國宗教學會年會於 11 月 20 日至 23 日在美國德克薩斯州聖安東尼奧市召開。雖然名稱是“美國宗教學會年會”，但參加者並不限於美國，世界各地的宗教研究者也都可以成為該會的成員，所以，這個會議實際上是一個具有國際性的大型宗教學術會議。“美國宗教學會”是美國四大學會之一，會員眾多，參加此次會議的會員有四千多人。這是我所參與人數最多的國際學術會議，小小的聖安東尼奧城的旅館、飯館和街道上，到處都是掛著會議標志的參會者。

雖然參會者多，但並無全體會議，所有會議均採取專題小組 (panel) 討論的形式。經常是幾十個專題小組討論會同時舉行，參會可根據自己的興趣去聽會。有的小組僅有幾個人，多的有一百多人。但有的會場很大，可坐一千多人。

參會者以研究西方宗教的居多，研討西方宗教的專題小組的數量佔壓倒優勢。在美國宗教學會中，佛教也是一個很小的部門。每次會議只能有幾個專題小組。此次會議佛教部門組織了五個專題討論小組，即：佛教與健康、佛教的咒語、世界各地佛教石窟寺、佛教教育、佛教的聖徒及其地位。我所參加的專題討論小組是由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太史文教授組織的“世界各國石窟寺研究”，參加這個小組的成員及其論文標題如下：

Chunwen Hao, The Social Life of Buddhist Monks and Nuns in Dunhuang during the Late Tang, Five Dynasties, and the Early Song

Angela Howard, Buddhist Caves of Kucha, Xinjiang

Christian Luczanits, Cave Temples in Tibet

Keiji Sadakane, Indian Buddhism in the Dark

Robert Sharf, The Ritual Function of the Dunhuang Grottoes

Walter Spink, Amenities and Necessities in Monks' Cells at Ajanta

Stephen F. Teiser, The Implied Ritual: Paintings of the *Bhavacakra* in India and China

Wei Yang, Tantric Ritual and the Male Gaze in a Buddhist Cave-Temple in Northwestern China

佛教部門之外，美國宗教學會還有一個中國宗教小組。這這次年會中，這個部門組織了三個專題討論小組；傳教士有關中國問題研究的再評價、晚明時期中國新宗教的產生和中國宗教的門派傳承。

IDP 新進展：敦煌文字數據庫

1 高奕睿 2 林世田

(1 英國國家圖書館國際敦煌項目研究員 2 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部研究館員)

一、簡介

敦煌文字數據庫是國際敦煌項目的一個子項目，目標是利用敦煌寫卷建立一個互動的中文文字數據庫。這個項目不但能幫助學者研究寫卷，而且為研究文字提供一個實用性很高的工具。由於近幾十年的考古發現，人們對研究早期漢字字體的熱情日趨高漲。儘管敦煌文獻發現已經有一個多世紀，然而利用這批文獻進行文字研究所作的工作還很少。迄今為止，尚未有一個綜合性的研究成果，本項目即嘗試填補這一空白。

二、概覽

迄今為止，學者研究古文字的成果有印刷本和數據庫兩種形式。從其功用來講，兩者的差別不是很大，絕大部分網上古文字數據庫可以說是印本字典的翻版。

過去 50 年考古發現的文獻材料相當一部分已經整理出版，學者早已進行識讀。先秦文字具有多變性，而且與現代字體有很大的差異，因此古文字研究越來越受到關注，以至於產生了一門新的學科——古文字學。一批專門性的著作相繼出版，如《楚系文字編》、《楚簡帛文字編》、《包山文字編》、《郭店文字編》、《吳越文字彙編》、《戰國文字編》，均為研究戰國時期各國文字的綜合之作。

敦煌文獻儘管數量上佔有絕對優勢，而且面世已經有 100 多年，與古代文字研究成果疊出相比，敦煌文字研究則相對冷清。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學者普遍認為敦煌文字與今天通行文字基本相同，差異甚少。然而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識讀敦煌寫卷仍是研究者面臨的一個巨大的挑戰。

1930 年出版的劉復和李家瑞《宋元以來俗字譜》是研究中古文字的早期著作，該書是將宋元以來十幾種版印小說中俗字集中整理的成果。至於敦煌文獻則有潘重規《敦煌俗字譜》、張涌泉《敦煌俗字研究》，應該說它們還不是很全面。比喻潘著僅是利用臺灣所藏的 144 件敦煌文獻，而張著則集中在俗字的研究。還需要提及的是現代人所提供的字書詞典多是描摹、複印剪貼等手段，有明顯人工痕迹或模糊不清，讀者很難確認其精確的字形。敦煌文字數據庫則完全使用精確掃描的圖像製作，原原本本反映原貌，從根本上解決了這一缺陷。

在數字化領域，還沒有其他項目可與敦煌文字數據庫相類似，現存字典及數據庫其重點或功能均與之不同。相對比較相近的是臺灣所作的異體字字典 (<http://140.111.1.40>)，將中國傳統的字典及字書的所有字形綜合一處，並將原書掃描，鏈接，儘管掃描的質量非常模糊，但是提供了一個極為有用和可靠的工具書。

即使到今天，古文字數據庫基本上仍採用紙本字典形式，而沒有充分利用電腦處理文字的優勢。網上數據庫不僅要有從各個途徑檢索的功能，而且能使用戶用自己喜歡的方式來進行檢索，用戶可以按照自己的希望的方式把它作為工具進行研究。這也是敦煌文字數據庫的目標之一。

目前尚沒有有關敦煌字體或中古時期字體綜合性工具書，不管是紙本的或電子本的。研究敦煌文獻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專門的學科，但是尚未充分注意敦煌文字的研究。敦煌文字數據庫則旨在幫助學者填補這一空白，並促進相關研究。傳統的字書有一個很大的不足，即文字與原書相脫節，而敦煌文字數據庫則徹底解決這一問題，它既能反映某一個文字的演變，又能把字和原來的卷子關聯在一起，學者據此可以進行綜合研究。

三、數據庫功能

敦煌文字數據庫用戶可以通過互聯網使用，其基本功能如下：

(一) 資料顯示

- 1、文字和寫卷使用高清晰圖像，用戶無需再查閱其他文獻。
- 2、點擊某一字可立即看到其所在的原卷。文字圖像信息包括寫卷的日期、出土地、出土日期、收藏地以及研究目錄。
- 3、可以將某一字按照一定的順序排列起來，以便進行比較。如按照時代的順序排列可以發現字體演變規律；可以將同時期內佛經、道經以及世俗文書中的相同文字進行比較；也可以將傳統字典中某一字與敦煌文獻中的字相對比。敦煌文字數據庫可以使學者根據不同的需要進行各種比較研究，這項工作過去學者主要靠手工操作來實現，費時費力，現在可以在幾分鐘內完成，因此它會成爲一個非常有用的研究工具。

(二) 文字數據

傳統文字數據庫，例如字典、詞典，其文字檢索幾乎全部採用標準字體。敦煌文字結構不完全同於現代文字，同一個字甚至有十幾種寫法，有的字體甚至沒有一個現代的對等的結構。因此，在敦煌文字數據庫上某一個敦煌文字的圖像有時與若干個現代字相連接，而不僅是一個。此外，尚有一些圖像沒有相對應的現代漢字，則需用其構件來組成。

(三) 數據庫外層信息

這部分信息來自於像《干祿字書》、《五經文字》、《龍龕手鑑》等傳統字書詞典。這些字典包括 8 至 10 世紀使用的標準和非標準文字。在敦煌文字數據庫中可以與敦煌文字進行直接比較

(四) 檢索

用戶可以依據以下原則檢索。

- 1、與現代規範字相對應的文字可以默認檢索。
- 2、在傳統偏旁部首檢索的基礎上，敦煌文字數據庫擴而大之，可以根據字的任何一個構件來檢索。
- 3、因爲敦煌文獻中存在大量外來語，利用傳統的拼音檢索只能檢索出其中一部分。敦煌文字數據庫將設計一個更靈活的音韻檢索系統，儘量符合敦煌文字的特點。
- 4、除了以上原則之外，用戶還可以通過寫卷的日期、存放地、文獻的分類來限制檢索結果。

四、數據庫製作方法

(一) 數據庫設計方案

- 1、大容量：現存敦煌文獻不下 5 萬件，每件文獻按 5 千字計算，總字數將遠遠超過 2.5 億字，在數據庫功能上必須支持這麼多的文字。另外也必須考慮文件命名的便利，因爲每一個文字圖像都需要一個唯一的文件名和入徑。
- 2、可持續性：敦煌文字數據庫是個長期的項目，要求不斷地能增加新的數據，而不需要進行大規模的修改。

3、可延伸性：儘管敦煌文字數據庫是專門為敦煌文字設計的，但它有非常強的可延伸性，它還可以容納金石銘刻、竹木簡牘等文字，還可以加入西夏文、納西文等少數民族文字。

4、檢索功能的靈活性：因為敦煌文字與現代文字相比多有差異，因此檢索功能需要具有一定的靈活性。

(二) 數據庫製作程式

1、輸入文字外層信息：敦煌文字數據庫首先需要輸入正字及拼音，此外還需將《干祿字書》、《五經文字》、《龍龕手鑑》等中古時期的字書掃描、切分。

2、切字：過去像這樣的文字數據庫絕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切字上，而我們設計了自動選字、切字、命名的軟件工具，使用這種方法，切字的時間大為縮短。

3、文字與圖像連接：這是另外一個比較費時的工作，敦煌文字的每一個圖像至少與一個標準字連接，經常是一個對應若干個。因為敦煌文獻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佛教文獻，我們利用現有的電子版佛經與文字圖像連接。

五、結語

敦煌寫卷多達五六萬件之多，敦煌文字數據庫將是一個長期的項目。為了讓讀者儘快受益，我們將首先處理近千件有紀年的寫卷，在此基礎上擬編撰一部《敦煌字海》，試圖為 4 至 11 世紀字體演變提供一個座標。這個項目目前還在試製之中，尚祈海內外專家不吝賜教。

心許天山 身獻高昌 ——讀馬雍《西域史地文物叢考》感言 柴劍虹 (中華書局)

因為在臺灣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講課的需要，我在教研室的書櫃裏找出馬雍先生的論文集《西域史地文物叢考》(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版)，閱讀張政烺先生和余太山先生分別為此書寫的序與編後記，知道馬雍先生離開我們已經將近二十年了。我趕緊發電子郵件請太山兄發來馬雍先生的簡歷，知道他生於 1931 年。假若他活到今天，也不過才七十出頭，天不假年，摧折英才，何其不公！

我沒有見過馬雍先生，他的論著，也是在他去世後才陸續地讀了幾篇。1979、1980 年我為撰寫研究岑參邊塞詩的碩士論文回新疆實地考察時，他正在為考訂巴里坤、哈密、拜城的一些重要碑刻做準備，所以無緣識面。我當時很想瞭解唐代伊吾、北庭遺址的文物古迹，也在為撰寫《瀚海辨》的考證文章收集資料，還不可能讀到他後來發表的精當考證文章，只能參看一些舊有資料，現在想來真是憾事。馬雍先生的淵博學識與治學特點，政烺先生的序與太山兄的編後記均有精確的介紹與評論，無須我再贅述。這裏先引錄太山的兩句話，然後再結合當前敦煌吐魯番學的研究現狀，來談談我的感受。太山說：

馬雍先生家學淵源，國學根砥極為雄厚，在處理古文獻時左右逢源，得心應手；他精通多種外語，於西洋史造詣亦深，故能觸類旁通，舉一反三；加上他過人的才智，往往能洞幽燭微，發人所未發。他在學術領域內作出卓越的貢獻，顯然得力於此。《叢考》即充分反映了他在中西古文獻方面的學識。

應該指出的是，馬雍先生治古史地能突破文獻的藩籬。他始終密切注視著考古學界的每一項新發現，在全面佔有、認真研究文獻資料的同時，注意利用實物資料印證、補充、訂正文獻記載，從而得出翔實可靠的結論。

先講利用實物資料的問題。一是親自進行實地踏查，去核證出土文物和發現新材料；二是密切關注考古新發現，善於突破藩籬而有創見。馬雍先生立下“獻身高昌”的誓言，以病殘之軀，多次赴西域考察，足跡遍及天山南北，乃至蔥嶺以西、帕米爾高原之南。每一回考察，均有重要收穫。例如他對新疆巴里坤、哈密漢唐石刻《任尚碑》、《裴岑碑》、《煥彩溝碑》以及喀拉昆侖沿線洪扎靈岩“大魏使者”岩刻的考釋，即是很典型的實例。從 19 世紀下半葉起，我國的新疆與甘肅地區成為各國考察隊、探險家挖掘文物的“熱地”。為了收集與整理流散海外的珍貴文獻，我國幾代學者做了極其艱巨而卓有成效的努力。同時，中國學者自己的西北科考活動，也取得了不少新成果。但面對新材料，提出新問題，採用新方法，將出土文獻與原有典籍進行科學的考釋、比證、辨析，卻始終是能否將研究推向深入的關鍵。新疆地區遺存的漢唐紀功碑刻，雖為數不多，卻是十分珍貴的歷史資料。因為遠在西陲，年代久遠，遭風沙剝蝕，保存得不好，清代中、晚期以後才陸續為學者所知，雖有拓本流傳，往往錯訛甚多，如無人再去實地考察並加以審訂，研究質量就會大打折扣。例如拜城著名的《漢龜茲左將軍劉平國作亭誦》，自 1879 年發現者施補華首拓後，有幾種拓本流傳，雖題跋考訂者甚夥，其中大多為史學界權威，卻因辨識拓本字跡的出入，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連定名都有十種之多。馬雍先生知難而進，采輯 11 種不同釋文，細心比對三期拓本，去偽求真，並結合大量史料，對其中關鍵字語一一考釋，終於給予準確定名，得出了最接近史實的科學結論。

於是我想到了敦煌文學研究中的問題。應該說，對於敦煌寫卷裏的文學類作品的整理與刊佈，從 1911 年劉師培為敦煌本《西京賦》殘卷作校勘與提要的九十多年來，已經取得了可以稱得上

是輝煌的成績；但是，對具體作品的深入研究，卻顯得十分遲緩而滯後。敦煌文學研究者（當然也包括我本人在內），對與之相關的考古新發現材料的反映相當遲鈍。一個突出的例子就是 1972 年出土的臨沂銀雀山竹簡中發現《唐勒賦》殘篇，1979 年出土的敦煌馬圈灣漢簡中有韓朋故事，1993 年出土的東海尹灣漢簡中存完整的《神烏賦》，考古家、語言學家及治文學史的專家競相發表研究文章，而敦煌學界卻鮮有反應，給人以置身度外的感覺。實際上，我們對“敦煌賦作”的源流、分類、體制及語言特色的研究，幾十年來幾乎沒有太大的進展，而上述新出土材料則是極具比較價值與啓示意義的。前邊提及的《漢龜茲左將軍劉平國作亭誦》，我 1980 年寫《瀚海辨》解釋岑參詩中“瀚海亭”時亦有舉證，今天重看馬雍先生的錄文，又有新的認識，誦文末有“堅固萬歲人民喜，長壽億年宜子孫”兩句，難道不可以從中去探尋對聯體的早期雛形麼？對敦煌吐魯番出土的許多文學作品，我們應該在較完備的整理本的基礎上，從文本著手去進行文學的分析，從文學史觀的角度去追根溯源、觸類旁通，才能將研究推向深入。

再講漢語以外的語言學習與運用的問題。近二十年來，許多年輕學者的外語水平都是我們這些六十年代大學畢業的人所無法攀及的。然而，像馬雍先生那樣，熟悉多種外語，特別是能下功夫去研究古代西域曾經流行而後又死去的一些文字（如佉盧文）者，仍基本闕如。大家承認，對敦煌及新疆所獲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材料的研究，是我們的一大薄弱環節。季羨林先生曾經花費很大的精力來培養這方面的年輕學者，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依然落後於歐洲與日本學界。仍然以“敦煌文學”的研究為例，敦煌寫卷裏有不少少數民族文字的文學作品，除了有少量藏文、回鶻文作品有些初步的研究文章外，大多尚無人問津。這裏既有意志力的問題，也有責任心的問題。記得我 1978 年在母校讀研究生時曾旁聽過俞敏教授的梵文課，學了兩個多月，畏難而退。1983 年在蘭州開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大會時，季羨林先生表示歡迎我跟他學梵文，我聽說最少 3—5 年，馬上退卻了。而馬雍先生在這方面亦迎難而上，他對新疆出土的七百多件佉盧文書的研究，對釐清魏晉時期西域的一些關鍵問題具有重要的意義，不僅為我們樹立了榜樣，也為中國學界爭了光。聽說近年來尼雅地區的考古發掘又有不少新收穫，盼望能在少數民族文字材料的研究上也有新的進展。

馬雍先生在新疆考察時曾賦詩言志：“一年一度出陽關，嚼雪眠沙只等閒。舊曲渭城君莫唱，此心今已許天山。”我曾經在新疆工作過十年，後來也到天山南北做過一點考察，深知馬雍先生這首詩的分量之重，對於一個身體傷殘的文弱書生來說，吟出這樣的詩句，就表示他為了研究西域的史地文物，早已將個人的生死置之度外。這是一種視學術為生命的崇高精神。新時期的敦煌吐魯番學研究，應該提倡和發揚這種精神。這是我們對馬雍先生最好的紀念。

(2004 年 12 月 8 日于臺北陽明山中國文化大學大莊館 A301 室)

IDP 第六次會議將在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舉行

林世田（中國國家圖書館）

國際敦煌項目 (IDP) 是促進敦煌文獻保護、研究以及數字化的國際合作組織，自成立以來，曾先後在英國薩塞克斯 (1993)、法國巴黎 (1996)、德國柏林 (1998)、俄羅斯聖彼得堡 (1999)、瑞典斯德哥爾摩 (2002) 舉辦過五次國際會議，在敦煌遺書的修復與保護方面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中國國家圖書館與英國國家圖書館決定將於 2005 年 4 月 22 日—24 日在北京舉行第六次會議，擬邀請 30 位中外學者就敦煌

遺書的修復、保存保護以及數字化等方面問題進行討論。

在“常書鴻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 郝春文（上海師範大學）

各位領導，女士們、先生們：

今天，我們懷著十分崇敬的心情，隆重紀念常書鴻先生誕辰一百周年。我謹代表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向這次會議的組織者浙江省博物館和浙江省敦煌學研究會表示衷心的感謝！

常書鴻先生的一生，是光輝的一生。他捨棄了優裕的都市生活，自願置身於為大漠戈壁所包圍的莫高窟下，為守護、研究、發揚寶貴的敦煌文化遺產奉獻了畢生的精力。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如果沒有常書鴻先生與其同事及其後繼者堅持不懈的努力，也就沒有莫高窟的今天。

常書鴻先生不僅為守護和研究敦煌文化遺產做出了突出的貢獻，還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常書鴻先生在法國留學期間，已經取得了很高的藝術成就，完全有條件在經濟發達、生活優裕的國度安家立業，但為了研究敦煌石窟藝術，他毅然從巴黎回到祖國，並舉家來到敦煌。對常書鴻先生而言，愛國主義不是一句簡單的口號，而是要付出巨大代價的實際行動。這種通過自己的實際行動體現出的崇高的愛國注意精神永遠值得我們學習。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但常書鴻先生卻以自己一生的實踐做到了有始有終。他確立了保護、研究、弘揚敦煌優秀傳統文化的崇高目標以後，就契而不舍、兀兀窮年，百折不撓，始終義無反顧，決不半途而廢，這樣的韌勁、毅力和實幹精神，同樣永遠值得我們學習。對多數人來說，職業不過是謀生的手段，但常書鴻先生把職業當作事業，視事業如生命，生命與事業已經融合為一體，這樣的敬業精神也永遠值得我們學習。

在常書鴻先生等前輩學者的感召下，浙江籍和在浙江工作的敦煌學者薪火相傳，人才輩出，為敦煌學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自上一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經過我國老中青三代學人的努力，我們在敦煌學的很多領域和方面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取得了無愧於前人的成就，這其中就有浙江籍和在浙江工作的敦煌學工作者的一份功勞。如今，浙江大學已經成為在國內外具有重要影響的敦煌學重鎮，浙江省敦煌學研究會又已把在浙江從事敦煌學研究的相關學者組織起來，可以預期，以浙江大學敦煌學研究者為核心的浙江省敦煌學界定將為敦煌學的發展不斷做出新的貢獻。

敦煌在中國，敦煌學的研究在世界。我相信，在浙江省敦煌學界將和全國、全世界的敦煌學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已經成為國際顯學的敦煌學必將日益興旺發達。認真學習常書鴻先生留下的寶貴精神遺產，不斷將常書鴻先生所鍾愛的敦煌學研究推向深入，是對常書鴻先生最好的紀念。

謝謝大家！

2004 年 12 月 22 日於杭州

《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編輯後記 府憲展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和法國國家圖書館合作編纂的《法藏敦煌西域文獻》，其第一冊在 1995 年出版，疊經 10 年之久，終於以洋洋大觀的 34 巨冊完成了。這是繼 2002 年完成《俄藏敦煌文獻》17 冊之後的又一重大成果。隨著法藏部分的完成，整套《敦煌吐魯番文獻集成》已經出版的部分，包括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德堡分所、上海博物館、天津市藝術博物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等各家藏品，已經達到了 66 冊。如果包括相同類型的大型文獻、文物資料叢書《俄藏黑水城文獻》、《俄藏敦煌藝術品》，總數更達到了 82 冊。再如包括近期正在編纂和擬議出版的《英藏黑水城文獻》、《俄藏黑水城文獻》(西夏文佛經部分)，國內中小藏家的敦煌西域文獻和黑水城文獻，其總量大有希望達到 100 冊之巨！在此之前有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14 冊的出版，續之而有江蘇古籍出版社《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前期部分的出版，有甘肅、浙江藏卷的出版。至此為止，流失海外的以英、法、俄為主的大宗收藏得以出版形式回歸故里，國內藏品也以化身百千回饋學界，對於藏經洞發現百年以來的艱難曲折，對於學術成熟繁榮必須經歷的材料學準備過程，也是一個階段性的終結。或如本書首冊法國國家圖書館館長芳若望 (Jean Favier) 在《前言》中所說：伯希和考察團從敦煌藏經洞等遺址上帶回來的文獻資料的全部出版，“可說是工程浩大，然而因此即標誌了這些文獻在全球的傳播中，將進入一個重大的、甚至是決定性的階段”。

法藏敦煌文獻具有世所公認的很高的學術價值。由於伯希和對於中國文獻學、中亞歷史語言的熟悉和理解，也由於伯希和佔據了獲取敦煌文獻的先機，即使是在斯坦因 1907 年 3 月對藏經洞文獻進行了首輪挑選以後，遲到正好一年的伯希和仍然獲得了敦煌文獻中的精華部分，這就是眾所周知的《大藏經》未收的佛教文獻、帶有年代題記的文書寫卷、非漢語文獻等。在伯希和獲得敦煌文獻的第二年即 1909 年夏天，向中國學者展示了所獲敦煌寫卷，引起了中國學者的熱切關注，一方面促成了中國政府將藏經洞剩餘材料運送京師，另一方面也促成了中國敦煌學研究的實質性開展。自茲以後，中國學者遠涉重洋抄錄寫卷、編制目錄、校勘訂誤、攝影出版，這個階段持續了幾十年；六十到七十年代英國、法國相繼發行了敦煌文獻的縮微膠捲，但是質量較差；八十年代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的《敦煌寶藏》的法藏部分不少圖版更難以辨識。隨著八十年代敦煌學的繁榮興盛，經過中國內地、香港、臺灣學者和出版人的努力，得到法國國家圖書館的積極支援，開始編纂出版本套叢書。

本套叢書的底本雖然是以縮微膠捲為主，但是情況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1993 年 7 月，我方工作小組訪問法國時，雙方對底片質量問題進行了認真的論證，確認許多底片沒有達到出版要求。當時商定的原則是，對於通行佛經以外的文獻從嚴掌握，務必保證質量，需要時重新拍攝製作；對於通行佛經（一般字跡也比較規範清晰）適當放寬。依據這些共識，前期所用底片的更換率達到四分之一，涉及文獻編號達到三分之一。後期所用底片質量有所好轉，技術進步也提高了清晰度，就相對減少了更換頻率。再加上每冊重點文獻都有彩色照片，也彌補了部分缺陷。出版物整體質量還是基本達到了使用要求。

法國國家圖書館的敦煌特藏包括漢文、藏文、回鶻文、粟特文、西夏文等文獻。本書收錄

了伯希和漢文文獻 Pelliot chin. 2001-6038 號。其中絕大部分為漢文文獻，同時包括了部分藏文、于闐文、粟特文、回鶻文文獻。其中于闐文、粟特文和部分回鶻文文獻原先編錄在漢文文獻序列中，並且通常有正反面同時書寫兩種文字的情況，所以按照漢文文獻的順序隨號刊出。藏文材料伯希和原先擬議單獨編入 0001-2000 的預留編號，但是實際情況超出了這個數字。漢文序列中的許多寫有藏文的寫本被抽出另編入了藏文編號序列，其結果是，一方面造成漢文文獻序列的缺號，另外不少抽出的藏文文獻名實不符，有些只是在漢文寫本上寫了幾行藏文，不能否認漢文仍然是這些個文獻的主體。為保持漢文材料的完整性，我們在編輯的時候，仍然將這些材料抽回漢文編號序列。

本書的編纂工作，主要參考了法國漢學中心敦煌小組謝和耐 (Jacques Gernet)、吳其昱 (WU Chi-yu) 等編寫，和以後由蘇遠鳴 (Michel Soymié) 主持編纂的《敦煌漢文文獻目錄 (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TOUEN-HOUANG)》的一、三、四、五、六卷。這部經典目錄對我們的幫助是無與倫比的，我們謹此向所有參加這部目錄編寫工作的專家學者致以崇高的敬意。我們從中感受到了法國專家的極其嚴謹的學風和深厚的功力。許多無標題的文獻，在《目錄》中一般是採用描述而不是直接給出定題的辦法，在沒有直接證據的情況下，我們體會到他們有能力定出一個比較合適的標題但是沒有這樣做，完全是出於謹慎負責的原因。但是，由於我們的編輯工作需要完成的是不同的任務，我們有必要為所有文獻給出一個相對貼切的題目，以提供給各類專業讀者一個導向，幫助他們找到自己需要的材料，哪怕由於我們的學力限制不能做得十分的準確。所以我們不得不斗膽超越我們尊敬的權威專家點到為止的方法，編制了所有的標題，其中包括《目錄》中並不明確的大量擬題。由於我們學養和資料的缺乏，比定工作並非容易。恰如陳寅恪先生所言：“故比勘異同印證文句之際，常有因一字之差餘，或一言之缺少，亦須竟置此篇，別尋他品。往往掩卷躊躇，廢書歎息。故即此區區檢閱之機械工作，雖絕難與昔賢翻譯誦讀之勤苦精誠相比並，然此中甘苦，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亦有未易為外人道者也（《金明館叢稿二編》，189 頁。）。”好在我們借助了國內敦煌學、西域學各方面專家的力量，汲取了他們的最新成果；好在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我們從使用浩繁的《大正藏索引》逐步改變成了可以用電腦檢索，再加上我們如履薄冰誠惶誠恐的心情，使得工作並非無所作爲，而是有所推進。尤其是《目錄》第二冊 (Pelliot.chin. 2501-3000) 尙未出版，這些寫卷就由我們獨立進行了定名。

我們還直接受惠于中國敦煌學發展的成果。一些重要的目錄，如王重民《敦煌遺書總目索引》、黃永武《敦煌遺書最新目錄》、敦煌研究院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等，成爲我們最經常使用的工具；榮新江《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錄》所列《巴黎國立圖書館敦煌漢文寫本編號變動對照表》爲我們綴合、歸位、追索文獻提供了極大的便利，當然還有其他方面的很多幫助；王堯主編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獻解題目錄》對於藏文文獻的定名具有主要參考作用；張廣達、榮新江《于闐史叢考》彙編了至今爲止的于闐文文獻的研究成就，榮新江還不斷向我們提供了最新學術成果；牛汝極《回鶻佛教文獻》則對回鶻文文獻定名十分重要，我們也直接請教作者得到不少幫助。還有集國內敦煌學精英編撰、季羨林主編的《敦煌學大辭典》自然是我們的案頭必備參考書。

作爲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的漢文部分，已經全部完成；原先計畫在完成這項工作以後，首先出版其他的漢文材料。其中“都勒都爾—阿護爾漢文文獻”，由於已經有童丕 (Eric Trombert) 編、池田溫和張廣達協助的《庫車漢文文獻》(L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KOUTCHA) 在 2000 年問世，即不再重複出版；其他文種材料的編纂出版尙在醞釀聯繫之中。其中如西夏文文獻的出版，已經取得了各方的贊同。

本書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敦煌吐魯番文獻集成》的主體部分，是由魏同賢先生策劃，潘重規、饒宗頤、季羨林先生擔任學術顧問。由李偉國、府憲展擔任中方執行編輯，郭恩 (Monique

Cohen)、蒙曦 (Nathalie Monnet) 擔任法方執行編輯。由建立於 1993 年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敦煌西域編輯室實施編纂出版工作。先後擔任本書各分冊責任編輯的有郭子建、劉景雲、李雲、李震宇、袁欣瑜等，美術編輯為嚴克勤，方偉製作了大部分照片。本書從草創到完成歷經十數年時間，已經發生了重大的人事變動。出版社各屆社長魏同賢、李國章、王興康和總編輯趙昌平都給予了充分的關注，主管此項目的副社長副總編李偉國 1996 年調離本社前，對於此項工作的開創和編輯規範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本書出版首先得到了潘重規、吳其昱先生的鼎力撮合，幫助聯絡了法國國家圖書館東方部商談合作意向。我們尤其感謝法國國家圖書館原館長芳若望先生的合作遠見，感謝當時的東方部主任、現任手稿部主任郭恩女士，以及現任東方部主任蒙曦女士從 1993 年開始的長期持之以恆的幫助，從整體籌畫到資料查檢、照片定制等，事無巨細，都是親自操辦。兩位都是敦煌學專家，也是中國文獻學的專家，非常熟悉和熱愛中國的文化和歷史文獻，也因此不遺餘力地幫助我們完成了這項工作。本書出版得到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柴劍虹、敦煌研究院樊錦詩、北京大學榮新江、法國漢學研究中心戴仁 (Jean-Pierre Drège)、吳其昱、張廣達，法國遠東學院北京中心華瀾 (Alain Arrault) 等各位先生、女士在資料和信息方面的各種幫助，以及在學術方面的卓越指導。

謹此對於幫助本書編纂出版的各方面所有領導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謝！

2004-12-9

《燦爛佛宮：敦煌莫高窟考古大發現》出版 王義芝（敦煌研究院）

由樊錦詩、趙聲良著的《燦爛佛宮：敦煌莫高窟考古大發現》一書於 2004 年 8 月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

敦煌石窟的開鑿延續千年，其中包含的內容廣博而深厚。為了把專業性較強、學術性很深的敦煌學介紹給一般讀者，本書作者以簡明而通俗的方法，不僅全面而有重點地介紹了豐富多彩的敦煌藝術，同時也介紹了敦煌歷史文化的發展情況、藏經洞與敦煌學的關係。特別是本書在行文中，一方面儘量把迄今為止的大量研究成果融會其中，一方面也努力把自己幾十年來研究敦煌藝術中的一些思考也反映出來，加上書內附有大量彩色照片，因此本書具有內容豐富、觀點新穎、知識性強的特點。因此本書還具有趣味性、資料性和可讀性。

《游訪敦煌莫高窟·未湮沒的寶藏》出版 王義芝（敦煌研究院）

由張豔梅著《游訪敦煌莫高窟·未湮沒的寶藏》一書於 2004 年 8 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本書作者為敦煌莫高窟的資深導遊，作者根據自己長期積累的導遊經驗，從“鑿窟初響·北朝”、“黃金年華·隋~唐”、“日落大漠·五代~元”三大部分，通俗地介紹了莫高窟藝術的發展歷史，並重點對其中 29 個洞窟進行了詳細的講解。從本書中你能瞭解和看到“神奇的九色鹿的故事”、東方的“蒙娜麗莎的微笑”、多姿多態的“敦煌飛天”；感受到“屍毗王捨身救鴿”和“薩埵太子捨身飼虎”的奉獻精神；你還可以欣賞到似睡覺般的“涅槃像（臥佛）”，以及著名的“反彈琵琶”舞等等。

此書配有大量彩色圖片，可謂圖文並茂，語言生動流暢，還巧妙地在書頁中穿插設計了名詞解釋，讓你在不知不覺中對佛教藝術有更進一步的認識。總之，本書不失為是一個好的導遊，她能帶你穿越敦煌莫高窟的歷史，讓你輕輕鬆鬆地暢遊在祖國錦繡壯麗、悠久深厚的文化之中。

《敦煌文學文獻叢稿》出版 王義芝（敦煌研究院）

伏俊璉著《敦煌文學文獻叢稿》，於 2004 年 8 月由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本書是作者多年來對敦煌文學文獻研究的心血結晶。本書收錄了 25 篇文章，可分為兩大類，前 12 篇是論述性的，後 13 篇是校勘性的。涉及如下方面：30 多個抄本《詩經》的比較；《文選注》殘卷的抄本時代及其獨特之處；中國早期的講唱技藝，如看圖講誦、俗講、轉變的內涵、嬗變，由此形成的俗賦、講經文、變文以及話本小說等文體特點。其中的重點是對俗賦的討論：俗賦寫本的考辨（如《敦煌賦及其作者、寫本諸問題》），俗賦的起源及文學史意義的挖掘（如《敦煌俗賦的文學史意義》），俗賦的體制及其審美價值的探討（如《敦煌俗賦的體制及其審美價值》、《敦煌本〈醜婦賦〉與醜婦文學》）等。本書還以近半的篇幅對前人校勘敦煌俗

賦的成果進行了梳理、總結和補充。

《浙江與敦煌學——常書鴻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文集》出版 許建平 (浙江大學)

為紀念常書鴻先生誕辰一百周年，浙江省博物館、浙江省敦煌學研究會、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聯合編纂的《浙江與敦煌學——常書鴻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文集》於 2004 年 12 月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本書由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浙江大學歷史系教授毛昭晰先生作序，著名美術史學家、中國美術學院教授王伯敏先生題寫書名，共收入文章 57 篇，除少數幾篇紀念文章外，其他絕大多數論文的作者均為浙籍或長期在浙江工作或學習過，這些論文有的已經刊佈過，有的為首次發表，它們都從不同的側面展示了浙江敦煌學研究一百年來走過的歷史軌跡。

全書 719 頁，65 萬字，定價 55 元。

附：全書目錄

永生的藝術道路——常書鴻先生與敦煌	李硯祖
塵封不住的回憶——重讀父親的畫作	常沙娜
懷念我的父親常書鴻	常嘉煌
紀念常書鴻先生	樊錦詩
敦煌守護神贊	王伯敏
敦煌鑄就五字碑	葉文玲
論“常書鴻精神”	柴劍虹
探索油畫民族風格的先驅——讀常書鴻先生的油畫	邵大箴
常書鴻先生藝術思想尋跡	張毅清
敦煌藝術的源流與內容	常書鴻
玄奘譯經和敦煌壁畫	樊錦詩
敦煌藝術簡介	潘絜茲
歷史的彩暈——敦煌石窟美術載入中國美術史冊的回顧	王伯敏
漫談敦煌千佛洞和考古學	夏 鼐
敦煌石室畫像題識序	史 岩
摩利支天為何方神氏	王 荔
《論語》鄭注《述而》至《鄉黨》殘卷跋	羅振玉
敦煌石窟出《沙州都督府圖經》殘卷考釋	王仲榮
敦煌所出《唐沙州某市時價簿口馬行時沽》考	朱 雷
敦煌吐魯番居民生存權之個案研究	毛漢光
唐代西州合戶之授田額——唐代西州田制研究之五	盧向前
論晚唐五代的沙州（歸義軍）與涼州（河西）節度使	
——以“河西”觀念為中心的考察	馮培紅
信仰與政治：唐宋敦煌祠廟營建與戰爭動員關係小考	余 欣
經營西域絲路的經濟利益——敦煌和吐魯番出土兩份絲綢物價表的比較研究	趙 豐

敦煌學與古代西部文化	齊陳駿
魏宗室東陽王榮與敦煌寫經	趙萬里
敦煌研究院、上海圖書館、天津藝術博物館藏敦煌遺書巡禮	施萍婷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未刊敦煌寫本殘片四種的定名與綴合	許建平
《燕子賦》研究	黃 征
敦煌寫本《大般涅槃經》著錄商補	景盛軒
《俄藏敦煌文獻》道經殘卷考述	葉貴良
敦煌寫卷李榮《老子注》及相關問題	朱大星
試述《傷寒論》寫本與傳本《傷寒論》的關係及其文獻價值	王杏林
敦煌本《瑞應圖》識緯佚文輯校	竇懷永
關於別紙和重迭別紙	吳麗娛
敦煌寫本隋智騫楚辭音跋	薑亮夫
敦煌變文韻部語音性質簡論	都興宙
敦煌韻書斯二〇五五之謎	關長龍 曾 波
關於《敦煌變文字義通釋》	蔣禮鴻
讀第五版《敦煌變文字義通釋》——兼論著者的俗語詞研究思想	顏洽茂
唐代白話詩釋詞	郭在貽
敦煌社會經濟文獻詞語略考	董志翹
敦煌變文詞語校釋	方一新
從“蒙免”“鞭恥”說起——談一種特殊的詞語產生方式	王雲路
敦煌變文中的古代軍語彙釋	褚良才
試論敦煌書儀的語料價值	張小豔
藏語 ring-lugs 一詞演變考——敦煌藏文古詞研究之一	陳踐踐
《字寶》考	張金泉
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	王國維
王梵志詩論	項 楚
論敦煌佛曲與詞的起源	吳肅森
敦煌古小說淺談	柴劍虹
關於《佛說阿彌陀經押座文》的一些問題	荒見泰史
燦爛的敦煌文化——從語言文學的角度談談敦煌文獻的價值	張湧泉
文物保護與數位化技術	魯東明 劉剛 刁常宇
紹興人與敦煌學	姚培鋒
試論浙江敦煌學研究的特色	趙和平

《中國石窟圖志》評介

朱悅梅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

漢語“石窟”一詞，借自印度，首見於東晉天竺僧佛馱跋陀譯《觀佛三昧海經·觀四威儀品》，文載：“爾時世尊，還攝神足，從石窟出。”¹ 東晉高僧法顯在其所撰的《佛國記》中，亦對印度佛教石窟多有記載²。從公元前 2 世紀到 3 世紀，可以說是印度佛教石窟的初興期，至 5 至 8 世紀臻至極盛。

如所周知，石窟是隨著佛教的產生而出現的，一直是僧徒活動的重要場所。佛教在印度產生後，經由南北兩路向東傳播，大致在西漢時代即已到達中國。南道由海路，經斯里蘭卡、東南亞各國而傳入我國西南地區；北道則取道陸路經由中亞，然後沿絲綢之路，途次新疆、甘肅河西走廊而進入中原，從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看，由北道傳入的時間要早於南道。在佛教東行的沿線地區，各地都留有佛教石窟遺存。但從我國石窟寺分佈的狀況看，地域性差異是巨大的，明顯表現為北方密集，而南方稀少。

我國疆域廣大，地區間的差異很大，尤其是南北文化的差異更是極為明顯，這些因素又導致我國的佛教石窟寺呈現出豐富多彩的地域特色和南北特色。將這些風格各異的歷史遺存進行全面收集與分類編纂，系統地公諸於世，以弘揚我國經久不衰的古代石窟寺文化，是非常必要的。最近，由敦煌研究院盧秀文副研究員編著的《中國石窟圖志》一書就是適應這一需要而誕生的。

《中國石窟圖志》，全書 120 萬字，分上中下三編，由甘肅文化出版社於 2002 年 9 月正式刊行。書首有長篇概論——《中國石窟》，系統地論述了中國石窟及其相關問題，分別為：一、石窟的興起與傳入；二、石窟的分佈；三、石窟之內容；四、洞窟形制。五、石窟研究。比較全面地論述了中國石窟的概貌。除此之外，其主體內容則分為圖、志、目錄三個部分，每部分都有自己的特點：

一、珍貴圖片眾多，主要體現在上編——《圖錄編》，共收各類圖片資料 358 幅，有的為彩圖，有的為黑白，其中又以彩圖居多。在這些為數豐富的圖片中，有不少都是第一次公開發表。這些圖片，分別出自不同的石窟遺址，既有摩崖造像，也有洞窟壁畫、塑像，更有石窟建築作品，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和資料價值。

二、石窟信息豐富，體現於中編——《石窟志編》，其中收錄了多達 400 餘處的石窟與摩崖造像遺址，地域涵蓋新疆、甘肅、青海、寧夏、陝西、河南、山西、山東、內蒙古、河北、北京、遼寧、黑龍江、西藏、四川、重慶、廣西、雲南、浙江、江蘇、湖北、湖南、江西、福建等 24 個省、市、自治區，內容則涵蓋石窟（包括摩崖造像、題刻等）的建造年代、地理位置、現存窟數、洞窟分期、窟內形制、內容題材、藝術特徵、宗教流派、保護及收藏等方面。

本編將分散在各地的石窟以資料概述的形式聚集在一起，對其歷史情況、保存狀況、地理位置等一些個體特徵逐一梳理，使讀者在有限的篇幅內對中國石窟有了一個空間上和時間上的了解，堪稱國內第一部全面反映中國石窟及摩崖造像的著作，涵蓋地域廣闊，資料豐富，為此前所不曾有，宏觀地展示了中國石窟的眾多與內容的豐富。

三、搜羅全面，其中又以本書下編——《論著目錄編》為典型。該編收錄 1802 年～2000 年間海峽兩岸學者研究石窟的論著目錄及海外學者研究中國石窟的著述目錄計 1 萬餘條（部、篇），並著錄了部分手稿、列印稿、內部交流稿等，另有比較重要的佛教研究論著目錄，以為石窟研究的補充。在體例編排上，目錄按出版年代的先後順序編排，展示一個多世紀以來的豐富研究成果。

本書以圖片展示、實物介紹及研究成果著錄的編輯順序，各編自成體系，又互相聯繫，交相輝映，為讀者打開了一扇了解中國石窟文化的視窗，展示了豐富的石窟內容。同時，該書以收錄全面，條理清晰而見長，系統地展示了所錄區域範圍內石窟，摩崖造像的全貌，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作為第一部全面反映中國大陸石窟現狀的大型工具書，既可為研究之資，又可為大眾導讀之物，更像內容詳盡的導遊手冊，可引領讀者深刻理會中國石窟文化的奧妙。

正如世上少有無瑕美玉一樣，是書也存在著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突出體現在石窟的調查工作尚不夠系統。對大中型石窟著錄比較全面，但漏掉了許多小型石窟。誠如前文所言，中國石窟眾多，分佈又不集中，保護研究力量也分佈不均，故除了數量不多的大型石窟，如敦煌莫高窟、洛陽龍門石窟、大同雲岡石窟、拜城克孜爾石窟、天水麥積山石窟、大足石窟等研究較多外，多數石窟都缺乏系統的研究，更有不少石窟處於無人問津的狀態，這種現狀勢必影響石窟綜合研究水平的提高。遠的不說，僅在甘肅的武山、甘谷及蘭州一帶就有不少這類石窟，本書如果能將這批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加以著錄、介紹，將會是一件更有意義的工作。

【注】

- 1 《佛說觀佛三昧海經》卷 7，《大正藏》第 15 卷，No. 643，頁 681。
- 2 《高僧法顯傳》卷 1，《大正藏》第 51 卷，No. 2085，頁 862~863。

羽田記念館所蔵西域出土文献写真資料中 《鷲子賦》テキスト紹介 玄幸子 (日本新潟大学)

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 (東洋史学) であった故羽田亨博士 (1882-1955) を記念して 1966 年に建てられた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附属 ユーラシア文化研究センター (羽田記念館) には、同博士の収集による西域出土文献の写真資料が 933 枚所蔵されている¹。關尾史郎教授 (新潟大学) を代表とする科学研究班のメンバー全員が 2004 年 11 月 24 日同記念館を訪れ調査を行った²。所蔵される出土文献資料は簡単な目録を存するのみであるため、目撃しつつ資料の内容を確認する作業が中心となった。この作業を通じて確認できた《鷲子賦》の異本について、以下に報告を行う。

資料 No. 446 には³、1 枚の写真に 8 片の資料が収められている、“長行馬”等の社会経済関連文書に混じって、資料番号を正方向に見た場合最右上に置かれているのが、今回取り上げる資料である。資料によってはメジャーを横に置いて写された大きさの分かるものもあるが、当該資料の大きさは判断できない。11 行のみを存す断片である。积文は次の通りである。

- 1 下牒分析。“鷲子單□□□□□
- 2 乃被雀兕奪，仍自更箸(著)□
- 3 赫(嚇)，‘明云：勅，括客標入正格。阿你□
- 4 逃落籍，不曾見你应王役。終
- 5 遣官人奉(捧)脊，流向擔崖象
- 6 □。’雲(云)：‘鶴鵠是我表丈人，耽鳩□
- 7 我家伯。州懸長官，瓜羅親□。
- 8 是你下牒言我，共你到頭無益。
- 9 火急離我門前，少時終須喫搥(?)。’
- 10 鷲子不分，?(以)?(理)?(從)?(索)。遂被撮頭□。
- 11 ?(拳)，交 ”

《鷲子賦》については、早期には王重民校録のテキストが《敦煌變文集》(1957. 人民文学出版社)に収められる。校録に使用された資料のうち、P. 2653(原卷)P. 2491(甲卷)P. 3666(乙卷)P. 3757(丙卷)S. 6267(丁卷)が、今回取り上げたテキストと重なる部分を有する。各本の異同を比較した結果を別表として末尾に示す。

異同を踏まえた上で検討すると、他の 3 本で“野”と作るところをこのテキストで“鶴”とするが“野(羊者切)”“鶴(羊謝切)”両字の字音について全濁上声と去声が分別されなかった状況を反映し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敦煌文書常見の音通字による書き換えの状況と一致する。

次に字体の共通点は、“燕”字に俗体“鷲”を用いるのと同様に、“奪”“象”などの字体は他の敦煌文書によく見られる同時代通行の俗体で書かれている。

また、従来“云：‘明勅括客。標入正格。……’”と校訂する箇所については、今回‘明云’とするテキストがさらにふえたことで、……赫(嚇)し、‘明らかに云う、勅す：括客、正格に標入せよ。……’”と“明”を雀の脅し文句の中に入れ込む校訂の可能性が改めて考えられるが如何であろうか。無論、“明勅”と言う語彙が他の資料で常見であることは従来の指摘の通

りではあるが。

以上を総合すると、このテキストはこれまで確認されているどの資料とも一致しない異本であり、俗賦の書写流通状況を考察する上での新たな情報を得ることの出来る敦煌写本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

《羽田写真集》の資料価値と研究方法については、落合俊典氏（国際佛教学大学院大学教授）が《李盛鐸舊藏 開元廿二年寫〈法花行儀〉初探》（《草創期の敦煌學》高田時雄編 2002 年 知泉書館）でも述べられ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るが、今回は俗文書資料の一部を紹介した。原資料ではなく写真資料による研究という制約があり、資料自体の真偽問題はもとより、昨今クローズアップされている紙質、墨色、筆運びなどの原資料ならではの書写年代などにかかわる調査は不可能ではあるものの、とりわけ原資料が現存するかどうかわからない場合には残された唯一の資料といえ資料価値の大きさはいうまでもない。今回紹介した資料はごくわずかな一部にすぎないが、このような作業を通じて逆に《羽田写真集》の資料としての位置づけを行うことにもなり、釈文を行い内容を公開するなど、資料の全体像を明らかにする作業の必要性を感じている。

また、当日閲覧室において、關尾史郎代表から吐魯番文書混入の指摘、鶴田一雄氏から書体に見る資料の位置づけ、柴田幹夫氏から大谷文書との関連性、岩本篤志氏から印章にみる資料価値など、各分野から興味深い示唆を得た。これら個別の報告は各氏がいずれどこかでまとめられるであろう。

別表

テキスト	P. 2653(原卷)	P. 2491(甲卷)	P. 3666(乙卷)	P. 3757(丙卷)	S. 6267(丁卷)
彊	—	強	強	強	—
箸	—	著	著	著	著
赫	—	嚇	嚇	嚇	嚇
明云	云明	明云	云明	明云	明云
勅括客	勅括客	勅括	勅括	勅括客	勅括—
標	標	標	標	標	—
应	—	應一心十口	應	—	應
奉	—	棒	棒	—	—
雲	—	雲	云	—	—
鶴	—	野	野	—	野
鵲	錯	鵲	雀	—	鵲
伯	百	伯	佰	—	—
懸	—	懸	縣	—	—
瓜	—	菰	菰	—	—
無益	—	無亦	無益	—	—
少	少	小	少	—	—

— は、欠字を示す

附) 最後になりましたが、快く多くの資料の閲覧を許可して下さったユーラシア文化研究センター(羽田記念館)に心から御礼を申し上げます。

【注】

- 1 同一箇資料を重複撮影した場合もあるため内容からみた実際の点数としてはこれよりも少ない。
- 2 2002 年基盤研究(B2) “中国国内所蔵敦煌・吐魯番文献の歴史学的・文献学的研究” (代表, 關尾史郎教授) の研究分担者、鶴田一雄・柴田幹夫・岩本篤志 (すべて新潟大学所属) 諸氏を含む総勢五名である。
- 3 同記念館の “羽田亨博士所収西域出土文献目録” の整理番号である。

魏晉“五胡”時代の鎮墓文からみた敦煌の地域的特質 關尾史郎 (日本新潟大学)

本稿は、2003 年度の三島海雲記念財団学術奨励賞 (人文科学) による研究プロジェクト “‘五胡十六国’ 時代に関する史料の収集、整理とそれを用いた歴史研究” (代表者: 關尾, 分担者: 町田隆吉, 小林聡, 岩本篤志, 協力者: 三崎良章, 川合安) の成果の一端を紹介するものである。表題にいう “鎮墓文” とは、被葬者の鎮魂のために、陶罐や陶鉢などの器腹に朱書または墨書 (まれに白書) された文章であり、これが書写された陶罐・陶鉢は、墓中に埋納される。

敦煌をはじめとする中国西北地域から出土した魏晉・“五胡” 時代の鎮墓文については、その紀年である元号に着目して “五胡” 諸政権の対外政策を論じた成果や、主たる出土地である敦煌一帯における葬送習俗を検討した成果などがある。本研究では、敦煌を含む西北地域の地域的な特質を解明するための予備的な作業として、鎮墓文の出土状況を最新のデータによりながら整理し、あわせて西北地域における葬納用文物全体のなかにこれを位置づけることにした。

敦煌に関しては、西郊の祁家湾古墓群 (敦煌県西郷・都郷) と東郊の佛爺廟湾 (敦煌県東郷)・新店台古墓群 (效穀県) の双方から多数の鎮墓文が出土している。先行研究によれば、陶罐に書写された鎮墓文には二つの形式があるが、陶鉢に書写されたそれは単一で、陶罐の一方に相当する。また陶器としての面に着目すると、陶罐でさえ最大でも高さが 10 cm にも満たないこと、陶罐は被葬者の頭部か足元、陶鉢は腹部 (破碎された形で) に置かれること、および陶鉢だけが埋納された例がないのとは対照的に陶罐は一人の被葬者につき複数埋納されていることなどが指摘できる。

敦煌以外でこの時期の鎮墓文が出土しているのは、甘肅省内では、酒泉の西溝、嘉峪関の新城、武威の早灘坡、崇信の于家湾、および定西の嶠口、さらに青海省西寧の上孫家寨などである。それぞれ出土例が少ないのだが、以下のことは認められよう。書写された陶器はいずれも高さが 20 cm 内外あり、かつ器形も陶壺や陶瓶と称されるものであること (敦煌の陶鉢に類似した器形のもの確認されていない)、墓内に埋納されるが、前室のように被葬者とは離れた位置に置かれること、そして書写面が大きいこともあり、鎮墓文自体も長文であることなどである。重要なのは、これらの特徴が後漢時代に内地で盛んに作られた鎮墓文のそれと一致することであろう。

これらの事実から、同じ西北地域の鎮墓文であつても、敦煌のそれが、書写された陶器のありようも含めて内地の鎮墓文をほとんど継承しなかつたことがわかる。出土 (埋納) 点数の多さ (総数、古墓群中の出土墓数、墓別出土点数) も、敦煌が突出しているのであり、その理由の解明は今後の課題である。ただこのような鎮墓文の点数の多さは、この地域の経済力の高さには直結しないと考える。なぜならば、鎮墓文が 90 点近く出土した敦煌西郊の祁家湾には磚室墓はほとんどなく、小規模な土洞墓が圧倒的多数を占めているからである。むしろ鎮墓文の多さは、敦煌における伝統的かつ土俗的な信仰の盛行を物語っているとみるほうが妥当であろう。さらに言えば、既に指摘されていることだが、三危山下から出土した鎮墓文 (陶罐) と祁家湾から出土した鎮墓文 (陶鉢) は、仏教信仰の要素を含んでおり、莫高窟をはじめとする石窟寺院の開削事業との関わりが想起される。また今まであまり注目され

てこなかったが、新店台古墓群から出土した鎮墓文には、被葬者の本貫を效穀と記す例があり、この地が当時、敦煌郡效穀県に属していたことを示している。敦煌機場にも接する新店台古墓群は、直線距離では莫高窟にも近く位置しており、あらためて県治も比定されていない效穀県について、検討の可能性と必要性が出てきたのではあるまいか。

一方この時代、副葬品リストとして展開してきた随葬衣物疏が、鎮墓文と同じように被葬者の鎮魂を祈願する要素を帯びてきたのだが、敦煌からの出土例は報告されていない。しかし西北地域全体で見れば、甘肅省では武威の南灘、玉門の畢家灘、そして著名な吐魯番の阿斯塔那と哈拉和卓などの古墓群では鎮墓文の出土例は報告されておらず、そのかわりに随葬衣物疏が作成されていた。とくに敦煌と同じように大規模な発掘調査が行われた吐魯番の両古墓群では、随葬衣物疏が多用されており、対照的ではある。武威の早灘坡を唯一の例外として、特定の古墓群から鎮墓文と随葬衣物疏の双方が出土した例は報告されておらず、この両者はモザイク状に西北地域に広がっていったのではないかという推測が成り立つ（敦煌では最近、莫高窟北区から随葬衣物疏が出土したが、それは隋唐交替期のもので、はるか後代に属する）。

ようするに、鎮墓文にせよ随葬衣物疏にせよ（画像磚も同じであろう）、内地から順次西北地域に普及していったものと思われるが、西北地域に全面的かつ一律に普及していったわけではなく、時間的な格差はもちろんながら、空間的にも偏差をとめないながら、随葬衣物疏がいち早く西端の吐魯番に到達したということだろう。この問題は、西晉末から“五胡”時代に及ぶ、内地から西北地域に向かった漢族の移動との関連で説明される必要がある。

以上は、いずれも現段階における発掘調査の成果に依存している。今後、これを修正するような局面もありえよう。本研究の成果はそれまでの仮説としての意味をもっている。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稿約

本刊由“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主辦，策劃：高田時雄、柴劍虹；主編：郝春文。本刊的內容以國際敦煌學學術信息為主，刊發的文章的文種包括中文(規範繁體字)、日文和英文，每年出版兩期。每年第 1 期的截稿日期為 5 月底，第二期的截稿日期為 11 月底。

本刊的主要欄目有：每年的各國敦煌學研究綜述(包括項目動態及熱點爭鳴與點評)、新書訊、各國召開敦煌學學術會議的有關信息、簡要的新書評介、對國際敦煌學發展的建議、重要的學術論文提要等，歡迎就以上內容投稿。來稿請寄：上海桂林路 100 號：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趙貞，郵政編碼：200234, 電子郵箱：dtzhaozhen@163.com；北京西三環北路 105 號：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金滢坤，郵政編碼：100037，電子郵箱：ykjin2000@163.com。

來稿請附作者姓名、性別、工作單位和職稱、詳細位址和郵政編碼以及電子郵箱，歡迎通過電子郵件用電子文本投稿。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首批幹事名單:

中國: 樊錦詩 郝春文 柴劍虹 鄭阿財(臺灣)

日本: 池田溫 高田時雄

法國: 戴仁

英國: 吳芳思

俄羅斯: 波波娃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網頁:

<http://www.zinbun.kyoto-u.ac.jp/~takata/ILCDS/proceedings.html>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秘書處地址:

日本國 京都市 左京區北白川東小倉町 47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高田時雄教授 Tel: 075—753—6993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HUMANITIES

KYOTO UNIVERSITY KYOTO 606—8265, JAPAN
